

飞矢不动⁽¹⁾

——李朝远先生追思会在上海博物馆召开

The flying arrow is at rest

本刊报道

上海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李朝远先生于2009年4月26日7时15分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享年56岁。李朝远先生长期从事古代青铜器研究，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领域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的病逝是上海博物馆和青铜研究学界不可估量的损失。为了表达对李朝远先生的怀念，寄托哀思，上海博物馆于2009年5月24日为李朝远先生举行了追思会。

出席此次追思会的有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东，市委宣传部人才办副主任成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专家处副处长叶霖霖，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党委书记胡建中，副馆长陈克伦、王小明，党委副书记王莲芬，原副馆长顾祥虞，李朝远先生的女儿

李霁昕，以及李朝远先生在学术界的前辈和朋友：复旦大学出土文献和古文字研究中心裘锡圭教授、刘钊教授，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中心李伯谦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教授，上海大学历史系谢维扬教授，中国古文字研究会代表、吉林大学副校长吴振武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徐天进教授，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副馆长曹玮研究员，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张庆捷研究员，山西博物院院长石金鸣研究员，湖南省博物馆副馆长李建毛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章义和教授，美国盖地茨堡大学孙岩教授等，同时出席的还有上海博物馆相关部门的主任和李朝远先生的生前好友、同学、同人。

出席追思会的多位领导和专家着重回顾了李朝远先生在学术研究和博物馆建设方面的成就。

陈东副部长谈到：“李朝远先生从事青铜器研究



(1) 李朝远生前一直喜欢古希腊哲学家芝诺的一句名言“The flying arrow is at rest ——飞矢不动”，也可直译为——“飞矢在休息”。故以此为题愿李朝远先生安静长眠。

二十余年，专攻青铜器的鉴定、辨伪与研究，在西周、礼县秦公文化及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方面成绩显著。作为对他扎实的学术造诣和较高的理论素养的肯定，2006年，李朝远同志被文化部评为优秀专家，是上海市文博系统中唯一一位获得此项荣誉的学者。

2007年，李朝远同志不幸罹患癌症，市委宣传部对他的病况十分关心，部领导始终关注着他的治疗和康复进程，其间也深深感佩于朝远同志积极向上的乐观态度和笔耕不辍的治学热忱，我们都衷心期望，李朝远同志能够击败病魔，创造奇迹。

然而遗憾的是，两年之后，在2009年的今天，朝远同志终究远离我们而去。他的辞世，是上海博物馆的损失，是上海文化事业的损失，也是中国文博学界和史学界的损失。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李朝远同志的生前好友、同仁、学生和家属齐集一堂，共同缅怀这位治学严谨、成果卓著的学者。我们相信，李朝远同志的音容笑貌将永远留在大家的心中，我们更希望，后学者将能继承李朝远同志的遗志，不断进取，努力钻研，争取更大的事业进步和发展，为国家的文化建设添砖加瓦，奉献力量。”

陈燮君馆长谈到：“我和朝远同志共事多年，通过长期相处，令我印象十分深刻的是他的学风正派、思维敏捷、思路清晰，具有全面把握所从事学科、专业的学术动态，提出并解决重大专业课题的能力。

李朝远同志的学术成果处于该领域的前沿，被业界认为是中国青铜研究的方向。他多次策划展览和学

术讨论会，带领青铜研究团队推出一系列的馆藏文物展，始终关注团队的学术创新，科技领先和人才培养，要求各专业研究人员密切关注国内外文博领域的最新动态和相关学科的信息并运用到学术研究中，要求各专业研究人员要把课题放在社会大文化背景下思考，立意要新、起点要高，使学术研究始终处于本领域的前沿地位。

学者身份之外，朝远同志有相当强的领导、协调和组织管理能力。作为业务副馆长，他以高度的事业心与责任感，认真做好所分管的工作，组织举办了《中国古代青铜乐器》、《山西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等展览及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博物馆陈列展览中，他以极大的热情和认真细致的态度带领他的青铜器研究团队，适时推出《上海博物馆藏甲骨文精品展》和《上海博物馆藏铜镜展》等上海博物馆馆藏文物系列展。他主导策划的每年‘5·18’博物馆活动周总能围绕当年的主题，开展的红红火火，有声有色，促进了博物馆社会功能的体现，扩大了博物馆在社会上的影响和号召力，对提高市民的文化素养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李朝远同志在繁重的工作之余，还承担了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文博专业课程的教授工作，同时是‘上海市文博系列中级职称考试’、‘上海市文物经营水平认证’大纲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并多次应邀在美国、法国、俄罗斯、台湾、香港等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和专业成果的讲学。



2007年后,朝远同志罹患癌症,当时病况已经很不乐观,但是朝远同志始终以乐观无畏的态度对待病魔,不消极沮丧,不怨天尤人,在积极配合治疗的同时依然关注着博物馆的事业发展和学术界的最新动态,并且继续笔耕不辍,在2009年4月还写成了《匍匐诸铭文拓片之比堪》一文,这种追求事业永不言歇的热忱令我们这些同仁无不深深地感动和钦佩。”

与会的学者和同人纷纷发言,大家从学术研究、日常工作、生活交往等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回忆了各自熟悉的朝远先生。

发言者对朝远先生的学术研究,或从整体的研究层面、或从具体的研讨课题、甚至是偶尔的点滴探讨来细述,对他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博物馆学等诸多学科的学术研究和成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他作为一位人文学者所具有的社会责任感、思想灵敏度以及学术智慧表达了深深的敬意。

同人们也从全面的工作成就、团队的学术合作、个人的友谊交往等方面深情缅怀,对朝远先生严谨朴素的学术风范、刻苦钻研的敬业态度、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谦虚平和的人格品德给予了极高的赞誉。■

朝远的精神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撰文 / 李伯谦

4月26日晚上,周亚先生给我手机发短信,说朝远于当天早晨7点多钟告别大家,静静地走了。就在10天之前,在香港中文大学参加“首阳斋藏中国古代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见到周亚询问朝远病情,周亚就说朝远病情加重,时昏时醒,显得精疲力竭不愿说话,看来就在这几天了。因此听到这个消息,并不感到吃惊,只是神情恍惚,无所措手足,脑子里一阵一阵老是闪着朝远的形象,直到5月24日上海博物馆开朝远追思会,总觉得朝远没有走,朝远还和大家在一起……

我和朝远认识时间并不长,真正有交往还是从共



同筹备庆祝上海博物馆建馆五十周年在上博举办“晋国奇珍——山西晋侯墓群出土文物精品展”和“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学术研讨会”开始。朝远作为上博副馆长、青铜器专家自然是主角,北京大学和山西考古研究所是晋侯墓地发掘合作单位,山西省

文物局是主管单位,我作为晋侯墓地发掘的领队,张庆捷作为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为办好展览和研讨会免不了要常和朝远商量,有时还要向省文物局施联秀局长请示。

2002年以前,只有1964年乘火车去江西清江吴城遗址发掘在上海换车,到上海博物馆老馆门前转过一圈,基本上没有到过上海,而2002年为筹备展览和参加研讨会就去了两次。朝远对人热情、谦和、真诚是我一开始就感受到的,而在商谈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大度和换位思考、为别人着想更是我直接的亲身体会。当时,晋侯墓地出土资料正在整理,许多重要文物尚未发表,我担心在展览和研讨会上一下子都捅出去。朝远大概看出了我的犹豫,未等我开口,便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和庆捷说,考虑到晋侯墓地正式报告还未发表,这次展览只从已发表简报资料中挑选文物,当然为了有好的视觉效果,希望在印制展览图录时能将简报上的线图或黑白照片换成彩照,请予支持。其实我和庆捷心里知道,线图也好,黑白照片也好,都已公布于世了,为了读者看得更清楚,换成彩照岂不更好!朝远顾全大局的表态,使我的担心涣然冰释,很快便达成了一致。在上海博物馆历史上,在晋文化研究历史上,曾引起轰动和留下深远影响的这次展览和



中国共产党党员、文化部优秀专家、上海市领军人才、国内著名的青铜器研究和鉴定专家、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李朝远同志于2009年4月26日7时15分因病不幸逝世，享年56岁。

李朝远同志1953年出生于北京，1970年始于江西生产建设兵团二团八连务农。1976年调江西南昌铁路配件厂工作。1979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90年7月起在上海博物馆工作，曾任青铜器研究的专业研究人员，青铜器研究部副主任、主任，馆长学术秘书，副馆长，青铜器研究部研究员。兼任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上海文物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古文字学会理事、中国殷商文明研究会理事、上海历史学会理事等。

著有《西周土地关系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撰写并发表了《青铜器上所见西周中期的社会变迁》、《烟墩山墓青铜器的时代及其他》、《吴地青铜器未受商文化影响论》、《“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前身”说献疑》等先秦史学、中国青铜器学和古文字论文80余篇。他的这些学术成果处在该领域的前沿，被专家们认为是中国青铜器研究的方向。他勤奋敬业，学风严谨，思维敏捷，生命不息、笔耕不止，充分显示了其扎实的学术造诣、较高的理论素养、广博的学识水平，以及刻苦的敬业精神，是位得到社会广泛公认的该领域的学科带头人。



研讨会的顺利举行，朝远功不可没。从这件事情上，足可看到朝远作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的领导风范。

我佩服朝远的领导才能，也同样佩服朝远的学识和做学问的态度。在和朝远学术交往过程中，有三点是给我印象最深也最值得称道的：

首先是他的进取精神。朋友们都知道，朝远是华东师大著名历史学家吴泽教授的高足，他擅长的是先秦史学，这从他的大作《西周土地关系论》即可见一斑。当然，与文献史学关系十分密切的传统金石学也是他所熟习的领域，但从他的求学经历看，他对青铜器缺乏接触，更不要说考古学了。可是到上海博物馆工作以后，由于工作的需要，他知难而进，虚心向青铜器研究权威马承源馆长请教，向青铜部的同事们请教，很快就进入了角色，不但掌握了青铜器的一般知识，还熟习了研究方法，不仅包括传统金石学方法，还包括考古类型学方法，看朝远的《青铜器学步集》即可知道，从1991年至2006年查出患病，他发表了45篇研究文章（当然还不止此数，因为有些文章并未收入此书），这就是说，他除了繁忙的行政工作，每年平均要有3篇文章发表。这些文章中，有侧重铭文考证的，有侧重造型、花纹分析的，也有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研究铜器年代的。他的《试论殷墟一期的青铜器》一文，在分类基础上，再将铜器按体形特点分型，继而在同型之下按细部变化分式，居然在同墓所出铜器中分出早晚，最后并得出结论，认为“同一墓葬中的铜器组合，在组合形式上是符合礼制的，但参与组合的器有时并不一定非为同时之器不可”，推定墓葬年代，应以晚的铜器为准，“原认为属于一期诸墓的年代恐怕要稍稍推迟”，“基本上为殷墟一期的晚段”，“都应该是盘庚迁殷后的产物”。这是典型的考古类型学研究方法，没有经过科班考古训练和实践，一般难以掌握并作出正确论断，而朝远得心应手地做到了。他如果只是局限于自己擅长的文献史学，缺乏知难而进的进取精神，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不可能将文献史学、传统金石学和现代考古学三者融会贯通，写出这么多高质量的研究论文，跻身于著名青铜器专家行列中的。

第二点是他做学问能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所谓大处着眼，是说能从纷繁复杂的问题中抓住重要

的、关键的问题，例如铜器分期、用鼎制度、铜器反映的礼制等。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从一点一点收集资料、分析资料，进行各种统计、比较做起，只有这些看似琐细的工夫下到了，才可能水到渠成，迎刃而解，这就是所谓的小处着手。朝远的《青铜器学步集》中有一篇《晋侯青铜鼎探识》的文章，涉及的是晋侯墓地早晚排序、鼎的组合和用鼎制度等大的问题，但在其第三节却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比较M92和M1或M2出土的两件“鞞”鼎的异同。M92“鞞”鼎有耳，M1或M2出的“鞞”鼎无耳，这是我们大家都看得出的，但朝远却并不就此止步，他细致地比较了两者在造型、花纹、铸造技术、铭文字体及铭文内容的特点，认为“两件鞞鼎的造型、铭文字体和内容几乎完全相同，特别是“鞞”字在下均有一横，而其他器无，说明这两件出于不同墓的晋侯鞞鼎的铸造时间不会相距太久”，继而比较两者的历日，推出两者铸造的时间可能一是宣王十二年九月当月的第8天，一是宣王十三年二月当月的第10天，“相距5个月”。如果没有这么细致比较的小处着手，是很难发现其间的细微差别并作出上述论断的。

第三点是他不迷信权威，不囿于成说，敢于提出自己的新见解。唐兰先生是国内外著名学者，他在甲骨文、金文、青铜器研究领域贡献良多，他在西周铜器分期研究上提出的“康公原则”；他研究宗周钟（秬钟）时提出的秬即胡，厉王名胡，故秬即厉王的观点，影响深远，至今仍为不少学者所遵从。1978年秬簋、1981年五祀秬钟相继出土，最初均依唐兰先生秬即厉王之名的观点定为周厉王所作器。想不到的是，时隔半个世纪之后，朝远连续写出《“秬簋为厉王之器”说献疑》和《“五祀秬钟”新读》两篇文章，对依据唐说作出的两器均为厉王时所铸的说法提出商榷，认为两器均晚不到西周晚期，而应是西周中期晚段之物。唐兰先生当年写《周王秬钟考》单纯是依文字训诂通假立论，朝远的文章除铭辞考释，更重要的是兼及了器物形制、花纹、铭辞文例和形式排列的时代特点，因而就更具说服力。倘若唐兰先生地下有知，看到后学取得如此佳绩，也会高兴的。1976年江西新干修中棱水库时出土了5件铜器，《文物》1983年发表

简讯说是5件一套的列鼎，还附有一张比较模糊的照片。1979年，我撰写《我国南方几何形印纹陶遗存的分区、分期及其有关问题》一文时，没有深入研究，便依有列鼎5件的消息，想当然的将其说成是西周前期。1997年《中原文物》发表了朝远《青铜器上所见西周文化在南方影响的递衰》一文，提出定其为西周“颇有勉强之处”，但未引起我的注意，2001年在北京大学开“长江流域青铜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看了朝远进一步申论的文章《江西新干中楼青铜器的再认识》，我才重新作了思考，感到有问题，当他问我是否还是应该再早些时，我才说的确要早，我同意你的分析，但一直未能以正式论文的形式回应朝远的质疑，想起来这是颇为遗憾的。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但即此两例，已足以说明在朝远的脑子里只装着学术，而不迷信权威的观点、为固有的成说所困，文如其人，这正是作为学者的朝远的可贵之处，其实在我

看来，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正体现在朝远身上的这种不迷信权威、不固守成说，敢于提出自己新见解的创新精神。

朝远身上值得学习的优点当然还有很多，但从如何做学问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三点尤为重要，因为我体会这是做学问者应具备的方向、准则和基本态度，而且这三者是没有止境的，什么时候觉得自己行了，学问也就做到头了。我比朝远整整大16岁，怀念朝远，学习朝远，我暗暗告诫自己，决不可倚老卖老，固步自封，做学问要像朝远那样，发扬进取精神，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不迷信权威，不固守陈说，敢于提出自己新的见解。永葆学术青春，将自己贡献于祖国的学术事业。

朝远走了，但又没有走。走的是朝远的身体，没有走的是朝远的精神，朝远的精神永远和我们一起。■

留住时光 与你同在

撰文 / 李零

朝远走了，悄无声息，很有尊严地走了。

谢谢周亚，时刻同我联系，告我朝远的病情，让我多次去看他。

谢谢小马（马今洪），谢谢小徐（徐汝聪），谢谢你们陪伴朝远，谢谢你们告诉我，他是怎样度过人生的最后时光，非常坚强。

屏幕上的照片，据说是得病后拍的。他站在一片寒冷的背景中，还是那么精神。

我没有太多话好说，不知该从何说起，追思会上，语无伦次。

我只想说：朝远是我的朋友，也是大家的朋友。大家不会忘记你。

“朋友”二字太重要，对我太重要。

我没有兄弟，只有姐妹，父母已经不在，老师已经不在，我的“天地君亲师”，都不在了。社会也好，单位也好，对我来说，都不重要。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还是朋友。

我知道，早晚有一天，大树飘零，万木萧杀，我们都会相随而去。

早晚。

后面依旧是灿烂的春天。

朝远走了，留下两本书。最后这本，《青铜器学步集》，这两天拿出，重新读了一遍。这是我追思故人的最好方式。

2007年7月13日，我和罗泰到病房看朝远。他还好，看上去还好。

11月，收到他的书，简体排印，朝远觉得有点遗憾。

他在书前题了字：

敬呈李零：亦师亦兄亦友。朝远上，2007年10月30日。

“师”，我哪里敢当。“兄”，也不过虚长几岁。只

有最后的“友”字，我最看重，欣然受之，倍感荣幸。
“学步”两字太谦虚。

读他的书，你读到的不仅是学问，学问后面，还有人品。

你会发现一个“人”，他对所有同行，无论长幼尊卑，都抱着虚心求教的态度，不是出于礼数，而是出于真诚。他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哪怕一点一滴，他都不忘申谢，无论地位比他高，还是比他低，年龄比他大，还是比他小。周亚、慰祖、小马，还有我，还有其他很多人，大家的名字频频出现在书里。我很高兴，我是其中之一。

他的书，没有作者像。但我会觉得，有一双眼睛在看着你，像照片上一样，总是充满善意。他永远看到的都是别人的长处，即使商榷，也绝无恶言恶语。

读他的书，你能感受到他的为人，感受到他的心存厚道。

在这个“毁人不倦”的网络时代，在这个公众人物有如公共厕所的时代，厚道已经是一种古董。

古董当然很珍贵，就像他研究的青铜器一样。

“朋友”是什么意思？首先是平等。它意味着轻松愉快，它意味着赤诚相见。

我体会，朋友跟兄弟有点像，老师跟父母有点像。虽然，我已为人父母，还在学校当老师。但我一直找不到当父亲的感觉，也找不到当老师的感觉。

前两年，在美国，见一朋友。他在美国教汉语，教了很多年，有一学生坐对面。他跟他说，你知道吗？我们中国有句老话，“一日为师，终生父母”，老师，你要记住，永远都是你的老师，到哪儿都不能忘了。此生不语，眼神麻木。

我心想，在美国，哪有什么“终生父母”？别说“一日为师”，就是真正的父母又怎么样？顶多十来年而已。

朋友不一样，我有些朋友，倒是终生为友，打幼儿园就是。哪怕几年不见面，依然肝胆相照，无言的尊重。

人这一生，真正能够像兄弟相处，平等相待，并不容易。小人永远站不直，不是点头哈腰，就是蹬鼻子上脸。他并不需要平等，也不理解平等，你跟

他客气，他觉得可欺，你跟他讲心里话，他觉得你犯傻。他不知道，人与人还能平等相待。

我和朝远相识，是因为整理上博楚简。

1994年底，我受我的老师王世民先生委托，要我到上海帮马承源先生做事。那时，上海博物馆的新馆正在兴建，只有毛坯。小马来接我，还在龙吴路。

1995年1—7月，在北京，剪贴复印件，写第一遍释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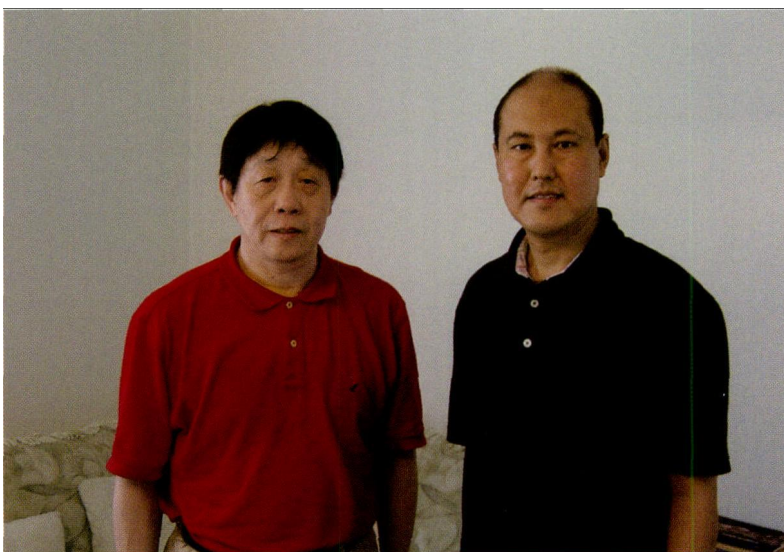
1995年12月到1996年3月，在上海，剪贴照片，写第二遍释文。

第二次整理，最难忘。我还记得，1996年的春节，没回家，龙漕路的招待所，四处全是鞭炮声，我仍伏案工作。我很累，眼睛很累。

整理竹简，对我来说，最大收获，不是竹简，而是朝远。有此机缘，我认识了朝远，认识了上博青铜部的一帮弟兄和朋友。

新馆的顶楼，七八张大桌子排一块儿，整个青铜部，说干就干，大家都来帮我，朝远很忙，也来帮我，很多疏通联络的工作都要靠他来做。没有他的协调，这批竹简是不可能和大家见面的。

这是一个团体，一个朝气蓬勃善于协作的团体，一个让我们这些好讲“哥们儿义气”的北京人感到惭愧的团体。我跟他们，天天见面，吃能吃到一起，玩能玩到一起，聊能聊到一起，干能干到一起，工作效



李朝远与李零在上海兴国路寓所（2008年6月17日马今洪摄）

率极高。天底下还有什么比这更快乐吗？

临走，我们一起吃了饭，在上博的门口，在上博的楼顶，和每个人一一合影。

照片还在，定格于那一刻。

有一天，上博楚简终于公布。2001年12月11日，《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一册的首发式在上海博物馆举行。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座谈会上，朝远，只有朝远，提到了我的名字。他曾不止一次跟我说，只要他在，他会努力，上博不会忘记我。

我们曾多次通信，他有一封信还留在我的手边。信是写于2002年6月10日。他把2001年12月12日这一天的三份报道，《解放日报》、《劳动报》和《文汇报》的报道，一块儿寄给我。他跟我说：

对于先生在竹简整理中的贡献，我总觉得未能说透，这样有失公允，也有违学术道德和规范。

朝远的话，让我铭感终生。

古人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话很有名，号称“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但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忘记的是立德立功的那个活生生的“人”，而记住的是他的“书”。如果没有书，大家就把他忘了。

古人不是这样理解“书”，更不是这样理解“人”。

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

司马迁说，“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史记·孔子世家》）。

知人论世，对于读书很重要。

我是从朝远这个“人”读他的书，从活着的朝远读他的书。

后人没这个福份。

朝远的书，是他服务于上海博物馆16年间的学术记录，青铜器研究的方方面面，他都有所涉及。不但涉及他一向关注的社会史问题，也涉及青铜器的铸造工艺、艺术风格和铭文考证，还有评论，时间跨度很大，空间跨度很大。这些文章，最早写于1991年，最晚写于2006年，结集是在2006年的最后一天，很多是写于新世纪，特别是2004—2006年。这个集子，

是他在病中编的，很有纪念意义。

朝远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召鼎诸铭文拓片之比勘》，登在《上海文博》2009年1期。文章写于4月14日，距离他走只有12天。这是他的绝笔之作。读之，令人凄然。

说来惭愧，当年我跟张政烺先生读书，所学专业即殷周铜器。多年来，心猿意马，不能集中精力于一处。唯其如此，我才特别希望与同好有求教请益的机会。我从他的书里学到很多东西，从跟他的谈话学到很多东西。最近在香港参加首阳吉金的讨论会，我还引用过他论青铜镜的文章。

1995年后，承他邀请，我曾多次去上博，看展览，做报告，参加各种活动。

读他的书，我会想起这十多年的往事，从他的旧宅（我是在那里第一次见到小昕）到他的新居、到他的办公室，一幕接一幕。我记得，2006年9月，上海博物馆展出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亚述画像石，朝远要我配合展览，到馆作报告，题目是《用中国眼睛看亚述壁画——从军事角度和艺术角度》。下班，他请我吃日本餐，在人民广场附近。我们喝清酒，上下古今，什么都谈。当时，我们讨论过两周青铜器中的一种小盒子。我说，2004年，在小邾国的讨论会上，我曾提出，这种放玉器的小盒子是古代妇女的首饰盒，学术界叫法很乱，其实应该叫“匱”或“桱”。他提醒我，前不久，陈昭容先生给他一篇文章，正好也讨论这一问题。后来，他把陈先生的文章寄给我，参考陈文，我对这一问题做了新的补充和研究。这是他生病前的最后一面。

现在，我论匱的文章马上就要在故宫博物院的院刊印出来了，很想听听朝远的意见，可是他却不在了。

朝远的书，最后有个短跋，让人伤感。

他说，三十多年来，他一直喜欢两句话：

飞矢不动（芝诺）。

我思故我在（笛卡尔）。

时间过得真快，像飞矢一样，朝远已经不在。

但是打开他的书，往事又会扑面而来，好像就在昨天。

2009年5月26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怀念朝远同志

撰文 / 刘庆柱

前不久从外地出差回京，看到上海博物馆发来的关于朝远同志病逝的讣告，心情十分沉重。朝远同志患病已有一段时间，原来计划今年6月下旬去上海讲课时，我去看望他。但是我怎么也想不到，朝远同志走得这么快！

前些年，在外面开会多与朝远同志见面，他的低调与谦逊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在我的眼中一直是位学者，在他身上我丝毫看不到国内大馆（上海博物馆）的馆长气派；作为一名国内颇有学术造诣的中年专家，他又很少以专家自居。

朝远同志在世时，我有一件心事一直想与他谈，因为我总是觉得那件事办的不尽如人意，尤其是我觉得对不起朝远同志，我更感谢他对我支持。因此，朝远同志虽然已经走了，但是我还想说出来，让他在另一个世界知道，他的朋友在怀念着他！

几年前，上海文化界朋友想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协商在上海举办一个考古发掘出土青铜器展览，当时考古所具体负责此项工作的杜金鹏同志找我，希望我与国家文物局、上海博物馆有关领导谈谈此事，以便得到他们的同意。我与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董宝华同志谈及此事，得到他的认同。又与朝远同志商量，希望得到他的理解、谅解和支持。朝远同志爽快的答应了我。我知道这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难题，他还要做上海博物馆的工作，但是他怕我为难，自己承担了这个责任，我当时十分感动。尽管这个展览，由于各种原因没有举办，作为朋友、同行的朝远同志，他的坦诚、仗义使我一直铭记在心。

后来，朝远同志与我开会时谈及近年来夏商时代的田野考古收获，他对社科院考古所这方面的工作倍加称赞。当说到上次考古所拟在上海举办的那次青铜器展览没有做成时，他对我一再表示歉疚之意。其实此事与他毫无关系，而且如前所述，他还给了我很大

帮助。但是他却把那件事一直放在心中，还我们上次要在上海举办青铜器展览而未成之愿。他与我谈，上海博物馆想争取一些经费，办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时代考古出土青铜器展览，举办展览同时再召开有关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内容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对宣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科研成果、促进国内外学术界交流都是有益的。朝远同志想得很周到，他说：社科院考古所的同志在上海开展考古工作很少，大多数人来上海出差机会不多，近年来上海变化很大，展览期间让更多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同志到上海来看一看、走一走，经费由上海博物馆负担。如果再有可能的话，能够给考古所再多争取一些展览经费。我听他说了这些以后，十分感动。朝远同志的这个建议，虽然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没有办成，但是我对他一直心怀感激之情。

我上面回忆的过去与朝远同志交往中的一件小事，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为人之忠厚。这正是朝远同志最让我深深怀念的地方！安息吧，朝远同志！

于2009年5月29日



刘庆柱与李朝远共同主持研讨会

难忘蜀汉之行

撰文 / 曹玮

朝远先生是中国著名的博物馆学家、青铜器专家，为人谦和、率真，平易近人；在学问上不断追求上进，精益求精。

朝远很早就对汉中出土的青铜器极为关注，而且有很深的造诣。2006年，汉中市文物局以及考古队的左汤泉队长邀我为汉中市做一套有关汉中铜器的礼品书。筹划之后，我约朝远撰写一篇研究汉中铜器的文章，他欣然同意，提出想去汉中实地考察一下。汉中自古属四川，直到明代怕川军隔秦岭对峙，才划归陕西管辖。所以，要深入了解汉中出土的铜器，必须了解三星堆的铜器，更有必要了解这两地之间的关系。我提出沿着古代的道路实地走一下，亲身体会这一路的关隘沟坎。从褒斜道穿越秦岭到汉中，然后沿金牛道入川。朝远听了后特别高兴。

2006年5月，和朝远以及美国盖地茨堡大学的孙岩女士约好，一同前往汉中。24日早上，三人早上在翠华路李老三回民店吃了早饭。这是西安名小吃，尤其是牛肉夹馍深受欢迎。自从我介绍给朝远后，深受他的喜爱，每到西安必来此品尝。早饭后，乘车从西安出发，沿着西宝高速，前往汉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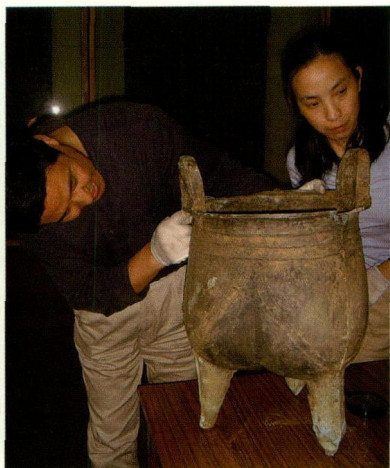
自古以来，翻越秦岭有四条路，由东往西分别为子午道、灊洛道、褒斜道、陈仓道。车从眉县沿着褒

斜道进入秦岭，道路蜿蜒起伏，山中覆盖着参天树木，绿绿葱葱；山间云雾缭绕，使人心旷神怡。一路上，朝远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从汉中铜器说到三星堆，又谈到盘龙城，话比平时要多些，显得很兴奋。中午1点多，到达石门水库，在司机的建议下，一起去褒河水库旁吃饭。过了下午3点，汉中市考古队的左队长赶来，和我们一道，前往汉中市。一进入汉中市，首先是古褒城县城旧址，相传古褒国就建在这里。先秦史书记周幽王宠爱褒姒而失国，使褒国名声大振。褒城为汉代建县，一直延续下来。直到1964年，将褒城县一分为四——勉县、留坝县、南郑县、汉中市各占一份，褒城不复存在。直到最近，又设褒城镇，才算保留了一点古代的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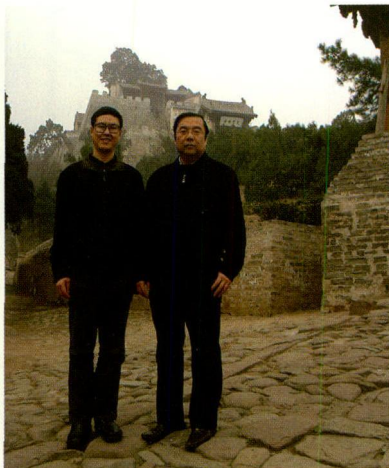
古褒国旧址坐落在现河东店镇的一个台地上，我和朝远等人到达这里时，已过了下午5点。平坦的田地里，并没有什么遗存，正值收菜籽季节，地里没什么作物。我们沿着地边和田垄来回跑了几圈，只捡了几片汉代以后的陶片。过去我一直有个猜测：汉中铜器能否与古褒国联系在一起，一个直接的理由就是这个台地距出土铜器地方的直线距离只有20余公里，这么短的距离不可能存在两个国家，现在看来有些失望。推测古褒国很有可能是汉以后迁至此地，在此之



李朝远于古褒国旧址（2006年5月25日）



李朝远与孙岩在城固博物馆观摩铜器



李朝远与曹玮拜谒司马迁墓（2006年3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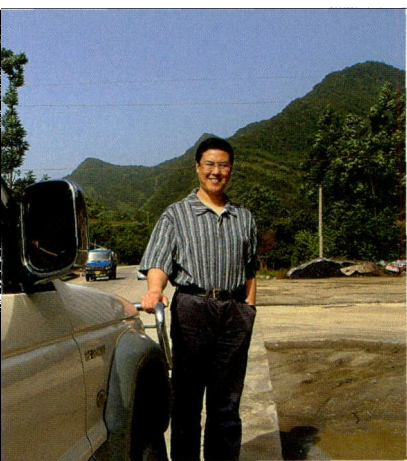
前居于渭水和汉水交汇处。这一想法还需材料证明。

台地上，当地农民正在为菜籽脱壳，用连枷打菜籽的场面深深地吸引了朝远。朝远兴致勃勃地从打场农民手里接过连枷自己打了起来，直到尽兴才放手。

次日早晨，在汉中市考古队左汤泉队长的陪同下，我们前往洋县文物博物馆。当天天气晴好，公路靠着渭水河向东延伸。渭水河缓缓地流淌，当我们驱车到距河较近的地方，朝远提出下来看看河流的走向与地形。实地考察，是欧洲古典实证主义史学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提倡到当地深入了解事件发生的环境背景。这也是当今考古学所崇尚的方法之一，但起了个中国的名字，叫做望气。一路上，围绕着汉中铜器的出土不断地说着，走了约2个小时，到了洋县文物博物馆。博物馆坐落在县中心，因为房屋紧张，没有正规的库房，只是用职工居住楼的顶层房屋作为库房使用。虽说是5月底，但库房里非常热。这里收藏的文物、尤其是商代青铜器，非常具有特色。此时，朝远也忘记了周围的温度，带起手套，开始仔细观察每一件铜器。形制的区别、纹饰的差异、铸造的工艺，每一个细小的痕迹都不放过。不时地还让我和孙岩看看，检验他是否看错了。下午在城固县文化馆观摩，朝远依然如此认真，容器、兵器、礼仪器物，边看边记，一一过手。当我们离开城固的时候，已过晚上9点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告别了汉中，继续驱车南下。从汉中盆地入川，自古有三条路，从东到西分别是：荔枝道、米仓道和金牛道。金牛道又称剑阁道，是沿

着勉县、广元、剑阁、广汉，进入成都。现在的高速路也是按着这条线通往成都的。路上，风景宜人，朝远很激动，不时打开车窗，向外远眺；不时让停车，下来看看周围，还建议我再亲自走一下剑门关。中午，到达三星堆博物馆。



李朝远于巴山中（2006年5月27日）

三星堆文化的发现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认识这种文化当是80年代大规模的考古发掘，而引起轰动的则是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的发现。这个祭祀坑出土的器物，引起了我们今人对古蜀国的探讨，也带来了对那个时代的无限遐想。她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一朵奇葩，为丰富的古代文明又添上了艳丽的一笔。但自发现以来，对祭祀坑年代的争论每每有之。尤其是上海博物馆的学者，从铜器的形制、纹饰，特别是铸造工艺上判断，较其他学者判断年代要晚些。

朝远所持的观点是要晚于商代，他仔细观察铜器上的铸造痕迹和切割痕迹，指出头像上的许多方孔许多痕迹是用铤做出来的，这种工艺要晚于商代。过去多次看过三星堆的铜器，也有同样的感觉。这次再仔细观察，我也与朝远有相同的看法，认为不仅是铸造工艺上可以判断时代要晚些，祭祀坑某些器物的形制，如铃的时代要晚于商代。同时加强了我过去的一个想法，认为祭祀坑中有外来因素，很可能有西亚的因素，如金质手杖。

第二天，我们又赶到金沙博物馆。金沙博物馆正忙着开馆，朱章义副馆长、王芳主任接待了我们。他们从开始就参加了金沙遗址的发掘，非常熟悉金沙遗址出土的器物；加之又都是老朋友了，自然又围绕着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关系、年代等问题讨论起来。下午，去巴蜀书社，段志洪社长接待了我们，她是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赵光贤先生指导的博士，一个非常典型的四川女人，个子不高，但能吃苦耐劳，干练、豁达。热情的社长送了我们巴蜀书社出版的书，晚上还请我们观看川剧。我、朝远和孙岩都是第一次看川剧，虽说有些话听不懂，但面对优美的川腔川调，还都看得津津有味。

28日早上吃了早饭，大家准备分手了，孙岩飞北京，朝远去上海，我回西安。临走时，朝远似乎有点动感情，恋恋不舍，非常感谢我安排这次考察。我告诉他说，以后还有这样考察的机会。因为我正准备整理陕北出土的铜器，如果他有时间的话，还准备邀请他去陕北。朝远听了以后欣然接受了邀请。客气的朝远，回到上海后，又打电话来，再次感谢这次安排，说他受益匪浅，愿陕北之行早日行成。

没想到这年的年底，朝远在体检中竟查出疾病。给我打电话时，我不敢相信。做完手术，他养了一段时间就因工作去美国了。没想到时间不长回到上海，住进了华山医院。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和李零、罗泰商量着去上海看朝远。朝远在病床上，见到我们还说到这次难忘的蜀汉之行。朝远说他想去陕北看看，李

零说他也没去过，与朝远约好，等他病好了一同去陕北考察。我在旁边安慰着他，看着他的样子，想到他的病，眼泪一个劲的往心里流。

现在朝远真的离我们而去，但这些天当我看到《汉中出土商代青铜器》这套书时，会深深地陷入对朝远的思念之中。■

悼朝远

撰文 / 冯时

正史匡经，问业寻钟鼎款识；

积诚避伪，修身道质文中庸。

这是我得知朝远殁谢后撰写的一幅挽联，没有写就寄出，时间记在2009年4月26日的傍晚。

朝远俊兄走了……

尽管他罹患笃疾已经年有月，但对我来说，朝远的离去仍然显得那么突然，以致这一噩耗传来，竟使我心上仿佛猛地承受了沉重的撞击，久久透不过气来。

今年的4月中还曾向周亚、今洪二兄询问朝远的病情，他们告我很不好。没想到这不幸在一周之后就变成了现实。徘徊缠绵，悵悵惓惓，念我茕茕，魂谁求兮！

或许我太过悲情，在朝远医病期间，我甚至没有勇气面对于他。朝远正值英年，这样才情横溢的儒者本不该染此恶痼，我深怕我的惋怆之色与哀戚之容会情不自禁地流露，从而影响到他本已沉重的心境。

去年暑期赴上海博物馆观摩，本计划抽时间去朝远府上探望，但朝远却怕大家长途劳顿，竟冒着酷热，拖着病体，专程到馆里看望大家。憩间谈笑风生，看得出他很高兴，也看得出他很疲弱。他对每一位师友满怀感激，一一道谢，其无畏生死，笑对人生的超然之态，令在座的我们无不肃然起敬。临别时，我将未曾送他指正的旧作奉赠给他，我们紧紧且久久地握手，我祈盼他康复，心中充满着不舍。终于，这还是成了我们的永诀！

汝聪友在前日给我的信中写道：“记得去年七月朝



李朝远与王世民、冯时、周亚先生在上海博物馆贵宾室
(2008年7月10日徐汝聪摄)

远馆长与诸先生在贵宾室见面，他告别时，我听见您一声长叹。后来我和朝远说起时，他也同样是一声长叹，而且叹得何其相似……”读到这里，不禁泪下。

我所认识的朝远是一位真挚热情的博雅君子。做人他品德高洁，为学他严谨求实。《礼记·乐记》有言云“著诚去伪”，在我看来，这四个字最能概括他一生为人、为学的精神。朝远待人待友以诚，没有老于世故的圆滑；问学求知以诚，不事趋时附势的迎合。他志气纵横，见识独到，执志守度，刚简不随。这种真学人的真性情时时在我心中萦回，令人隐恨伤逝。

朝远与我的竹林之谊，常有得意而忘言的默契。他高才远猷，初虽不识，一与相遇，便为神交。我们时就彼此关心的问题切磋琢磨，同心莫逆，意气投合。朝远去矣，我痛丧一位砥砺学术的益友，学术界更失去一位德才兼备的真人。呜呼！感今怀昔，含忧惜诵，唯愿祷祈天佑，追奉冥福，寄情此文，铭藏对朝远的无限怀念……

2009年5月30日夜■

追忆李朝远先生

撰文 / 陈松长

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李朝远先生是与我相交最久,也最投缘的挚友之一。我们虽然相隔千里,见面的机会不多,但多年来我们经常有电话或短信联系。今年春节期间,我发短信给他拜年,他还很迅速地回信,以其回信的速度,我感觉他的身体状况应该没有大碍,因此我还一直相信,以他超人的意志和毅力,是一定会战胜病魔的。但现实竟是这么残酷,无情地剥夺了他的生命,使我失去了一位最投缘的朋友,使学术界,特别是青铜器研究队伍中失去了一位正值盛年,学养丰厚的学术带头人。

李朝远先生是青铜器和古文字研究的专家,由于对古文字研究的共同关注,使我们有了相识的机缘。记得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93年,当时我作为湖南省博物馆的一位年轻的学者,应邀参加了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研讨会》。这可是我一个人第一次出境参加这种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一切都很陌生,与会的学者大都来自高校,当时都不太熟,因此也没几个可以交流的朋友。在这种状况下,也许是我们都来自博物馆,也许是我们的年龄相对还比较接近,所以我们一见如故,交谈的话题从古文字研究到博物馆的藏品和工作,谈起来非常投缘,这样,短短的几天会议期间,我们成了朝夕相处的同伴,我们曾一起在香港中文大学校园内散步聊天,会后我们还结伴一起从罗湖海关过境回国,从此结下了不解的兄弟情谊。

朝远先生的学术关注其实远不止青铜器与古文字,记得就在那次会上,曾有学者向我提问有关马王堆帛书的整理情况,这并不是会议讨论的内容,所以我在会上只是简单地作了些解答而已。会后,朝远先生专门找到我,详细询问了解有关马王堆帛书的整理保存状况。我当时很惊讶,没想到他对马王堆帛书的整理研究也会很关注。但他很淡定地说,马王堆帛书是极重要的出土文献,作历史研究和古文字研究的学者都

应该关注呀。我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是华东师大历史系毕业的博士,是著名历史学家吴泽先生的高足。难怪他的学术关注比一般的古文字学者要广泛得多。

由于我们馆际之间的关系,我们经常有工作上见面的机会,朝远先生给我感受最深的是他对学术研究的严谨认真,追求不舍,对朋友的热情诚恳,始终如一。

先说他对学术的追求。我对青铜器研究本来是外行,但从外行的角度来观察,也许某些细节更能说明一个人的学术追求的程度和学术品位的高低。

记得还是在上海博物馆老馆青铜部的办公室,我当时去看他,他正在专注地作青铜器拓片。我当时还调侃地说,你这位大博士还亲自打拓片。可他却很认真地说:嘿,这是作青铜器研究的基本功,原来在大学没有实际操作的机会,这里既有大量的青铜器原件,又有现成的青铜器拓片老师傅,正好补上这一课。我知道,作拓片是一种技术活,从事青铜器研究的学者并不一定要亲自去掌握这门技术,但如果青铜器研究者自己能掌握这门技术,那对青铜器的研究,对青铜拓片的理解和鉴定都大有帮助。朝远先生虽是博士,但他就是能放下身段,从最基本的技术活干起,可见其对学术研究的追求是很执着而有远见的。也许正因为有这种学术上的执着追求,朝远先生在青铜器的研究上,一步一个脚印,迅速取得了骄人的学术成就。2008年,他在病中给我寄来他的学术专著《青铜器学步集》,尽管他自谦地将其取名为“学步集”,但其研究成果的学术分量,是每一个打开此书的人都会深切感受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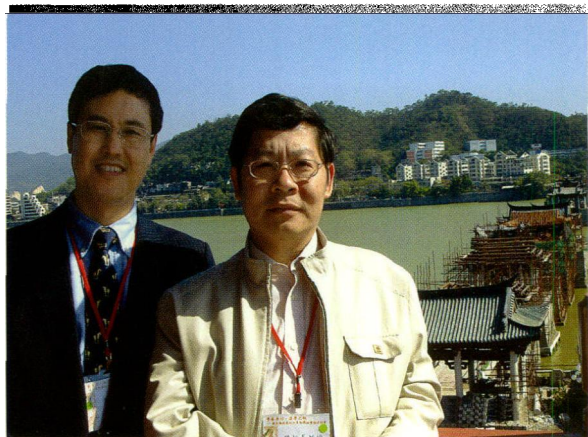
2008年10月,我在复旦大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其间和刘乐贤一起去看望朝远先生,当时我们也不知道该带什么东西去看他,我就带了一本自己刚出版的论文集。当我们进屋时,他斜躺在床上打吊针,一看到我们,一定要坚持坐起来说话,当接过我的书时还

一脸真诚的笑容，连声说要好好拜读，好好拜读。我们说你现在养病为重，学术就先放下吧，可他却说，还真只有学术的关注和阅读能忘记病痛。这虽是一句闲聊的话语，但却多少真实地反映了朝远先生的学术追求与令人感动的执着。

朝远先生在学术上孜孜以求，但在生活上却非常朴素。我曾记得他任副馆长很多年了，还一直提着一个在香港参加学术会议时发的一个手提皮袋，连提柄和翻盖都磨白了，但他浑然不觉。我曾笑他怎么这么简朴，他浅浅一笑说，这包好用，习惯了，外表不好看不要紧。这种骨子里的朴素实在是令人感佩。

在休闲娱乐方面，他就显得“落伍”了。记得在2006年下半年，他曾率队来长沙考察湖南青铜器的出土地点，同时筹备在湖南举行的青铜器研究会，我去宾馆看他，在叙谈之后，我提议请他去做足底按摩。他竟然说从没做过。我说在长沙这是一种很普及的休闲活动，你就放松一下吧，好歹才请动他去尝试了一下。我并不太清楚朝远先生在上海是怎样安排业余生活的，但他连足底按摩都没做过，这多少令人惊讶，特别是令我这个生活在长沙的朋友感到十分的意外。

朝远先生把一生的精力都投注在工作和学术研究上，成绩卓著，为世人瞩目，但他对朋友却从不吝啬时间。在为人待物方面，诚恳热情，始终如一，是最可信赖的朋友。我每次去上海，去上海博物馆，他无论怎么忙，都要抽空跟我见面叙谈，特别是在2003年6月初，我从法国巴黎访学回国，途径上海，他说安排人来接我。我原以为是他安排馆里的司机来接我，可一出机场，看到他在向我招手。我忙说，你怎么亲自来机场，他笑着说，都下班了，司机也很辛苦，我自



李朝远与陈松长在“饶宗颐教授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

己来省事。同时还风趣地说，我这车比较旧，是辆老式吉普，你就委屈一下啰。然后亲自驾车，将我接送到宾馆，当他将我安顿好以后回家时，已经很晚了，我说，谢谢你，又耗掉你一个晚上的宝贵时间。他连连说，哪里哪里，你难得来，不要客气。朴实得让人感动，而这也正是他让人信赖和感佩的所在。

2007年5月，我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系访问期间，不慎出现胃出血，好几天在住处卧床休息，其间竟意外地接到朝远先生从纽约打来的电话。他说他刚来美国，听说我身体不适，特来电话问候，电话里还反复叮嘱我要注意身体，特别是在国外，更要小心。我真是从心底里感谢他的电话，在异国他乡，又在病中，能接到朋友的来电，感到特别的温暖和亲切。我当时还问他的身体情况，他说手术后恢复得很好，没什么问题，所以才来美国。我当时还真为他高兴。可万万没想到的是，我6月份回国后不久，就听说他在美国时又发病情，回国后又处于与病魔的搏斗之中。真是世事难料，天命难违！

今天，朝远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我们确信：他的学术成就，他的精神品格将永远不会离开。

2009年6月2日深夜记于长沙

道德文章李朝远

撰文 / 吉琨璋

朝远兄走了，周一一上班，宋建忠就告诉我这个噩耗，他接着说“生活就是这样，我们熟悉的人一个个离去”，能感觉到他的心情很沉重。心里一天都不是

滋味，坐在去晋南的火车上发呆。大约是前年听到朝远兄罹患绝症的消息，当时心里就怪怪的，一方面为他祈祷，祝他早日康复，一方面担心这一天的到来，没

想到这一天真来了，而且还来的这样快！此前曾不时向周亚等朋友打听他的康复情况，当听到“还不错”回答时，心里也略感欣慰，今年春节，我给他发去祝福拜年的手机短信，他回复了，“谢谢琨璋，同样祝您和家人新年好”。今年，我们举办“纪念曲村——天马遗址发掘三十周年暨晋文化论坛”学术研讨会，还专帖邀请他参加，他是所有被邀的专家学者中第一个回复信息的，是他托人打过来的电话，申明由于身体的原因不能参加，希望我们理解，也许，这个时候正是他最艰难时期，与病魔较量的最紧要关头，但仍不失礼。

我与朝远兄交往不长，真正在一起的时候不多，但仅仅几次接触，我觉得他是个谦谦君子。

2002年夏，上海博物馆组织了山西曲沃曲村——天马遗址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展览，我代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随展，并参加展览结束后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初识朝远兄，他时任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黑明的眸子透着深邃，精明强干，儒雅淳淳，短短的接触，为他的谦恭、敦厚和深厚的学养折服。

其后，在2003年科学出版社组织的“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传播学术研讨会”和2006年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组织的“青铜工业与早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等会议上，我们陆续有过几次接触，每一次接触和交往，对他那君子风范的感受就深一分。子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今天，朝远兄正是以自己的智慧践行着圣人的训示。

2005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发掘绛县横水西周墓

地，我主持佣伯夫人毕姬墓的发掘，该墓最大的亮点是首次出土文献中的“荒纬”，我们曾邀请国内相关的专家学者到工地现场观摩，并座谈，朝远兄也应邀前来，同来的还有周亚，他们下到深达17米的墓底，仔细观察了出土的青铜器和荒纬，并毫无保留的提供了自己对墓葬时代、性质的意见，并一再叮咛有关青铜器的保护方面知识要点。

2007年12月，我接到他寄来的《青铜器学步集》，想必很多他的朋友都收到他的赠书，仅观书名，“学步”一词让人感动，在他的学术文集后面有一篇短短的跋，一百六七十字，字里行间能感受到朝远兄对生命的眷恋和洒脱，也能看出他对生命过程清楚的认识和感悟，也道出他对生活的感恩之情，其实，他也一直在用行动诠释着生命的真正意义。在赠我的书扉页有他的赠语和落款签名，字如其人，字体端庄、飘逸，但不失刚劲，能想象到，在该书辑订刊印的时候，他已经患病，也许是感到自己可能长病不起，因而抱病工作，将自己以往的治学经历作以小结，对国家、对学界、对朋友、对自己都有个交代，可谓仁也。古人认为，作为一个君子一生能做到立德，立功，立言，可谓不朽。朝远兄以一介读书人行于当世，做人谦谦，为德穆穆，于工作兢兢业业，于学术锲而不舍并有所成，可添不朽之列吧！

朝远兄，一路走好，愿江上之清风和山间之明月与你为伴，取其声，采其色，与之交融，永为一体，直到永恒！

2009年4月29日记于侯马■

忆朝远先生

撰文／刘绪

初识朝远先生不是当面，而是他的第一本专著——《西周土地关系论》，那是上世纪90年代中。由于自己长期从事西周时期田野考古发掘，故而对有关周代的论著比较关注，这方面除了泛泛的通史和零散的论文外，专门性的研究著作还真不多。所以当

看到《西周土地关系论》时，便毫不犹豫断然买下。

从此对朝远先生的学术背景、治学精神与研究成果有了一些了解，也成为我印象里“学者文库”中的重要成员，每遇先生新作，必仔细研读。

后来，由于想判定晋侯墓地1、2号墓的盗掘时

间，我很冒昧地给未曾谋面的朝远先生写了一封信，以了解上海博物馆收藏晋侯诸铜器的具体时间。朝远先生给了我满意的回复。

初次见面是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已记不清是何年何月了，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表人才、年轻干练、热情随和，加之对其已有学术成就的了解，以为前途无量。

再后来，于多次学术研讨会上见面，包括在上博召开的“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究会”，这

次会上，朝远先生作为东道主，给大家以热情接待，当时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是学术拉近了彼此的距离，由于朝远先生在学术研究，特别是青铜器研究上的贡献，使他在文物考古界的学术圈内有不少朋友。所以，当得知他患病后，大家都很震惊和惋惜。每当遇到从上海来的同行，总要询问一下他的病情和疗效。无奈，获得的消息与良好的愿望总是相去甚远，最后留下的是永久的叹息和思念！■

从滕县博物馆藏《不其簋》说起

撰文 / 陈昭容

不其簋是一件传世青铜器，只存盖子，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器身早已不知去向。盖内有150字长铭，内容描述周王派遣“伯氏”去攻打西北方的少数民族獫狁，“伯氏”出征得胜，又命“不其”乘胜追击，大有战功，“不其”受到“伯氏”赏赐，于是作这件青铜器纪念他的“皇祖公伯、孟姬”。李学勤跟王辉先生都作了很好的研究，指出这篇铭文是周宣王命秦庄公（名“其”）与西北戎人战争的历史纪录，是西周晚期很重要的青铜器，也是秦国早期历史的重要文献。

1980年山东滕县后荆沟发掘一座春秋早期墓葬，出土了一件簋，器身内底有铭文，与传世的不其簋盖铭文一样，纹饰相同，器口径与传世的不其簋盖口径都是23.2厘米，完全可以密合，显然这是同一件器的器身与器盖，不知何时分离了。出土的不其簋器身后配了一个盖子，所以盖的纹饰与器身纹饰很不一样。同时墓中还有一件仿制的簋，器形纹饰都和同墓出土的不其簋相同，器盖俱全，搭配入葬。

不其簋的器身与盖，失散多年，重见天日，尤其是这么重要的器物，其中定有故事！我们不禁好奇，西周晚期秦人的活动地域主要在甘陕地区，秦人的器物为什么会后配一个盖子，当作陪葬品葬在春秋早期山东地区的墓葬中？关注秦国文字多年，这个问题始

终萦绕心头，百思不解。

偶然间看到李学勤先生的文章《夏商周与山东》（《烟台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谈到滕县后荆沟这件另配盖子的不其簋，其实盖上有铭文（这是早先都不知道的），铭文提到当地的国君娶了周王女儿为妻。李先生推测：秦武公钟铭文记载秦武公娶了周王的女儿“王姬”，有可能是秦武公与这里的国君是连襟，因为这样的亲戚关系，青铜器就有可能当作贵重的礼物馈赠，于是“秦武公祖先的青铜器不其簋就来到了山东，配了盖，铸了字，还配了另一套簋，最后又作为重器随葬，于是有了1980年后荆沟两套簋的出土”。

这实在太令人高兴了，多年的疑问终于有了说法。大家都知道，周王室制作的青铜器并不多，记录周王室女子婚嫁关系的信息更是少之又少。青铜器中仅有秦武公钟纪录秦武公娶王姬一个例子。春秋早期山东地区娶王室女儿为妻，文献记载也仅有齐襄公与齐桓公两例（见《左传》鲁庄公元年、十一年）。

这件滕县后荆沟出土的不其簋器身后配的盖子上，铭文究竟是甚么？更是让人好奇了。

什么时候与朝远认识，常常互相交换研究信息，时间久远，已经记不得了。印象中最深刻的一次是2000年初冬。那时我正忙着修改博士论文，其中一章，讨论甘肃礼县大堡子山被盗大墓出土的器物及墓主。

当时相关报导很多，信息却有点混乱。我因论文胶着，困坐研究室，十分苦恼。为了厘清这个问题，我有幸参加陕西考古所组织的考察团，走了一趟甘肃礼县，其后又去兰州甘肃省博物馆参观礼县出土文物，最后回到上海，看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藏的礼县出土秦公诸器。这一趟路程遥远，气候不佳，雨雪泥泞，经过十多天密集的参观旅行，已经很累了。带着满身疲惫和旅尘，我走进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李朝远先生的办公室。迎面而来的，正是朝远那满脸的笑容。倒杯水，坐下来，我们交换手边的信息、计算机中的文件，也交换对这一批文物的看法，欢喜相谈，直到傍晚大家都下班了，才出去吃饭。那时朝远是副馆长，写过多篇秦文字研究的脍炙人口的好文章，他早就是这方面的专家了。但是他毫不摆架子，也从不留私，开心的分享，让人觉得好温暖。

此后，上海就成了我进入大陆的起点，不论去哪儿，总先到上博报到，看看朝远和青铜部的朋友们；回台北前，也总要再去展馆走走，和大家说声再见，才算完成旅行。朝远不管多忙，永远无私地分享，热情的接待（如他说的“迎来送往”）。这样的经验，大概很多同行朋友都感受到。话题总是环绕着青铜器，朝远有丰富的实务经验，总是很有见解，侃侃而谈，相较之下，我的研究很像纸上谈兵，虚浮不切实。起先，是奉上已发表的文章，互相客气请教，慢慢地，就成了交换未发表的稿子，互相严厉批评，而且拿到稿子都一定要先“冥顽抵抗一下”，朝远总说我们是“诤友”。

2006年6月，我正在收集整理青铜器中有关各国婚姻往来的资料，又想起滕县后荆沟那个让人好奇的盖子。就像往常一样，我向朝远提起这件事，问他有没有相关信息。他说要查一查。到了7月底，有一天电话联系，朝远说8月初要去山东开会，我说“太好了，可不可以顺便去滕州看看那个盖子啊？好想知道上面写些什么？”于是，朝远跟滕县博物馆联系，并在开会之前提早一天去滕州，去看了“那个盖子”。以下是2006年8月12日，朝远从山东开完会回到上海，寄来的电子邮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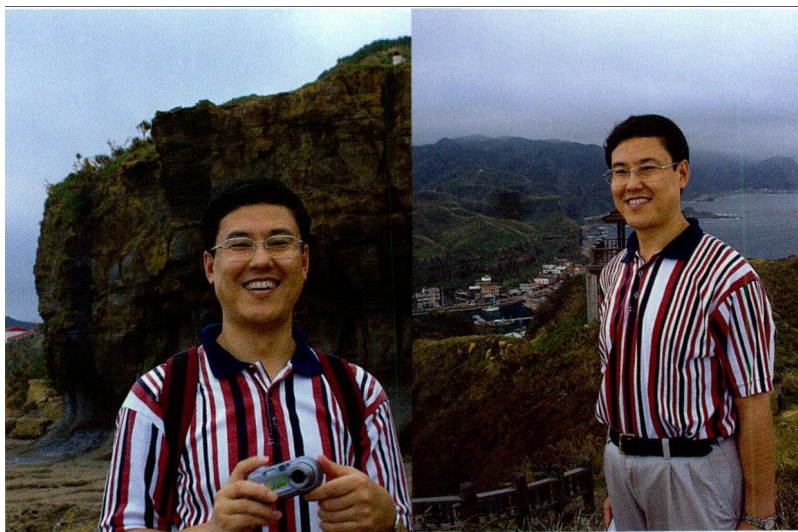
6号下午到了滕县博物馆，虽然是星期日，他们的潘馆长还是热情的等着。在简单的陈列室里，

终于见到了那“慕仰已久”的不其簋，盖子盖在器上，潘馆长特地拿来钥匙，打开通道，脱下鞋，自己钻进长长的通道里，打开盖子，让站在橱窗外的我看。盖内确实有字，行款从左到右，字体为反书，但不允许拍照和临摹，也没有时间临摹，因为通道里空气稀薄，潘馆长在里面无法久待，故盖子总共只看了大约30秒钟。我反复地向他阐述这个盖的重要意义，劝他早日发表。潘馆长的态度很客气，但始终没有肯定的说法，也只能由之了。

此次滕州之行，乘了整整13个小时的火车，在滕州待了4个小时，虽然没有看清文字，但也还是很有收获，就是证实了盖子里确实有铭文。

我生长在台湾，有关中国大陆的地理知识，都是从课本上学来的，贫乏得很，除了大城市以外，对多数地名都很陌生，也不很了解交通状况。当我说出“去看看那个盖子”时，我只知道朝远要去山东，而滕县就在山东，我并不知道他开会地点在济南，也不清楚滕县离上海有多远，离济南有多远，只知道都在山东。

对于一个老朋友，我就这样天真无知随意的开了个口，完全不知道，朝远原先可以搭80分钟飞机，轻松到济南开会，却为了这个要求，改成搭13个小时的火车，行过750公里的铁轨。而这个距离，比从台北到台湾最南端的恒春，还要远！



神采飞扬在海边——李朝远2005年11月13日在台湾最北端的鼻头角（陈昭容供图）

我回信说，搭了那么久的车，大热天的，真辛苦你了。谢谢。搭13个小时的火车，看30秒的盖子，这份情意，我会永远放在心里。

2006年8月13日朝远回信：

真不要说那么多的感谢话。滕州之旅是很愉快的，乘火车我也是乐在其中，因为我曾是铁路工人，且很久没有乘火车了，晃荡晃荡中，找回了许

多以前的回忆。

这就是我认识的朝远，永远为朋友着想、不要朋友有负担的朝远。

“花开花落两由之，水涨潮退自有时”，病中朝远这么说，他不要朋友们为别离伤心。而我想要学着像他那样豁达，却很难做到。只能祈求，朝远带着亲朋好友满满的爱，潇洒远行。■

一个与青铜器研究有关的“班”和“会”

撰文 / 熊建华

朝远先生英年早逝，令人扼腕，于我，则失去了一位任何时候讨教都不会拒绝的学长。

认识朝远，是从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个专业进修班开始的。

1990年7月至1992年7月，在马承源（1927—2004）、汪庆正（1931—2005）、熊传薪等先生的倡议下，上海博物馆、湖南省文物局联合华东师范大学在华东师大中国史学研究所办了一个文物鉴定与研究专业进修班，我是这个班的一员。

该班人数不多，但分有三个专业方向，分别为“中国古代青铜器鉴定与研究班”、“中国古代陶瓷鉴定与研究班”、“中国古代书画鉴定与研究班”，每个班只有5人左右。这个班的举办，得到了不少知名学者的关注、关心，著名书画鉴定专家谢稚柳（1910—1997）先生、王国维弟子（著名古文字学家）戴家祥（1906—1998）先生、有“诗书画三绝兼擅”之誉的苏渊雷（1908—1995）先生、我国老一辈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吴泽（1913—2005）先生等均亲自为学习班学生授课。华东师大方面也非常重视这个班，为每个专业配备了一位专门负责的班主任，王文耀为青铜班班主任、沃兴华为书画班班主任、房鑫亮为陶瓷班班主任，专业课老师阵容也相当整齐。这个班最大的特色是强调用“实证”的方法研习中国古代青铜器、陶瓷、书画，因此大部分专业课程是在上海博物馆的展厅、库房完成的。正是在马承源先生的一堂课上，我首次

见到了朝远先生。

有一天，班上突然多了一个学生，这个学生总是很专注地做着笔记，很投入地观摩实物标本，认真的态度。我好奇地问上海同学，才知道他是刚分配到上海博物馆的一位博士，叫李朝远。一个博士，如此谦虚、认真地对待每一堂非常基础的器物观摩课，我对这位刚入行的博士同行平添了一份敬佩。从学习班结业后，我们虽然没有特别的私人交往，但因为 I 服务的湖南省博物馆与他服务的上海博物馆之间业务来往很多，一直有联系，他发表的青铜器研究论文乃至西周史、古文字方面的大作，我一直相当关注，也为他的每一次进步而高兴，1997年，他荣任上海博物馆副馆长后，彼此的来往更频繁了。

这种来往，完全是建立在共同的志趣与研究上。虽然，我的那点上不了台面的研究无法与朝远先生的学术成就相比，但就青铜器研究而言，可以说都师承了马承源先生的研究方法与理念，共同点颇多，如在青铜器研究上注意细部、重视南方青铜器的研究等等，因此，我的几篇关于湖南青铜器研究的小文，也得到过他的赞许。2006年，因为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丛书编撰会的关系，我与朝远先生有过一段比较密切的联系，原本以为借编撰会这个平台，可得到朝远先生长期的指导，没想到，这次合作竟成绝响。

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丛书编撰会是由已故著名青铜器研究专家马承源先生于1989年倡议、并经与多位

国内青铜器研究专家学者商议后于1990年正式成立的，具体事务由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负责。该会是一个学术沙龙似的组织，强调用实证的方法研究青铜器，成员可以根据需要增减。编撰会的首次活动以吴越地区出土青铜器为专题，1992年，在经过实物观摩、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于上海举办了“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国际学术座谈会”，在国内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此次活动以后，由于上海馆、湖南馆相继忙于新馆的筹建，计划在湖南举行第二次活动的编撰会，一直没有兑现，2004年，编撰会的倡议者马承源先生不幸去世，更增加了编撰会的工作难度。

作为马承源先生的忠实追随者、作为编撰会主要负责单位上海博物馆的副馆长，朝远先生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了发扬编撰会学术传统的重任，多次与湖南省博物馆的领导交往看法，筹备在湖南召开编撰会的第二次学术研讨会。2006年，在上海博物馆领导的有力支持下、在湖南省博物馆馆长陈建明的积极响应下，编撰会的工作又活跃起来，有关工作开始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而建明馆长把湖南方面筹备的一些具体工作交给了我办理。为确定好会议的议题，2006年5月，应陈建明馆长的邀请，张长寿、王世民、高至喜、熊传薪、刘彬徽等编撰会创会元老到了上海，就如何开好湖南会议进行讨论。朝远先生率青铜部的周亚、马今洪等先生做了具体周密的安排，这次会议，确定了湖南会议考察的时间、讨论的主题、会议规模等。这次会议根据湖南近年考古发现尤其是炭河里西周城址与墓葬的发现、出土青铜器的特点，将主题确定为“湖

南出土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研究”，初步拟定2006年11月16—20日为学术考察时间，2007年10月为学术研讨会时间；确定邀请15名左右专家参加学术考察，邀请40名左右国内外专家参加学术研讨会。其间，专家们还拜谒了马承源先生的陵墓，并在马先生铜像前合影留念（图1）。

经过这次合作，我认识到了朝远谦虚与思维缜密的一面，他不仅就如何开好这次学术会议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而且就会务组织的细节也颇多善意提示，我们就邀请考察及与会专家和他商议时，他的回函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建华：

一切都非常好，感谢你们的工作。文字上稍有小改，不一定正确，供参考。没有其他更多的建议，唯一的建议是，看能否增加上博的陈佩芬研究员、谭德睿研究员和廉海平副研究员为邀请对象。陈佩芬研究员、谭德睿研究员是参加过第一次活动的前辈学者，廉海平副研究员则可作为科技方面的代表，如果他们能被邀请，则会更全面。当然，一切由建明馆长定。邀请函马上可以发出，如还有何问题我们及时联系。活动一定会很成功。再谢！问建明馆长好！

朝远上

2006年11月16—20日，考察活动如期举行，湖南省博物馆为此从全省各地借调了20余件新出土的商代晚期到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并将馆藏中的一些从未展示过的器物供专家们观摩，组织专家参观了炭河里遗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标本室、长沙市博物馆。朝远积极地参加了这次考察活动，此外，应邀参加考察的专家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长寿、王世民，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郝本性，广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廷瑜，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周亚、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宫希成，湖北省博物馆研究员万全文，上海博物馆副研究员马今洪、廉海萍，湖南省博物馆研究员高至喜、熊传薪、刘彬徽、熊建华，岳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郭胜斌，湖南大学教授向桃初，长沙市博物馆副研究员王立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



图1

员高成林等（图2）。观摩、参观结束后，在湖南省博物馆新陈列大楼二楼贵宾室，还开了一个中国古代青铜器编撰会湖南青铜器考察研究活动的专家座谈会。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对这次由湖南省博物馆承办的中国古代青铜器编撰会湖南青铜器考察研究活动表示了感谢，认为这次活动办得很成功，参观湖南省博物馆馆藏文物和外借的青铜器，以及在宁乡炭河里等地的青铜器观摩和现场考察，对于了解湖南青铜文化很有帮助。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炭河里的发掘，对于了解宁乡的青铜器做了基础性的工作，非常重要。宁乡黄材和炭河里所出土的大量青铜器，是对湖南青铜器和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一大贡献。专家们纷纷表示从这次活动中收获不少，是一次很有意义的活动，并希望能够及早编写一本有关湖南出土青铜器的图录。朝远先生自始至终精神饱满地参加考察活动（图3），看不出他的健康潜伏着问题，他在会上特别强调说，这次活动是对举办第一次会议的马承源先生等前辈的最好纪念。

“湖南出土商代晚期至西周青铜器学术研讨会”，于一年后的2007年10月27—29日在长沙举行。参加本次学术会议的代表分别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海博物馆以及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江苏、广东、广西、台湾、美国、日本等境内外知名高校、博物馆、考古所及其他研究机构。会议共收到论文35篇，大家主要围绕湖南青铜器的来源、产地、年代、族属以及所属考古学文化、艺术特点及与其他地区青铜文

化的关系等学术问题发表了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其间，专家们还到宁乡黄材炭河里商周城址及周围青铜器出土地点，宁乡月山铺四羊方尊、象纹大铎出土地点进行了考察。遗憾的是，朝远先生却因病未能与会，会后，根据王世民先生的建议，与会专家一致同意向病中的朝远先生发了一封《慰问信》，受大家的委托，《慰问信》由我起草，全文如下：

尊敬的朝远先生：

由您极力推动而得以举行的“湖南出土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学术研讨会”于今天圆满结束了。有42位代表蒞临长沙共襄盛举，张长寿、李伯谦、王世民等大家也拨冗与会，因病不得不取消行程的李学勤先生也委托代表宣读了自己的学术报告，有35位代表提交了自己的学术论文或提纲，有28位代表在会上作了学术报告，尤其令人回味的是，大会专门利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号召有兴趣的专家开了一个“沙龙式”的专家座谈会，会上大家发言踊跃，就一些湖南商周青铜器的热点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一些完全不同的观点在会上进行了直接而友好的沟通、争论。

会议取得的成果是多方面的，一些原有的有关湖南出土商周青铜器的热点问题仍然受到关注，湖南出土商周青铜器的一些难点、重点课题也有专家提出了解决的方向与办法。与会专家一致认为，高砂脊、炭河里的发现既是新突破又是新起点、湖南出土商周青铜器的研究视野要更宽广、要注意与考古学文化相结合，同时也要重视对青



图2



图3

铜器现有研究成果的利用。

总之，会议在浓厚的学术气氛中按原定议程圆满完成，达到了预期目的。

朝远先生，利用这次机会，与会的“编撰会”成立的发起老专家与筹委会成员还专门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就会务的准备情况、编撰会今后的发展与努力方向等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讨论与研究，我们殷切期待下次的会议能像以前一样由你主持，下次的工作继续由你推动与践行，我们从不怀疑，凭你的智慧、毅力，一定能跨过目前这道坎！

衷心祝您早日康复！

“湖南出土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学术研讨会”

全体代表

2007年10月29日

从认识朝远的进修班算到与朝远最后合作的青铜

器编撰会在湖南的学术研讨活动，前后不到20年。当年在上海学习时的老师们，谢稚柳、戴家祥、苏渊雷、吴泽四老以平均90岁高龄仙逝，马承源、汪庆正两位德高望重的文博界专家也分别以享年77岁、75岁辞世，而正当壮年的王文耀先生、李朝远先生却也先后谢世，这些人生变故，虽是无可奈何之事，但仍不免令人有沧桑之叹。

好在前辈师长及朝远关注的事业没有停滞不前。从上海文物鉴定与研究进修班结业的学生们大多在各自单位发挥着专业骨干作用；当年参与成立青铜器研究丛书编撰会的诸位先生，大部分还健在，功成而身不退，学术研究老而弥锐，不时有新成果见诸学界，年轻的一辈也正在成长，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尤其是南方青铜器的研究几乎已成显学。这一切，或可告慰朝远及各位先行的师长们。■

追忆李朝远老师

撰文 / 杨英

前几天打开《文物报》，看见一条令我震惊的消息——李朝远先生逝世了！刹那间我愕然了，虽然前几年便获知先生不幸罹患疾病，但仍希望神明保佑，让先生得享天年，然而今年春天，百花还未开过的时节，我就闻知了这个噩耗，不禁百感交集，十几年前自己在上海读书的日子又历历在目，我仿佛又回到了那青春又青涩的岁月——学术上的青涩感又一次清晰。我曾有幸受业于李朝远先生半年，获益良多。看到这消息，我无论如何要写点什么追忆他，尽管我硕士毕业离开上海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算来已经有十多年。

我记得第一次见到李朝远先生，是在上海博物馆。我1993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读先秦史硕士，导师谢维扬先生。自己当时学术上的一穷二白，心里时常惴惴不安。有一次我在谢老师带领下去上海博物馆看展览，而后我们在展厅等着，不一会儿，一位身材高挑的老师走了过来跟谢老师握手。虽然人到中年，不失英武。于是，我跟着导师看展览，听着李朝

远先生讲解。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收藏果真不凡，既多又精。可惜对于一个刚刚踏出大学校门，从未接触过青铜器学的年轻学子而言，那些迥异的器形、多样的器类实在是让自己发懵。当时自己大气也不敢出，更别说到发问了。谢老师是位认真负责的导师，他除了专门给我上课，及让我认真读《左传》之外，为让我对考古和青铜器学有所了解，特请李朝远老师给我讲课，于是，我有幸能够经常聆听李老师的教诲了。

当时李老师家住浦东，当时的浦东，百业初兴，就连今日享誉海内外的东方明珠，底下尚是一片尚未完工的瓦砾，而那些鳞次栉比的高楼、会展中心，更是一无所有。我每周末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从上海西郊的华东师大出发，往东，往东，一路，经过着苏州河边的棚户区，经过着华山路、复兴路，经过老西门的旧街（这些想来都只在人们记忆里了，包括我的记忆），而后在复兴东路的黄浦江畔登上轮渡，跟许多乘客一起推着自行车，等着渡轮前来接自己到浦东去。

在渡轮上看着黄浦江的滟滟水波，看着高楼大厦仿佛漂移般离自己越来越远，而后到浦东对岸，再骑不远就是李老师的家了。

每次在李老师家上课，内容以青铜器为主。李老师授课认真，但亦比较随和。我在听课时随着对他的渐渐熟悉，开始的拘谨陌生感慢慢消除。桌上写字台的台板底下压着他在世界各地布展时的留影，我问起他各地的经历，我发现他知识广博，对我说起在墨西哥布展时了解到的当年玛雅人和西班牙人进行战争时的情景，还会说起去香港、深圳等地的感受。先生真是个好读书人，他说他去过世界这么多的地方，最不喜欢的地方就是深圳，无书可读，文化沙漠之类。当时的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一拨拨的弄潮儿正信心百倍地到那里打天下，李老师却说最不喜欢那里，我在惊讶之余不得不得出结论——先生真的是个做学问的人，他的书生意气不是装的，也不是拿这当饭碗，而是就这么生活着，那就是他的生活方式。

先生对晚辈总是尽力扶持和帮助。我硕士毕业时因求职事宜曾问过先生，他亦给我明确指点。当我流露出对自己的学术能力没有信心之际，他则一一劝导，似乎学术的路就那样，淡淡然，水到渠成，用他的话说，就是“车到山前必有路”。

或许正像先生所说的那样，“车到山前必有路”，一切都按它自然的轨迹发展着。我硕士毕业后离开了上海，离开了自己的江南故乡，到徐州师范大学任教。两年之后，我以出色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师从祝总斌先生学习魏晋南北朝史，开始了自己生活的新一页。

花开花落，我早已从北京大学博士毕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工作也已8年。这十多年来，我不敢荒疏，对青铜器学的了解也不像当年在李老师家听课时那样一无所知了。读书、科研成为自己在京华城墙下的本职工作。但我从未忘记过上海，从未忘记过华东师大的美丽校园和那里鼓励我、伴我成长的良师益友。李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位。在这京都，在北京大学校园，在自己家中，我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往事，以及苏州河畔的昔日校园，当然还有于我有师恩的李朝远先生。因为我丈夫李先登亦是研究青铜器的，所以不时还能有些李朝远先生的消息。前几年听说他患病，我挥泪给他写了一封信，而后不久便收到他的回复，是寄了一本他自己的《青铜器学步集》，并附言说他要认真度过人生的最后岁月，我看了不禁唏嘘。而今，先生真的离开了我们！

先生远去了，但他的学术成就已矗立着，将传之后世。我们都将纪念他。■

相关链接

《送朝远》

张庆捷

君住江之南，我居河之滨。
沪上初认君，一谈如故人。
文章步马老，大作悦亲朋。
谋事晋侯展，求索彝器珍。
学研逢盛年，噩运缠君身。
英年叹早去，流星逝良辰。
佳著再开读，音容不可闻。
德才俱留香，追忆倍伤神。
旧曲“橄榄树”，重听滋味新。
举杯叙往事，祝告梦成真。

《秦楼月·思朝远兄》

任周方

惊闻朝远兄逝世噩耗，夜不能寐，深感哀痛。5月24日的追思会，却有事缠身，不得前往，痛感遗憾。但每每想起兄长在上海时对我们的热情赐教，也有来宝鸡时对我们的谆谆教诲，犹如昨日之事，更觉余温有绕；每每拜读兄长的著作，更是儒雅含蕴，启人心智。可苍天无情，兄长已去，遂作词《秦楼月》思之。

天柱缺，
楼倾人怨郎星月。
郎星月，
清泪满衣，
梨花如雪。
不忍弄笛悲声咽，
无奈伤情灯花结。
灯花结，
追魂何处？
杜鹃啼血。

《哭朝远》

渠传福

朝远西去，追思痛悼，吟成数句，权作送行。

又闻海上坠文星，
可恨苍天妒才英。
赵卿墓地初相识，
马公宏论共聆听。
《珍粹》明辨墨迹误，
《晋魂》细数青铜精。
病来未忍发存问，
仙去何痛隔幽明。

梦中的橄榄树

Dream olive

关于李朝远君的一些记忆

撰文 / 严耀中

随着岁月流逝，我们这一代人也逐渐走向老年，有人卸职，有人退休，好像都习惯成自然地被接受了，但是朝远的逝世却是那样地难以被接受，是因为他的年轻，因为在我的记忆中，他的生命力曾是那样的旺盛。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与朝远就认识了。1982年我自上师大研究生毕业留校后，十多年一直住在学校的教工集体宿舍里，而他则在华东师大十年寒窗苦读。在整个80年代，除了一些会议上的见面外，他到我那间宿舍陋室里来过几次。他主要是来和我讨论关于魏晋南北朝史的一些问题。我读研究生的专业方向是魏晋南北朝史，朝远起先只是对中国古代史感兴趣，以后跟吴泽先生读博士生时专业是先秦史，当时和后来他都没有把我从事的古史领域作为其专攻的研究方向。但他在有关魏晋南北朝史的问题讨论时却都是要刨根究底的，如他问我，为什么魏晋南北朝时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那么尖锐，却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呢？还没有等我想清楚怎样回答，他就把他所想到的原因一、二、三地摆出来，征求我的看法。对于他的观点，我有的赞成有的不赞成。彼此不一致的地方，他不仅要我讲清理由，而且要举出史实。因此我觉得与他讨论这些问题，比与同一专业的朋友还难对付，因为他太认真了。还有一次主要谈的是魏晋南北朝时的奴婢，因为他有一个印象，就是当时的奴

婢特多，问我是不是。我就介绍了一些史载上的事例，说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奴婢的记载数量，称谓种类，还是参加劳动的情况，都是历朝中最多的。此前，何兹全先生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题为《汉魏之间封建说》的论文，据说朝远不止读了一遍，于是就提出了一系列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奴婢与先秦、与明清时期的有什么异同？奴隶或奴婢在社会中的存在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奴隶社会？甚至，中国到底有没有过奴隶社会？等等。当时程念祺君也在场，他和朝远是好朋友，于是一起对这些问题讨论或争论了约有二、三个小时，虽然非常热烈却好像没有什么结论，其实当时也不可能有什么结论。但通过这些讨论，朝远对求知的认真、努力和执著，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后来他到了上海博物馆，从先秦时期的土地制度到为此提供史料的金文，朝远的论文与专著源源不断地发表，并成了一位著名的青铜器专家，天道酬勤，这决不是偶然的。

朝远是一个做学问的人，所以他当了上海博物馆的副馆长后，惺惺相惜，对人才也十分重视。记得有一次我到上博去，在他的办公室里，闲谈中要他数说一下上海博物馆的十大镇馆之宝。当然这所谓“十大镇馆之宝”是我杜撰的，目的是要引出他的话头，最好是再让我去见识见识他心目中的上博特级藏品。不

料他正色道：“藏品对博物馆来说虽然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馆里要有一批专家人才。藏品只有经过专家的鉴别真伪，修复保护，组织陈列，博物馆才有生气，才有活力，才会在社会上、在国际上产生大的影响。”接着，又不无得意地向我吹嘘，上海博物馆的某某、某某、某某的水平是国内顶尖的，某某有一手绝活等等，以后你有机会向他们讨教，比看几件东西有益得多。听他一席话，使我很不好意思，颇感自己的浅薄。博物馆的工作决不是把文物收藏进来，再摆摆出去那么简单，体现博物馆水平的不仅是藏品，更在其所拥有的专家。

后来，他听说我在搞密教，马上对我说，馆内最近来了一位名叫杭侃的年轻人，对密教造像很有研究，也很有学术见地，你和他进行交流的话，可能相得益彰。结果确如他所云。此亦可见朝远对别人长处的熟悉与重视。

机遇让朝远很年轻就做了上海博物馆的副馆长，这当然是件好事，至少朋友们看来是如此。但他因此颇有为难之处，那主要是个人时间上的难以安排。做了馆领导，开会、抓事，都需要时间和精力，像博物馆那样的单位，应酬也很多，包括陪领导、外宾参观等，都是推不掉的。但这样一来，自己做学问就缺少时间。他非常想把学问进一步做好，不过既然上了岗，也不能因己愿而废公务，只顾自己做学问。

大约是十年前，我在广州开会，去拜访了中山大学姜伯勤教授。说到上海博物馆及其新馆，姜先生盛赞上海市有气魄，给博物馆盖了那么好的房子，成了上海有文化的标志。回沪后，一次我向朝远提到了姜先生的话，不料他另有一番议论。大意是，好建筑对

博物馆来说固然要紧，但这只是硬件。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各地钱多了，博物馆都会越盖越漂亮，或许过若干年后，上海博物馆在建筑硬件上不那么先进了。但表示博物馆水平的，还有软件，那就是管理功夫。举例说，馆内的洗手间就不能有异味。诸如此类的事情都要做到并坚持下去，这样的博物馆才是国际一流的，相比之下，馆所在的建筑并不是主要的。我是一个喜欢到处走的人，一般到一个城市，除了开会办事和游览名胜古迹外，该地的博物馆也是必去之处。听了朝远的那番议论后，说来好笑，从此每到一个博物馆后，不管自己当时是否内急，里面的厕所也成了我必定要去的地方，体会一下那里的管理水平和城市的文明程度。这么多年近百个博物馆跑下来，深知要做到朝远所说的那一点殊为不易。因为一件事，哪怕只是一件很不起眼的小事，要几年十几年地坚持下去，小事也就变成了大事。我不知道朝远在博物馆的领导班子里是否分工管这样的事，但这样的事都要时刻上心，是要很费些心力和时间的。于是对朝远来说，工作的职责丝毫不能松懈，自己所钟爱的专业还要不断地更上层楼，那剩下可以挤兑的，就只有自己的休息和健康了。朝远得病而英年早逝，虽然似乎是一种不幸的偶然，但也不能否认是他事事认真而积劳成疾所致。

逝者如斯，留在世上的就只有人们心头上的记忆。我与朝远虽然是多年的朋友，但因为各自的事都太多，平均起来，一年也至多不过见面二三次而已，包括只有说几句话机会的场合。如今，竟是哪怕再说一句话的机会也没有了，剩下的就只有一些永远也难以忘却的记忆。■

悼惜同窗李朝远

撰文 / 房鑫亮

回忆英年早逝的好友是件痛苦的事情，朝远辞世虽已月余，但每每忆及，仍令人神伤，这可能也是有些同学不忍命笔的原因。

朝远罹患恶疾有年，虽然知道他病情危重，但在他过世前几天与戴扬本兄去探望时，觉得他精神尚可，而且以前情况更凶险时也挺了过来，因此4月26

日下午当我在外地返沪的车上接到程念祺告知噩耗的电话时，仍不免意外，并深为痛惜：他正处学术成熟期，正是出成果的时候，却这么就走了！

朝远是个聪明、好相处的人。大学的前两年里，我与他虽在一个班级，但因为我们是工作多年后才入学，都有韶华将逝的急迫感，和绝大多数大龄同学一样，日常生活经常是教室、图书馆、寝室三点一线，所以接触不多，并不熟悉。三年级时因宿舍搬迁而调整寝室，我们住到了一起，互相才逐渐了解。那时的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的教学时间比较长，感兴趣者不少，我们也是其中之一，因此经常会就某些问题交换看法，讨论古文献的释读，甚至英语单词的释义，天南海北，无拘无束，话题甚多。我的感觉是，当时朝远的古汉语和英语并不突出，但是进步很快，这显然与他善于学习有关。好像也是在那一年，他担任了班长，操办过班级学术研讨会、联欢会等，竭力想把气氛搞得活跃一些，与此同时，自己的学习也抓得很紧，成绩优秀。他住过两个寝室，交往较广，为人宽容，朋友不少。由于朝夕相处，同学间难免会产生些矛盾，这时就会找他。记得有一次正在吃午饭，他忽然被叫走，很长时间才回来，原来是有同学发生了争执，双方和他关系都不错，把他找去评理了。

在随后的三年研究生期间，我们也同处一室，相知日深。毕业后，我们都留在了母校中国史学研究所工作。一年后，他攻读博士学位，继续深造，毕业后原拟到历史系工作，旋因马承源先生之邀，进入上海博物馆。

毕业后，同学间的差异很大，他长期担任上海博物馆副馆长，学术成就丰硕，算得上所谓的成功人士了，但对同学一如既往，热情依旧。我曾听不少同学讲到这点，对他平等待人极为赞赏。在他患病后，同学们深感惋惜，不少人多次探望，张王宏、牛勇、成岳冲、董真等在外地工作的同学也纷纷前来，李林在一年中竟三次从湖南赴沪，汪智和从国外多次来电询问病情变化，提供各种帮助。这些，均可见同学之间的纯洁友谊。

工作以后，由于平时各自忙于己事，我们之间痕迹比较疏阔，很多时候是因为工作才联系。1997年，

华师大史学所重新启动《王国维全集》整理工作，朝远应所长谢维扬先生邀请，承担了部分点校任务。由于我负责《全集》的日常工作，因此与他往来较多，也得到他很多帮助。例如，在增订中华书局版《王国维书信》时，发现底稿抄录出自众手，脱衍倒讹甚多，另外，很多后出的书信也有不少地方难以读通，所以都须复核原件。由于上述材料大多藏于各博物馆，很难得见。通过他的介绍，在有关人士帮助下，我先后得以核对辽宁博物馆、旅顺博物馆、故宫等度藏的书信，纠正了不少错误。记得有一次为此事去北京，一时无法找到所需材料，正在焦急，适逢他稍后也到京开会，他在电话中得知我遇到困难时，马上表示由他设法解决，要我继续行程，不要在京耽搁。数月之后，我果然收到了有关资料。

在《全集》工作中，经常遇到与古文字和古器物等相关的专业问题，我就请他释疑，每次都能得到满意的解答。由于古文字摹写时不免走形，往往前后不一，我曾请他提供比较标准的字形；碰到不同的释文，还需了解释义的演变情况。他每次都予详细解释，有一次为一个字竟写了几页纸。有时即使我只需要一个结论，但他仍介绍各种不同观点，详解流变，以写学术论文的态度对待这些小问题，可以想见其治学之严谨。

他对《全集》十分尽力。例如，《全集》原有供参加者使用的点校体例，但与出版时的凡例要求不尽相同。当我们重新起草凡例时，正是他患病前后。在发出征求意见稿后，他很快就提出修改意见，稍后还



2006年3月华东师大历史系1979级三班同学聚会合影（前排左起：李新强、顾学周、李朝远、姚晓光、严文儒、樊卫国；后排左起：沈柳宜、罗咏梅、董小苹、周静、周华、王杨、章恒龙、房鑫亮、封海清、秦葆平、龚为人）

提醒关于异体字的处理等问题。另外,当我把有关各卷的点校说明传他阅改时,特意说明不要费力,在精神佳时随便看看。然而,不久就收到他的复函,就某些观点的表述、措辞等提出详细的修改意见,字斟句酌,考虑周密。他的最后一封来函是今年2月6日晚上近10点,距逝世仅两个多月,此时他已视物困难,精力不济了。由于电子邮件可见发出时间,他还多次提醒我注意身体,千万不要熬夜,尤其不要到下半夜。在深感同学情谊的同时,我想,这也是他出于对自身染疾的痛切感受。

由于他确诊时已是肺癌晚期,我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借寓之处离我住所不算太远,因此过一两个月我就要往晤。他因肿瘤腰椎转移而不能久坐,所以我一般事先约定谈半小时,不过,几乎从未做到过守时:20多年的话题似乎集中在一起,我们每次都会忘记时间的流逝。说来可悲,这种定期晤谈却缘于谁

都不知什么时候会突然中止的担忧。

朝远是一个坚强而达观的人,他对自己的病情十分清楚,从容安排了身后之事。一次,谢维扬、胡逢祥和我去他处送稿酬,恰逢程念祺也在。他提出要把自己的藏书捐赠给华师大历史系,我们听了很难过,就说你要设法治病,不要想其他事,把话题岔了开去,随后讲到新药的疗效。他说,新药即使延长生命几个星期都算是突破了,但对我来说又有什么意义。显然,他向往的是有质量的生活,而不仅仅是活着。最后他确实做到了自主掌控命运:病危之时,果断放弃了仅为延续生存而进行的治疗,不失尊严地结束了生命。

回忆昔时,我们一些同学包括朝远在内曾经笑约,在职时为五斗米忙碌,见面不易,晚年觅一养老院再续契阔,不意言犹在耳,却已天人永隔。

行文至此,哀痛难抑,思绪纷乱,再也无法命笔: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更何况是永别! ■

同窗痛伤别

撰文 / 董小苹

“朝远走了!”4月27日,我打开电脑准备写文章之前习惯性地浏览单位的邮箱,突然读到同学程念祺发来的邮件,伤痛之极,以至数周无法继续刚刚动笔的论文。

朝远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与班长。学习与工作中的朝远,执着、沉稳、大气;生活中的朝远,亲切、低调、随和。相识30年,我眼中的朝远还是和30年前的他一样,没有因为工作业绩的增长以及地位的变化而发生任何改变。若求助于他,朝远通常会在许可的范围内给予最大的便利与帮助。

2007年1月,我邀他参与同学聚会,他告诉我要去内蒙古出差无法更改行期。事后我才得知他是去做癌症切除手术,因为怕惊动同学所以没有告诉大家。同年3月初,我去电询问他身体状况如何,他说没什么问题。当时已是晚上七点多了,大病初愈的他却还在馆里埋头工作。之后,我多次联系不到他,不由得

暗自惊心怕他病情有变化。果然,6月初他出国回来告诉我,身体状况很不好,两天后将去肿瘤医院化疗,此刻刚刚向孩子交待完后事,心情很烦闷。

之后,他开始了艰苦的化疗、放疗、服药等治疗过程。2008年春季,他的病情一度缓解,闻者无不为之额手称庆。病中的朝远,勇敢坚强,始终以微笑示人。他知道同学们都牵挂着他的病情,所以稍有好转便会发信或打电话告诉大家。然天妒英才,去年下半年,朝远告诉我进口的抗癌药物对他已失效,他不得不重新开始痛苦的化疗。

今年1月同学相聚,是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朝远抱病前来参加聚会,当时我恰好坐在他旁边。仔细观察,我发现他脸部浮肿,很少进食,而且时间稍久,便时时变换体位,似乎坐得很累。我悄悄问他能否坚持,是否需要帮助。他说坐久了腰背很疼,浑身不舒服,并要我不要告诉他人,以免扫了大家

的兴。那次聚会，好几位外地同学是为了见朝远一面而特地赶来的。中途朝远体力不支，提早退席，同学们离席到酒店门口送别。目送他远去的身影，众人皆叹息不已。

今年3、4月间朝远的病情急剧恶化，他自知回天无力，为免深深关爱着他的同学们伤心，所以他未将真情告诉大家。4月初，我发信询问其病况如何，并告之近期刚出差回沪，因工作与家事繁忙，半年中竟发高烧四次，所以一直没去看他。他说自己正住院治疗，病情尚稳定，还叮嘱我“工作是做不完的，身体好才能继续工作，所以千万要注意身体！”于是我想当然地以为他还会像前几次那样，坚持一个疗程后又回到寓所，一心想等他回寓所之后再去探望他。谁知却等来了他远去的噩耗。

我和朝远在校期间接触不多，但常听老师、同学夸他治学严谨，很用功。大学毕业他一路考研读博，我们更少联系。直至他进博物馆工作，我因工作关系，常会带国内外学者和教育系统师生去上海博物馆参观，联系自然也多了起来。言谈间，我发现他涉猎知识面越来越广博，学养亦日渐丰厚，然为人却愈见低调谦和。读他所赠的《西周土地关系论》和《青铜器学步集》，深感其治学态度严谨缜密，治学气势磅礴磊落。这十余年间我们虽联系颇多，可我只知他曾攻读先秦史，到博物馆工作之后又倾力于青铜器研究，却从未听他提到过自己获取的荣誉，更不知他在

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已达至臻境界。

2008年初我去探望他时，朝远不无遗憾地说：“这么些年积累下来，自己感觉已进入一个较自由的天地，可以写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可惜这场病一来，记忆力大大减退，也不允许我长时间地思考问题了。”隔行如隔山，当时我虽深深为他感到可惜，但我还是不知道他的学术积淀有多深。直到他离去后我上网搜索，方知朝远“研究保护了大量珍贵的青铜器，对秦公器、晋侯器著述颇丰，于上博简的整理工作有突出的贡献。”他是“文化部的优秀专家、上海市领军人才、国内著名的青铜器研究和鉴定专家。”据和他有学术合作项目的学者介绍，朝远精通金文、甲骨文，于先秦史、青铜器研究有很深的造诣，对青铜器鉴定更是深得马承源先生的真传。至此，我才明白他对病魔束缚了自己的思想、中止了他钟爱的青铜器的研究有多么的痛心和惋惜！

朝远把短暂的一生都献给了理想和事业，献给了他无比钟爱的青铜器，因而无暇关注家事，无暇与亲人沟通以得到理解和支持。我和同学们都在想，假如朝远的生活更和谐一些，工作压力再减少一些，他是否会活得更健康、更长寿一点呢？如今他英年早逝，带走了一肚子的学问和一身绝技，令往日的同事无比痛惜，教昔日的同窗黯然神伤。

朝远走了，愿他一路走好，在另一个世界过他真正想过的生活。■

忆朝远

撰文 / 樊卫国

朝远走了，这些日子头脑中常浮现出他的影子：黝黑的肤色，挺拔的身材，自信的笑容……

我和朝远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同级同学，至今相识已30年了。记得1979年夏天，我怀揣着大学录取通知书去华师大报到，被分配在第八学生宿舍入住。走进229室宿舍一看，已有几个同学在房里，我和大家打了招呼。在靠窗的下铺坐着位黑瘦的高个

子，他冲我一笑，一口白牙，自我介绍：我叫李朝远，来自江西。在谈话中得知他是本室来得最早的，高考的分数也很高。他自嘲道我说话有点结巴，不过现在已经练好了。初次相见，朝远的率真、诙谐和自信都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

朝远在我们宿舍8位同学中是最年长的，他性格沉稳，为人诚恳，待人接物均较成熟，颇受同学们

敬重。他学习十分刻苦，钻研史学，背读英文均深下功夫，学习成绩在年级名列前茅。那时改革开放不久，学界突破禁锢，各种观点百花齐放。我们常在课余时间纵论历史得失，各抒己见，情趣盎然，有时争论不休，互不相让。朝远论述问题有条有理，颇具说服力和逻辑性，有时听到同学的精彩观点他会欣然赞同，并不以年长固持己见。我记得在学习中国古代史的时候，我们常在宿舍里评点史事，臧否人物，剖析典章，犹如开了个小小研讨会。现在想来正是这些宿舍“研讨会”不知不觉地激发和培养了我们独立思考的精神。

朝远爱好运动，早上起床练跑步，步姿轻盈。在体育课学习了打排球的基本知识后，朝远常招呼我们打排球。开始几个同学围着打，后来便玩“比赛”。我们宿舍李朝远、汪智和、王敏华、成岳冲、龚为人、董真、张恒龙和我常组成一队，与别的宿舍，别的班级，别的系的同学打比赛。朝远个子高，弹跳好，打排球有模有样，很稳当，成为我们业余赛的主力。我们还真参加了几次系际排球赛，不过名次不高。午后打球，常打得一身臭汗，大家说说笑笑回宿舍，十分痛快，早把输赢抛到九霄云外。

大学毕业，朝远考上了母校的研究生，1988年我考研究生，他正在读博士，知我考试住校，他主动把他的博士生宿舍让我住，说这里住宿条件比较好，有

利于应考休息。后来朝远到上海博物馆工作，我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又考了在职博士。朝远不时寄来上海博物馆的门票，每次都是精彩的中外文物展览，令人大开眼界。我有时也去博物馆访他，同学见面十分畅怀。他谈起博物馆的收藏，特别是新收藏新研究，总是神情飞扬，滔滔不绝，可见他对工作的热爱和专注。朝远在上海博物馆工作颇有业绩，经年锲而不舍的研习，已卓然成家，成为青铜器和金文等方面的专家。我想象朝远这样性情的人，做任何事情都会取得成功，因为他是那样的投入和执著。

朝远病后，我和同学董小苹一起去看他。他身体虚弱，但精神尚可。今年春节后，朝远给我发来“伊妹儿”，说病情尚稳定，嘱我勿念。他告诉我女儿北大毕业，已获美国约翰·霍金斯大学全奖，硕博连读，并再次对我在他女儿小学择校时提供的帮助表示谢意。字里行间，我觉得朝远情绪很不错……。4月26日朝远遽然辞世，我闻之愕然，现想来那次“伊妹儿”他竟是来向我告别的。

朝远走了，一位老同学，一位君子悄悄地走了，走时正值事业之高峰，令人痛惜不已。

大学时代是我人生的艳阳天，想起朝远，我似乎看到了一个矫健的身影，步履轻盈，披着一身霞光……

匆草于2009年6月9日夜■

梦中的橄榄树

撰文 / 程念祺

“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哀乐……在合适的地方放一曲我很喜欢听的《橄榄树》。”——李朝远遗嘱

我和朝远是大学同学。在大学里，我们不在一个班，但他给我的印象却很深：人很温和，文质彬彬，笑起来很灿烂。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上海中学教书，而他考取了研究生。

朝远的妻子是上海中学的老师。那时，他们在上海中学的家属区，有自己的一间十几个平方米的小屋。

朝远住校，经常是星期六才回家。我有时候星期六不回家，他们炖一只鸡，煎一条鱼，就会把我找去一起吃。时间长了，成了习惯，我常常是不请自到，边吃边聊。朝远去世后，我经常想起那一段时光，可是我再也见不到朝远了。

对朝远的学问，我是非常佩服的。他师从吴泽先生学习先秦史，由硕士而博士。后得马承源先生赏识，到上海博物馆工作。在博物馆，朝远在青铜器研究方



1984年秋摄于上海植物园。前排：程念祺，后排左起汪智和、王邨、李朝远、杨德林。

面，更是下了大功夫。他病后，有一天我去看他，他拿了一本《青铜器学步集》给我，并对我说：“都是些小文章。写大文章，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说这话时，他的情况已很不好。这时，他心里经常想的，恐怕就是希望还能有一点时间，写一点自己最想写的东西。他是4月26日清晨去世的，而他的最后一篇文章，毕稿于4月14日。

回想起这些年每次单独跟朝远在一起的时候，他都会讲到青铜器。他讲起来总是很具体，如数家珍。朝远为学的态度是非常严谨的。谁怎么说，为什么这么说，他一旦讲起来，都要交待得清清楚楚。讲人家的高明之处，他那种钦佩、喜悦的神情，深深地感染了我。我记得，他曾经给我讲过他的《“青铜透空觚”考略》一文。那一次，从马承源先生对于妇好墓出土青铜器年代的见解讲起，他讲了很多，等于是把研究这一问题的学术史给我讲了一遍。他还给我讲了青铜觚铸造的形制与工艺演进的关系，讲了青铜器分期要注意器形与花纹的主要共有特征等问题。因为是讲“觚”，我就问朝远，孔子讲“觚不觚”，是否就是讲觚的形制已不符合“礼”了。他说，这样讲也不算错，但反映不出孔子讲这话时的心情。他说：“你不是很佩服冯友兰讲的‘具体的抽象’吗？觚就是孔子讲觚不觚时对礼的‘具体的抽象’。”我现在读到朝远的这篇论文，他是这样说的：“觚是饮酒器，在礼制中的地位很高，故在春秋大变革的礼崩乐坏潮流中，孔夫子会发出‘觚不觚，觚哉！觚哉！’的感叹。”朝远写文章，总是这样举重若轻，干干净净，意思传达得非常准确。

视野宏阔，思想活跃，有很强的批判性，是朝远治学的另一个特点。《青铜器学步集》中，收有一篇题

为《兽面纹与查克雨神》的论文，副题是：“关于异地文化相似性的一个话题。”在这篇文章中，朝远从青铜兽面纹与查克雨神虽有着相似的外貌，但两者的内涵却不同这一问题的分析入手，指出：“查克雨神是人们对缺雨现象的不可理解、无法随心所欲驾驭之后形成的一种自然力人格化的结果，是生命和意志的灵物”，而“兽面纹所代表的鼎上物象，它可以是神的代表，又可以是巫的用器”，“它的本质特征在于他不是自由神，而是一种护身符”，它的“神威权力实际上是人间政治的神化”。在此基础上，朝远还分析了玛雅人长期以来“缺水的自然条件和较弱的社会组织，使自然神的雨神几乎处于独霸的地位”，而中国在“经历了短暂的酋邦阶段之后，迅速建立起了大型精密的国家机器”，“统治阶级有意无意地利用了社会对护身符的需求和敬畏，以兽面纹的形式在思想上完成了对自己政权的保护”的问题，并指出：查克雨神虽然是“至高无上的，但它的崇拜群则是不分等级、不受限制的”，而铸有兽面纹的各种青铜器，则是“用来‘明贵贱，辨等第（列）’礼器”；所以，查克雨神不会因为政权更替和社会生活的进步而退出历史舞台，“时至今日，骄阳似火，缺雨少水的尤卡坦半岛上，大规模祈拜查克雨神以求雨的场面仍不时出现”，而“西周中期以后，在周公‘敬天保民’思想的制约下，正宗的兽面纹逐步退出青铜器，代之以变形的兽纹和清新、解放、流动的线条，从一种象征符号蜕变成了纹样图案”，“彻底失去了护身的社会功能”。进行这样的分析和论述，朝远的目的，就是要说明：“对两地文化的某些相似性，不能仅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孤立片面地热衷于进行一件器物、一对纹饰的简单类化，而忽视对整个文化形态的综合研究”。

如今，读着这样的文字，自然使我联想到朝远曾经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他在学术上的目标，是要把考古和他一直以来最感兴趣的先秦史研究结合起来。朝远的先秦史研究，是很扎实的，这有他的《西周土地关系论》为证。但更为重要的，是他对先秦史研究的历史和现况的了解。朝远去世后，我到他的办公室，帮他的家人收拾他的遗物，发现他有大量的本子、卡片和稿纸，上面抄写的都是先秦典籍中的内容。他曾投入大量精力从事上博简的整理，一些稿纸上写满了有

关的内容，做了很多的记号。自到博物馆后，朝远夜以继日地研究古文献，研究金文和青铜器。我曾经问他，是不是如当初设想的那样，他也研究甲骨文。他说，时间太少，甲骨文只是识读，有《甲骨文合集》，随时翻看，研究谈不上。但是，有时候他跟我谈到某些古文字的释读问题时，他会讲到甲骨文，用手指蘸着水就在桌上写给我看，讲得津津有味。虽然在这些问题上，我永远都只是听众，但使我吃惊的是，朝远总是要讲出一番道理，联系到先秦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我难以想像，在大量的行政工作之下，他竟能挤出这么多时间来读书。

对博物馆工作，朝远也是充满了热情和激情的。他几乎走遍了世界上的各大博物馆，他说他很想把自己看到的那些世界文物的精华，用好的图片和文字介绍给中国的学生。当然，他也希望能写一本关于中国文物的图文并茂的书，献给中国的学生。他说，博物馆是有一种潜移默化的文化传承力量的，青年从图书上获得的文物知识，在看到实物时，心中是会涌起某种激情的。前些时候，博物馆教育部的一个同志在朝远的追思会上谈到，朝远曾叮嘱他：要关心部门每一个同志业务水平的提高；上海博物馆每年要接待上百万的参观者，一定要使每一个前来参观的人都有所得而归。朝远生病期间，我有几次去看他，都吃了闭门羹。给他打电话，才知道他到博物馆去了；这也可见他对于博物馆事业深厚的情感。

……

朝远最后一次进医院，我还以为跟过去一样，不几天就可以出院的。没想到，他这一次进去后，就再也没有出院。我每次去看他，他不是躺在床上，就是坐在椅子上。这时候，他已说不动话了。他总是紧闭着眼睛，忍受着极大的痛苦。我常常是坐在那里，默默地看着他。他知道我在，有时会睁开眼睛看看我，对我笑笑。有一次他对我说：“念祺，我难过极了。”这在他生病期间，是唯一的一次。

从朝远生病，一直到他去世，对于身体上的痛苦，他总是默默忍受。有时，我看他那种强忍的表情，问他怎么样。他总若无其事地说：“有点痛，不要紧。”直到生命的最后，朝远都极坚强地忍受着病痛的折磨。

那天我走的时候对他说：“朝远，小昕马上就回来了。”他笑了。

小昕是朝远的女儿，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学位。朝远病危，母亲要女儿赶快回来，但朝远不让，要她放假了再回来，以免耽误学业。现在，说到女儿要回来了，朝远笑了。他笑得那样的高兴，我也高兴，而悲哀却随之袭来。那两天，我一直在惦着小昕快点到。所有的人都无能为力了，只有等小昕快点到。小昕很快就到了，每天都陪在父亲身边。朝远去世的时候，女儿也守在他的身边。她母亲告诉我，朝远当时很清醒，看到女儿又笑了，要求扶他坐起来。坐着坐着，他说：“我累了，让我躺下，我要走了。”

朝远就这样走了；非常平静而有尊严地走了。他躺在病床上，再也没有痛苦。去世前，他告诉家人和同事，在他的生命结束时，就用歌曲《橄榄树》送他去远方。他不要其他任何追悼的仪式。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轻流的小溪，为了宽广的草原，流浪远方，流浪……；还有，还有，为了梦中的橄榄树，橄榄树……”在朝远去世后最初的几天里，我的思绪中，总是飘荡着《橄榄树》的曲调，但是我终于没有唱出声来。在朝远的性格里，永远隐约着一种忧郁的浪漫。他把自己沉浸在历史、古文字和青铜器中，把自己的忧郁和浪漫深深地寄托其中，这就是他梦中的橄榄树，是他远方的故乡……

于2009年6月20日



2003年8月5日于上海博物馆馆长室。左起：陈长华、杨德林、赵斌、王志德、程念祺、李朝远。

我思故我是

I think, therefore, I am.

撰文 / 马今洪

李朝远先生1990年下半年来到上海博物馆青铜部工作，至2009年近19年，与他同事亦近19年。长期共事特别是最后两年奉馆领导及周亚主任托付相助料理治疗事项，让我们之间有了更多的交流和互知。

朝远在《青铜器学步集》跋中写过：

三十多年来一直喜欢着哲人的两句话：

‘飞矢不动’

‘我思故我在’

依旧喜欢着，无论地球如何转动，仍是座右铭。

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名言：I think, therefore, I am，通常被译为“我思故我在”，其实朝远一直认同北大陈波教授和赵敦华先生对笛卡尔此语的解释：笛卡尔的第一原则应该是“我思故我是”——“不思，物质的我也存在，但不思，精神的我将不存在。‘我’区别于他人就在于‘思’，‘思’也就成为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

朝远曾经将《青铜器学步集》跋文的题目就定为《我思故我是》。2006年朝远准备出版论文集，当时因为出版社与他京沪两地遥远不及，而且行政繁忙没有整块的时间复读，所以请求帮助编辑《青铜器学步集》，至2006年夏秋之际我们完成了初稿，那时开始写跋，列下条框，首先解释“学步”多意：第一，学问亦如孩童学步，必须一步一个脚印；第二，从理论研究往器物研究，不可“学步邯郸”“匍匐而归”；第三：对尝试跨界学术路程的一段小结。然后解释了为何将“我思故我在”和“飞矢不动”作为座右铭……但到了年底

却交来了现在这个简单的跋，标注的日子是2006年的最后一天，也是他第一次患病后手术前5天，是疾病迫他放下远虑，让一切删繁就简。但这个简单的跋文依旧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他的内心追求，依旧可以看到他努力跋涉学术道路的过程。

朝远善于冥想，更耐得住苦思的寂寞，只要给他思考的空间，他可以把孤单当成是一个人的狂欢，静静建立起自己的思想方式堡垒，他思想的触角蔓延进青铜器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与历史学等诸多学科，他确实以“我思故我是”向大家证明了自己的存在，同时也通过思想来修正自己的行为。他在“谋道”与“谋食”之间也曾充满徘徊，在“循规”与“逾矩”之间靠挣扎而求得平衡，而最后应该还是相对成功。以



2002年8月李朝远与马承源先生、收藏家范季融先生在晋侯墓地出土国际学术研讨会晚宴上

他学者的本身和立场来维护了学术和学者们的利益，同时赢得同道者的襄助，共同谋求得到更好的发展平台和机会，力争避免被边缘化，这种苦苦坚持相当难得。

朝远是极其迷恋学校的，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他所到一处必定会参观当地的名校，徜徉校园他会乐此不疲、心旷神怡，可他博士毕业后却选择了博物馆，离开象牙塔的围城，开始了全新的、与以前十来年间颇为不同的学术道路和研究方向。当时他的先秦史、史学史、社会心理学和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都已达到一定的高度。之所以这样选择，除去一些客观原因，更重要的是他感觉到了瓶颈，感觉到了自己在先秦史研究的“穷途末路”，也感觉到了思想史、史学史研究的桎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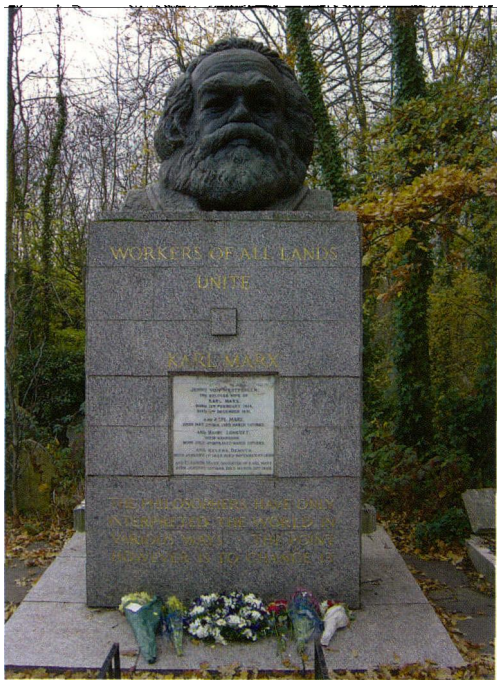
朝远在师从吴泽教授时，以先秦史为本业，主攻西周史。因为吴先生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又是先秦史和史学史的双博导，所以导师除了指导阅读先秦文献，马恩全集也被要求大量阅读，这让他更加深入马克思思想的原点，以至后来凡有机会到英伦都会前往瞻仰朝拜马克思，将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运用于先秦

史的研究中也是颇有独到之处的。在对先秦史的研究方面，导师强调的王国维的两重证据法让他开始更注重为文物所证实的史料，西周时期最直接、未经后人删改的史料就是青铜器及其铭文。这成了他走向青铜器，并且“浅尝”而未“辄止”的开始。在他的博士论文《西周领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研究》（出版后为《西周土地关系论》）中，青铜器资料作为论据被大量引用，当时上海博物馆的马承源馆长作为吴泽先生早年的学生和现时的青铜器专家，被邀请为当年李朝远博士论文的审定委员之一，对非考古学专业的博士生在先秦史研究论文中大量运用青铜器资料，马先生甚为赏识。这样的赏识令年青学者看到光明、兴奋不已，投身门下，以求全新的发展。理论研究重思维重抽象，器物研究重排比重物象，更重细节，对器物的亲近感和灵敏度需要天赋，但也能以勤补拙，在马先生的引领和青铜部同仁的帮助下，朝远在全新的环境和学科中学会亲近、感受文物，直到自主拿捏。其间青铜器研究部的同仁们给了他很大的鼓励、关心、理解和照顾。对青铜器的喜爱、共同的智慧碰撞、互相默契带来的欢愉被

机遇组合在一起，彼此合作，尽力工作。

朝远迂回曲径，试着为自己设定了更远大和力求完善的目标。他原来师从吴泽先生——以理论之学见长，后再师马承源先生——以器物之学见长，他希望以自己的苦学使得二者有机结合，求得相得益彰。而以他今日之成绩，也确实是在走向目标。

首先，器物研究让他从微观感触取



永在的马克思（2003年11月16日李朝远摄）



不列颠博物馆藏马克思《资本论》版本
（2003年11月18日李朝远摄）

得了新的思考方式。朝远从马先生和青铜部学到并不断提高的对青铜器鉴定能力，让他受益匪浅。因为文物鉴定往往是研究可靠度的保证、也是学术发言权的前提，同时也可以成为谋求进入高水平对话平台的手段之一，当在理论学者面前展示鉴定才能时，得到的认可会迅速而有效。

其次，考古天地让他获得了无数新的讯息和参照。朝远曾非常感叹考古工作和考古工作者的辛苦与伟大，对能撷取和引用他们的成果感到庆幸。与考古界的密切联系源于他真诚的态度、互助的精神，以及对文物及考古工作的尊重。他的谦逊和强烈的求知欲是他一张极好的招牌，而坦诚直言和历史学博士的功底也换来大家更多的信任和交流。

再者，博物馆的行政工作同样给了他带来广泛接触各界的平台、纵横各方的人脉和频繁游历世界的机会。这对他尤其重要，完善了他的为人和性情。他很庆幸自己得到上海博物馆博及世界诸多博物馆、各大学提供的良好机会，使他能够出访海外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博物馆，开阔眼界并感受学术的快慰，而真正的走向世界正是他对学术的追求。

他努力付出和工作，也得到他的应得。同时他又以克己精神默默地坚持理论研究，力求不离原旨不废原功，可以说他做到了成功地扩大了半径却没有离开中心。他不求著作等身，却奉献出精华。

中国的学术领域，学府间、研究所间、博物馆间；学府、研究所、博物馆之间；历史学、考古学、文物界等等学科，其间诸多的“介而不通”是客观存在的，现在即使有所改变也还是局限在学者与学者的人与人交流，而朝远以一个历史学者，来打破隔膜，学习成为一位文物专家，将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

互为借鉴运用，并直接的、不打折扣的将考古学、器物学成果运用到历史学研究中去，进而希望提高将来的史学史、思想史研究。敢如此实践而获得认可的学者不多，实在难得。曾经他也很担心会理论既丢，而器物亦未学好，但他更深信自己是一个善于游走的独立思想体，纵使学行于邯郸，一定会既得国能，又不失其故行，决不会匍匐而归。他视文物、博物馆学的研究为另辟蹊径，积累着先秦史研究的后坐力，盼望攀登历史学高峰……他期待着自己回归、期待以自身修行来实践学术的融合、期待真正的全新的提高，也在等待着研究佳期的到来，上苍却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

I think, therefore, I am —— 静静的思考

The flying arrow is at rest —— 默默的积累

朝远的另一句座右铭就是古希腊哲学家芝诺的The flying arrow is at rest —— “飞矢不动”，他更中意于此句牛津版的直译：“飞矢在休息”，他说若将此由中文直译回“飞着的箭头不在动”就乱弹琴了。他将自己的努力看成是行程，他享受积累的过程如同飞矢中的前的“稍息”。我们和他一样不能再见飞矢最后的辉煌，可我们的确看见了飞行的美丽——飞矢真的休息了。■



2008年4月10日与同人畅游杭州西溪湿地公园

乳钉雷纹蛙饰甬 与四点配列式鼎

The frog-ear *bu* (liquid vessel) and *ding* (food vessel) with legs and handles arranged on four points

撰文 / 张昌平

和朝远交流，青铜器差不多是恒定不变的话题。2004年我参观上海博物馆，一周的时间里朝远及周亚、马今洪兄在忙碌中抽出午休的时间相陪，大家指点展品，讨论青铜，此情景至今仍然是我的一段美好的回忆。

朝远对于青铜器中一些问题的关注，或经年而不舍。在商文化周边地区青铜器的研究中，该类型青铜器的性质甚至是年代的判定，一直都是令人困扰的问题。2001年2月北京大学召开“长江流域青铜文化国际学术研究会”，朝远发表《江西新干中稜青铜器的再认识》⁽¹⁾，即着眼于此。我当时提交会议的是《商代铜甬概论》⁽²⁾，朝远告之马今洪先生已有相似的研究⁽³⁾，并特别问我对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乳钉雷纹蛙饰甬⁽⁴⁾年代的看法。2002年我在美国国家美术馆作“北美地区收藏的商时期南方地区青铜器”为主题的研究，当年10月与朝远相遇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那件乳钉雷纹蛙饰甬的年代问题仍然为他所关注。朝远对青铜时代早期鼎等三足食器一耳对一足形成的视觉上不平衡现象也关注有年，这也促使我在观察盘龙城青铜器时特别注意这一问题。

我认为以上两个问题大体可有较明确的解释，可惜这几年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向朝远具体求教。这里写出来问于同道，也算是对朝远的一点告慰和追思。

(1) 李朝远：《江西新干中稜青铜器的再认识》，高崇文、安田喜宪主编：《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2年。又收入李朝远：《青铜器学步集》，文物出版社，2007年。

(2) 张昌平：《商代铜甬概论》，高崇文、安田喜宪主编：《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2年。

(3) 马今洪：《试论青铜甬》，《上海博物馆集刊》第八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

(4)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第4卷图109，文物出版社，1998年。《中国青铜器全集》以下简称《全集》。

在南方地区青铜器的研究中，对青铜器年代的判断往往决定对其性质的认识。例如对南方地区出土的青铜铙，多数学者认为属于晚商时期。但向桃初先生通过在宁乡一带的考古工作，认为其年代不早于西周早期⁽⁵⁾。马承源和陈佩芬先生更认为这些铙属于春秋时期，其认识体现在他们分别主编的《中国青铜器全集》第11卷和《夏商周青铜器研究·东周篇》下卷之中。这几位学者对南方青铜器性质的认识，自然也迥异于其他持商时期看法的学者。形成铜铙年代这样巨大的歧见，一个背景原因是南方地区青铜器并不一定能够对应于中原文化系统青铜器的年代框架，而南方青铜器自身又缺乏在时代特征上相互串联的因素以资论证它们的年代。年代问题已经是南方乃至商文化周边地区青铜器研究的一个关键。乳钉雷纹蛙饰甗的年代，也关乎于此。

乳钉雷纹蛙饰甗（图1A）宽沿折腹，圈足带三个大的长方形镂孔。甗肩部三个圆雕的蛙和云状扉棱相间，其间饰六个凸目的长躯龙纹。折腹上下各一周方向相反的鱼纹，鱼纹以下为乳钉雷纹，圈足则饰一周宽带勾云纹。此甗较早著录于《商周彝器通考》附图八九六，归入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收藏后屡有图录⁽⁶⁾，陈公柔、张长寿先生也曾有介绍⁽⁷⁾。

关于乳钉雷纹蛙饰甗的年代和性质，学者并无太大的分歧。陈公柔、张长寿先生谓：“这类甗出于南土，江苏、安徽一带出土的簋形器往往是敛口，器腹扁而肥大者，其年代或在殷末周初。”不过，与该甗类似的鱼纹又见于岳阳鲂鱼



图1A 乳钉雷纹蛙饰甗（摘自《全集》4、109）



图1B 圈足纹饰（根据 d'Argencé 1977）

山叠（《全集》4，93），几乎相同的鱼纹见于新干大洋洲那件由甗改制的鼎⁽⁸⁾，因此马今洪先生的论文⁽⁹⁾、《全集》4中相对应的词条都认为乳钉雷纹蛙饰甗属于晚商时期长江流域的产品。此外，乳钉雷纹蛙饰甗的云状扉棱、圈足长方形大镂孔、下腹乳钉雷纹等特征也支持这一观点。

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我们知道，青铜甗出现于中商文化时期，在中原地区流行于殷墟文化第一、二期，其形制的变化是甗的腹部趋于低扁。乳钉雷纹蛙饰甗腹部折而扁，器形特殊而似乎具有较晚的特性。就装饰而言，此甗所饰的乳钉雷

(5) 向桃初：《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化研究》，线装书局，2008年。

(6) René Yvon Lefebvre d'Argencé, *Ancient Chinese Bronzes in the Avery Brundage Collection*, Berkeley, Calif. 1966. René Yvon Lefebvre d'Argencé, *Chinese Treasures from the Avery Brundage Collection*, New York. 1968. René Yvon Lefebvre d'Argencé, *Bronze Vessels of Ancient China in the Avery Brundage Collection*,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1977.

(7) 陈寿：《记布伦戴奇收藏的中国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陈寿为陈公柔、张长寿二先生笔名。该文又收入张长寿：《商周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2007年。

(8) 江西省博物馆等：《新干商代大墓》彩版11，文物出版社，1997年。

(9) 马今洪：《试论青铜甗》，《上海博物馆集刊》第八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

纹在西周青铜器如簋类器中仍然常见，蛙、鱼类题材的纹饰在东周时期青铜器上也不乏其例。另一方面，此甗的产地也似乎不能遽定于南方地区。类似乳钉雷纹蛙饰甗的扉棱、乳钉雷纹、长方形大镂孔诸特征的甗，出土于山西保德林遮峪（图2）（《全集》4，108）。在黄河中游地区、城固地区出土青铜器中也见有蛙等水生动物类装饰。准次，乳钉雷纹蛙饰甗的年代和性质，都还需要谨慎考虑。朝远关注乳钉雷纹蛙饰甗，是不足为奇的。

乳钉雷纹甗是甗中较常见的一类，其中腹部低扁者，除前述保德林遮峪甗为出土之外，其他所见均为传世品。赛克勒美术馆收藏一件带盖甗⁽¹⁰⁾，其器形、扉棱、纹饰均与保德林遮峪甗近似，贝格立（Robert W. Bagley）因此推测该甗可能来自于商人的西北⁽¹¹⁾。与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乳钉雷纹蛙饰甗形制接近的还有两件，一件收藏于上海博物馆⁽¹²⁾，近似的特征是折腹的器形以及下腹的纹饰（图3）。另一件甗曾经为柏林亚洲艺术馆收藏⁽¹³⁾，图像见容庚《商周彝器通考》附图八九五（图4），近似的特征是其颈部的龙纹、上腹的鱼纹。这两件甗的年代应当与乳钉雷纹蛙饰甗基本相同，但也不见其他明确可判定年代的特征。要进一步订证乳钉雷纹蛙饰甗的年代，还需要其他方面的依据。

与一般甗在圈足上装饰线状的兽面纹或云雷纹不同，我们注意到乳钉雷纹蛙饰甗的圈足纹饰颇为特别。这种纹饰在结构上并不复杂，它是由一些云状的细线将阳带分为上下两层，每层都是由两个弧曲程度不同的图块作连续排列，上下两层图块的排列相反，视觉上形成斜对称的纹饰单



图2 保德林遮峪甗（摘自《全集》4，108）



图3 上海博物馆藏甗（摘自《夏商周青铜器研究·夏商篇》173）



图4 雷纹鱼纹甗（摘自《商周彝器通考》附图895）

(10) Robert W. Bagley, *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No. 55, Washington 1987. 该甗后来出现在克里斯蒂拍卖目录中: *Important Chinese Works of Art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Christie's, December 1, 1994, New York.

(11) Robert W. Bagley, *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p330, Washington 1987.

(12) 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夏商篇下》173,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年。

(13) Otto Kummel, *Chinesische Bronzen aus der Abteilung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an den Staatlichen Museen Berlin*, Berlin, 1928. Ludwig Bachhofer,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rt*, Burlington Magazine 67, July-December 1935.

元(图1B)。从纹饰构图来看,此类纹饰是由宽带构成云纹,这与云纹一般由细线组成不同,因此,马今洪先生称其为“一种特殊的云纹”,d'Argencé则宣称“在任何时期的任何器类上均不见类似的装饰”⁽¹⁴⁾。

其实这种宽带状云纹可见若干构图类似者。山西忻县连寺沟一座墓葬出土鼎3、爵1、觚1⁽¹⁵⁾,其中的一件鼎上腹纹饰也作勾云的宽带状⁽¹⁶⁾(图5),只是宽带之中细线增多,但纹饰与乳钉雷纹蛙饰甗云纹的相似性是显然的。岳阳铜鼓山一座墓葬中出土鼎、觚各一件⁽¹⁷⁾,鼎上腹的纹饰较忻县连寺沟鼎云纹的单元划分更加明确,但云纹仍然保持了连续的单元、斜对称结构的特性(图6、7B)。连寺沟鼎与铜鼓山鼎相近的云纹,缘自它们相同的时代。这两件鼎的器形也相当接近,鼎腹部较宽,三足已脱离锥足而接近于柱形,这些符合殷墟文化第一期鼎如武官M1鼎(《全集》2,2)的特征。连寺沟和铜鼓山鼎所在的两座墓葬均同出青铜器。忻县连寺沟同出的鼎,三足呈锥形,仍然具有中商文化时期青铜器特征。连寺沟觚形制接近殷墟文化时期觚。铜鼓山鼎同出觚则是殷墟文化第一期的形制特征,该觚器形和纹饰不见异于中原文化的个性特征。这些情况说明连寺沟鼎与铜鼓山鼎的年代属于殷墟文化第一期是比较明确的。除以上二鼎之外,多伦多皇家博物馆⁽¹⁸⁾、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¹⁹⁾各见一件鼎饰有类似纹饰,两件鼎的形制特征与上述诸鼎接近,其年代都不应晚于殷墟文化第二期。

甗类器之中也见有类似纹饰。布拉格国家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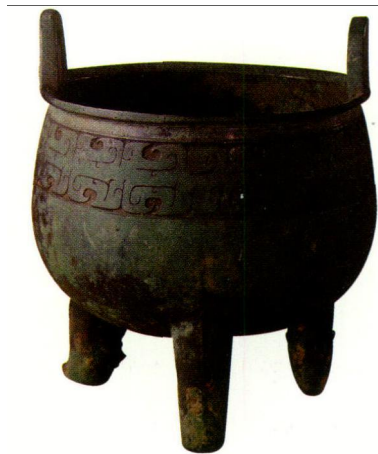


图5 忻县连寺沟云纹鼎(摘自《山西文物馆藏珍品·青铜器》图7)



图6 岳阳铜鼓山云纹鼎(《湖南考古2002》彩版1)



图7A 布拉格国家美术馆藏甗带状云纹



图7B 岳阳铜鼓山鼎带状云纹



图7C 妇好墓连体甗兽面纹

(14) René-Yvon Lefebvre d'Argencé, *Bronze Vessels of Ancient China in the Avery Brundage Collection*, p38,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1977.

(15) 沈振中:《忻县连寺沟出土的青铜器》,《文物》1972年第4期。

(16) 《山西文物馆藏珍品·青铜器》图7。山西人民出版社。

(17) 岳阳市云溪区文物管理所:《岳阳市市郊铜鼓山遗址新出土的青铜器》,《湖南考古2002》,岳麓书社,2004年。

(18) 张昌平:《北美地区所见中国商时期南方或南方特征青铜器》,罗覃主编:《全球化背景下考古学新前沿:解读中国古代传统》,AMS艺术、科学和人文基金,2008年。

(19) René-Yvon Lefebvre d'Argencé, *Bronze Vessels of Ancient China in the Avery Brundage Collection*, p31,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1977.

术馆收藏的一件甗圈足上饰宽带状云纹⁽²⁰⁾（图7A。该甗除了圈足纹饰之外，器腹部浑圆，肩部和腹部分别饰夔龙纹和勾连雷纹（图8），形制特征与殷墟文化典型甗如殷墟武官M1甗（《全集》3，72）、大司空M663甗（《全集》3，74）几无二至。这说明，宽带云纹出现在甗中也不代表较晚的时代特征。

上述诸器宽带状云纹的纹样与器壁平齐，这暗示纹饰可能是模作的，即在模上剔去纹样之间的留白，保留的部分形成纹带，并在视觉上有凸起于器表之感。忻县连寺沟鼎的云纹有一组纹饰单元幅面较窄，是模作时空间不够所致。从风格上看，这种宽带纹饰与二里冈文化时期流行的带

状兽面纹近似，同时更接近于罗越（Max Loehr）所分商时期纹饰五型中的Ⅲ、Ⅳ型⁽²¹⁾。这也就是说，宽带云纹处于二里冈文化时期带状兽面纹和殷墟文化晚期半浮雕兽面纹两个大的发展阶段之间。妇好墓连体甗口下饰一周兽面纹（图7C）⁽²²⁾，兽面纹躯体的单元仍然可见类似宽带云纹的结构，这大约是这种风格的最后阶段了。看来，宽带云纹在纹饰发展的年代系列，与其所装饰的器物年代是完全一致的。

准次，通过对乳钉雷纹蛙饰甗圈足所饰较特殊的宽带云纹的考察，结合该甗其他诸项时代特征，将其年代订在殷墟文化第一、二期是没有问题的。

二

殷墟文化第一期之前的鼎等类器，一耳与一足在俯视时处于同一位置，在此之后，耳与足的位置关系变化为双耳与两足平行，这两种形式被郭宝钧先生称为“耳足四点配列式”和“耳足五点配列式”⁽²³⁾（图9）。四点配列式的鼎或鬲，无论从那个角度观察，都不能形成左右对称的均匀关系（图10）。“夏代晚期和商代早中期的三足食器，一耳与一足在同一垂直线上的原因，我们还不十分清楚。一耳一足的相垂在视觉上所产生的不平衡感，不会在长达二三百年的时间内不为匠师们所察觉……只有经过了数百年的探索，到殷墟一期前后时，鼎、鬲等三足食器的一耳方开始不再与一足相对，呈两耳在三足之间的对称式。这成为以后所有鼎、鬲等器的固定格式”⁽²⁴⁾。

朝远关注的早期鼎类器四点配列的不对称问题，涉及到对早期青铜器形制变化背景的考察。



图8 布拉格国家美术馆藏甗（摘自Kesner 19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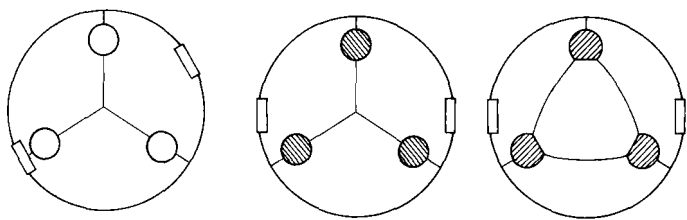


图9 商时期青铜鼎范型示意图

(20) Nejstarší ěínské Umění ve Sbírka Národní Galerie v Praze, No. 44, Praha 1990. Ladislav Kesner, *Ancient Chinese Bronzes and Jades in the National Gallery, Prague*, Orientations, December 1998.

(21) 这种纹饰的实例如湖北黄陂盘龙城李家嘴M1出土的双耳兽面纹簋（《全集》1，164）、崇阳兽面纹铜鼓（《全集》4，178）。另外在罗越的五型中，二里冈文化青铜器中的带状兽面纹属于第Ⅱ型。罗越的讨论参：Max Loehr, *The Bronze Styles of the Anyang Period (1300–1028 B.C.)*, *Archives of the Chinese Art Society of America*, 1953, 7.

(2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图10，2，文物出版社，1980年。

(23) 郭宝钧：《商周青铜器群综合研究》第5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24) 李朝远：《吴地青铜器未受商文化影响论》，《青铜器学步集》第212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图10 盘龙城李家嘴M1:2鼎

我们曾经试图提出解释⁽²⁵⁾，但未及其详。这里再作申论如次。

我们知道，早期青铜器形制方面的一些特别之处，往往是出于对当时制作工艺技术的考虑。这种情况尤其在殷墟文化第一期之前的青铜器中多见，例如当时容器如鼎、鬲等器足作空锥足，是因为尚未使用盲芯技术、铸造中不能将器足与器腹封闭之故。鼎、鬲的耳足作四点配列的方式，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技术方式选择。由于鼎、鬲的三足都是位于外范的合范处，将一耳安置在一足处，实际上可能是为了将其放置在合范处。也就是说，鼎、鬲的三足置于合范处，是一个便于合范技术的选择，同样为了方便于合范，也将一耳安置在合范处，并由此形成耳足的四点配列。

可以注意到，不仅仅是鼎和鬲，在罍、爵、盃

等器类中也都是将足、鋈等附件的位置安置在与范缝相对应的位置，这些显然都是出于合范技术上的考虑。正因为如此，在罍、爵、盃等类器中，鋈的位置也总是与一足对应。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鼎耳与足相对应，不是出于形制上的考虑需要将它们放在一起，而是因为技术选择后的一个结果。

合范处安排附件还不仅仅限于耳与鋈，尊与罍、饕孔、兽首和扉棱，也都是与器物的三条范缝位置重合。二里岗文化时期罍底常使用一个垫片，这一垫片也往往位于三范缝交汇处⁽²⁶⁾。由此可知，将附件安置在两块外范的结合处，的确是方便于合范所作的技术选择。因此，中商文化时期之后将鼎鬲的双耳调整到与两足平行，反倒是出于追求视觉效果考虑、作出不便于铸造生产的调整了。与这种调整的情况类似的例子是尊的兽首位置的变化，二里冈文化较早的兽首位置跨骑于范缝中央，这样兽首的位置就处于两组兽面纹的结合部，较晚直至西周时期兽首则被调整到两条范缝之间，也就是为了将其安置在兽面纹或纹带的中轴处（图11）。

如果一个铸件外范分范的数量与该铸件上的附件数量不一致，就会出现鼎鬲这种不协调的情况。因为在三条范缝上，如将一耳安置在范缝处，另一耳就无法对应于其他的任何一条范缝，否则双耳在器口的分布就不协调：这是两个附件不能协调于三块外范。与此相反，当一个铸件只有两块外范而需要安置三个附件时，同样会出现这种不协调。例如二分范的觚若有三个饕孔，必有一饕孔与一条范缝位置重合，另外的饕孔则位于另一条范缝两侧。由于青铜器纹饰的分组总是与分范一致，这样上述关系在视觉上就表现为纹饰与耳及饕孔的关系，因而总给人以不平衡之感（图12）。

准上所述，鼎鬲的耳足位置的四点配列，并不是早期青铜器中孤立的特殊现象，而是在当时

(25) 张昌平：《盘龙城出土商代青铜容器的初步考察》，《江汉考古》，2003年第1期。

(26) 张昌平：《盘龙城出土商代青铜容器的初步考察》，《江汉考古》，2003年第1期。

技术背景之下的一个必然选择，这种选择至少在殷墟文化之前是居于主流技术位置的，这可能也是何以这种方式能够流传久远的原因。因为当某一文化现象成为社会主流，其不合理之处能够暂时被忽视。如果说鼎鬲的耳足四点配列是出于技术的需要而不得不作出的选择，但一旦这种安排成为定式，它甚至成为被模仿的对象。盘

龙城李家嘴 M1 : 5 簋器口外设一对兽首形耳(图 13)，这对器耳是在器体铸成后再铸接而上，因此双耳在器侧上的位置是可以自由选择的。但当时的匠人并未选择双耳平行于范缝的位置，而是仍然将一耳安置在一条范缝处。这使簋腹部的兽面纹中轴偏向双耳的一侧，形成在我们今天看来不平衡的视觉效果。但从二里冈文化时期的观念意识上，该簋双耳的位置关系恐怕并没有我们今天所认为的不当之处。

以上讨论可能距离朝远思考的深度还有甚远的差距，但确实是感召于他作为学者献身于学术的精神。记得 2007 年 6 月我因为要访问普林斯顿大学一年而向朝远电话辞行，当时朝远已知他的病情进入晚期，但仍然从容表达期待我回国后叙谈收获。当我 2008 年 9 月专程赴上博探望他时，他的身体已极度衰弱，但他还专门找出我发表在《上海文博论丛》2007 年第 3 期上《关于曾侯乙尊盘》的文章，询问尊盘中的一些细节。他最近发表在《上海文博论丛》2009 年第 1 期上的《召鼎诸铭文拓片之比勘》，经勘中观察之细致、精准、透出他专注而淡定的心境，而他文末标记“2009 年 14 日毕稿”，时间是在他辞世之前不足半月！或许对于一个真正的学者，在“享受学术的欢愉”⁽²⁷⁾中，已可将名利乃至生死置之度外。仅此精神，足为我辈楷模矣！■

(27) 李朝远：《青铜器学步集》第 448 页《跋》，文物出版社，2007 年。



图 11 早期青铜器兽首位置的变化 A. 郑州向阳回民食品厂尊《全集》一、106 B. 小屯 M18 兽面纹尊《全集》三、96



图 12 盘龙城杨家湾 M3 : 2 觚



图 13 盘龙城李家嘴 M1 : 5 簋

读《召鼎诸铭文拓片之比勘》

On article “A Textual Study on the Inscriptions of Hu Ding (wine vessel)”

撰文 / 杜金鹏

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李朝远兄驾鹤西去了。当周亚先生通报这个噩耗时，心中真是不能接受！谦逊的学者，忠诚的朋友，可敬的兄长，在他事业的顶峰时刻英年早逝，悲哉，痛哉！当朝远兄的追思会在上海举行时，我因公务羁绊未能前往，特意拜请好友北京大学徐天进教授代为致哀，至今，还为不能亲自赴沪祭悼朝远兄而遗憾和愧疚……

回想近年来与朝远兄的交往，深感其治学的勤奋、为人的诚恳和做事的认真。2005年10月中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偃师主办“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朝远兄提交了论文，并应邀做大会发言。我在编辑会议论文集时，特意选用了朝远兄大会发言照片，认为他是中年学者里面有代表性的佼佼者（图1）。

前日接上海博物馆徐汝聪君来信，说《上海文博》将刊登李朝远先生纪念专题，约我“为朝远先生写些东西，长短、形式无论”。终于有机会寄托我对朝远兄的哀思了，自然欣然领命。

近日拜读朝远新作《召鼎诸铭文拓片之比勘》（《上海文博》论丛2009年第1期），据汝聪君说“该是他最后完成的一篇文章”，遂起意以这篇文章为题写几句话，作为对朝远兄的纪念。

召鼎是西周中期青铜重器，以其376字长篇铭文而名闻中外。该鼎铭文拓片传世颇多，而实



图1 李朝远2005年在“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大会发言（杜金鹏提供）

物则于晚清时候毁于兵火不复流传。1987年上海博物馆购入一件召鼎仿制品，铸铭极佳，遂有传说某些著作中的召鼎铭文拓片可能误用了仿品之拓片。对于严肃的学术著作而言，这可是个不得不厘清的问题。李朝远先生“为了弄清此事，遂将数种召鼎的铭文拓片进行了比勘”，他查阅的召鼎铭文拓本有8种之多，经过认真比较，他发现：以往著录的召鼎铭文拓片之间，并无显著差异，“基本的相同”；而它们与上海博物馆收藏召鼎仿品铭文拓片相比，却有“数个关键处”存在不同。他的研究结论是：“上海博物馆所藏的仿召鼎铭文未被其他书籍使用，亦可证明仿召鼎的仿制时间不会太早。”有了这个结论，学者便可放松一颗悬起的心，毕竟李鬼没能混进学术著作中。

朝远兄在此文中，借用了传统的考古学“标型学”方法，通过对拓片文字和垫片痕迹等的比

勘，澄清了一个学术事实。其治学的认真、细腻，通过一篇短文彰显无余。

我也注意到，朝远兄此文的修辞多处显得粗糙，这可不是他的一贯文风。可以想见，在执笔撰写这篇文章时，在朝远兄身上，事业心与病痛的搏斗一定十分激烈！因此，文章并不长，却已然不能平心静气地琢磨、推敲了……

行文至此，我想借机做点补充考证，敢以续貂。

根据照片和拓片看（图2），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召鼎仿品确实属于“高仿”产品，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首先，对器形的选择十分恰当。按西周青铜鼎的器形，主要有四足方鼎和三足圆鼎两大类；圆鼎中又有鬲形（分裆）鼎与盆形鼎（圆底）两型；盆形鼎中，大致又可分为敛口蹄足与敛口或直口柱足两式。前式器体庞大、厚重，花纹宽粗、凝重，常有长篇铭文。后式器体相对小巧、轻薄，

花纹纤细、流畅。

郭宝钧先生曾指出：西周青铜器铭文“常洋洋数十言或数百言，要‘论撰其先祖之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见《礼记·祭统》）。因有这种特殊目的，故选器类

之口大、底宽、腹浅易见的如鼎、簋、簠、盘、盂，又如尊（器虽深而口侈），钟（铭可铸器表），以论撰其先祖之功德，实以自撰其功德，以夸耀自己，传遗于后世，使‘子子孙孙永宝用’。这时器为载铭而铸，非铭为附器而刻，铭既有夸耀之用，故撰写不嫌长多，随文而铸的器，自亦不妨重大。”^{（1）}从召鼎铭文拓片分析，其铭文字数多达376字，行间紧密，应是铸在大型圆鼎之内。拓片右下角显现鼎足痕迹，知是盆形鼎。再根据召鼎为“款足作牛首形”和“鼎高二尺，围四尺，深九寸”^{（2）}的描述，可断定召鼎必是大型敛口蹄足鼎。这类铜鼎当以殷墟出土晚商《戊嗣子鼎》^{（3）}为先驱，与著名西周早期康王铜器《大盂鼎》^{（4）}（图3）、西周中期孝王铜器《大克鼎》^{（5）}（图4）等为同类。

其次，它把铭文模拟得惟妙惟肖，直可乱真。无论字形、字距甚至笔道，无不与原拓逼近。

其三，锈色处理平实淡雅，绝少人工堆砌痕迹，颇有“熟坑”铜器韵味。

但是，该鼎的仿制也有瑕疵。朝远兄已经点破了五处，不赘述。补充几点是：

一、造型。就现知商周铜鼎编年序列看，召鼎造型应在西周早期《大盂鼎》、1966年陕西岐山贺家村出土西周早期饕餮纹鼎^{（6）}（图5）、1973年陕西长安新旺村出土西周早期勾连纹鼎^{（7）}与《大克鼎》、西周晚期《禹鼎》^{（8）}之间。今观上海博物馆藏仿品召鼎，腹过深，口过敛，其外形轮廓接近西周早期铜鼎。

据记载，召鼎为“款足”，即鼎足上部中空，若俯视鼎内，可见鼎足的坑洞。这种形式的鼎足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常见。如殷墟出土“戊嗣子鼎”、



图2 上海博物馆藏仿品召鼎，采自李朝远《召鼎诸铭文拓片之比勘》

（1）郭宝钧：《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页67—68，文物出版社，1981年

（2）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四（清嘉庆九年刻本）引钱献之语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页271图一九八，文物出版社，1987年

（4）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卷五，图版二五，文物出版社，1996年

（5）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卷五，图版三一，文物出版社，1996年

（6）长水：《岐山贺家村出土西周铜器》，《文物》1972年6期；曹玮主编：《周原出土青铜器》第六卷，页1092—1093，巴蜀出版社，2005年

（7）李学勤主编：《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4·青铜器（上）》图版一四八，文物出版社，1985年

（8）李学勤主编：《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4·青铜器（上）》图版二二六，文物出版社，1985年

西周早期《大盂鼎》、岐山贺家村出土西周早期饕餮纹鼎等均是“款足”。传世拓片右下角的突棱痕迹正是款足边沿拓痕。仿者不知其谜，遂在此处加铸一道不规则棱线，以对应拓片显示的突棱。

仿品鼎足明显弯曲，与西周常见同类鼎足相比内曲过于夸张。

仿品的鼎耳首部外卷，也是一个破绽。同期同类铜鼎的鼎耳虽然常见微微外侈，但并无外卷者。

二、装饰。西周大型蹄足圆鼎一般在上腹部有装饰纹带，主要是饕餮纹，常见卷云底纹。且分割成6个单元，以短扉棱为轴对称布列构成三个兽面。仿品纹饰类似几何纹，无层次，与饕餮纹并无相仿处。纹饰连成一周，无分割。

西周大型蹄足圆鼎一般有扉棱装饰，见于颈下、足背。仿品无扉棱。

西周大型蹄足圆鼎的足跟多装饰有浅浮雕兽首，大角尖耳，似牛但已抽象化、图案化，以扉棱为轴左右对称。仿品足跟为高浮雕（甚至可看作是半圆雕），为写实牛头，不见扉棱。

仿品的鼎腹中部有一周突棱，是西周同类铜鼎所未见之装饰，此属仿者画蛇添足。

三、铭文。仿品作者在铭文上下了极大功夫，

但还是存有纰漏。如诸拓本首字“惟”的第一“捺”有断笔，仿品则连贯无断笔；诸拓本首行末字左右肩头和左腋下各有白斑，应是铜器铸造时留下的“砂眼”之拓迹。仿品无此痕；等等。

四、锈色。其问题是鼎腹内外锈色过于统一，一些不易触及的地方也没有加重的锈蚀痕迹。应是仿者的一种疏漏。

由此可见，上海博物馆所藏召卣鼎仿品的制作者，具有很丰富的西周青铜器知识和高深的西周铜器仿制技术，也许，作者曾口耳相传听说过召卣鼎的样式，但可以肯定他没有见过召卣鼎原器。

新中国成立以后，考古学迅猛发展，随着大量考古发现和研究的深入，逐步建立了商周青铜器的谱系序列。如果召卣鼎仿品的制作者熟悉这种学术进展（以其对铭文的钻研程度看，如果身逢其时，一定会掌握这种进展），必定会避免上述若干疏漏，会将仿品制作的更加贴近西周青铜器真品。

鉴此，笔者推测上海博物馆藏召卣鼎仿品的生产年代，应该是在民国年间，最迟在建国初年。

匆匆间写下上面这些文字，应急之作，谨用以纪念朝远兄。

2009年6月17日于北京官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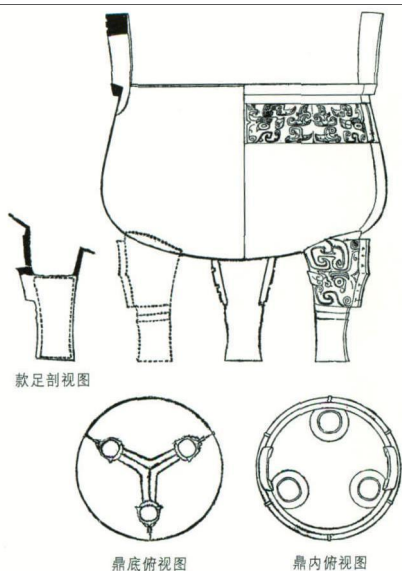


图3 大盂鼎图。采自郭宝钧《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图一九



图4 大克鼎，采自《中国青铜器全集》卷五，图版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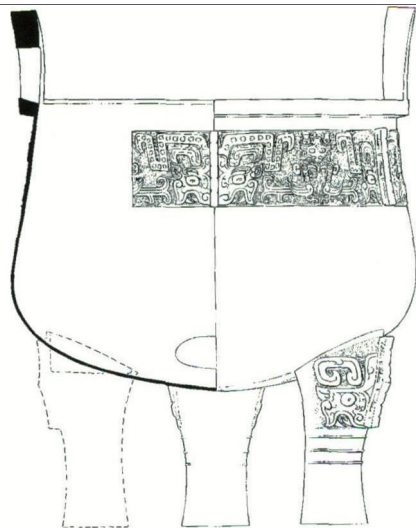


图5 岐山贺家村出土西周早期饕餮纹鼎线图，采自曹玮主编《周原出土青铜器》第六卷

拏画初探

A preliminary study of gong-hua (a painting method)

撰文 / 周永良

钮琇《觚剩续编》卷四“物觚”：“王秋山工为拏画，凡人物、楼台、山水、花木，俱于纸上用指甲及细针拏出，较纸高止分许，大劈小衬，吮粉研朱，设色浓淡，布境浅深，无不一一法古名绘，其技绝神，无有能传之者。红豆词人赋《沁园春》赠之曰：天壤王郎，具天下才，而巧若斯。向边生腕里，撇开彩笔；薛娘针下，碎襞灵丝。缀就成春，呼来欲活，展卷同惊未有奇。真奇也，比千秋图画，高一分儿。相逢别具襟期，看湖海风流一笑时。爱谈兵席上，公髯如戟；衔觞烛底，人醉如泥。技至此乎！谁为是者？长啸翻疑不是伊。何疑尔，疑红窗金剪，另有蛾眉。”⁽¹⁾ 红豆词人即吴绮，《林蕙堂全集》卷二十五中收有《沁园春·赠王秋山》词，并注“秋山工为拏画”。⁽²⁾

王士禛《香祖笔记》卷二：“钮玉樵琇云，有王秋山者，工为拏画，凡人物、楼台、山水、花木，皆于纸上用指甲及细针拏出，设色浓淡，布

境浅深，一法古名画。按拏当作巩，音筑；字书：以手拏物也。近闽中有织画，乃破纸为条织成之，山水、人物、花鸟，布置设色，种种臻妙，与刺绣无异，亦奇技也。”⁽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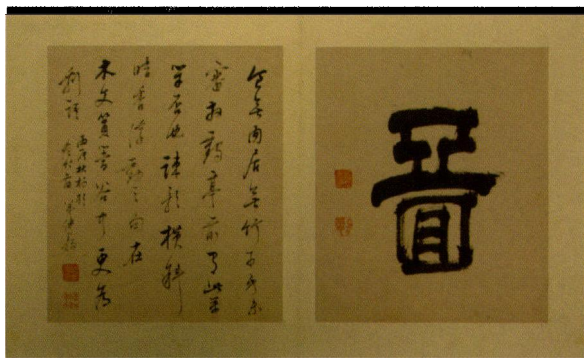
王秋山生平无考，也无作品传世，所作拏画究竟如何？我们只能根据吴绮赠王秋山的词、钮琇的描述以及王士禛的解释这些简略文字作一些分析。

吴绮词中“针”、“丝”、“缀”之意，似乎与丝织刺绣类似。王士禛在解释拏画之时，即以“闽中织画”来比喻，也与吴绮描述相合。钮琇又说“较纸高止分许，大劈小衬，吮粉研朱”，表明敷有浓厚的色彩且具有一定的厚度，应该是一种施用色彩颜料较厚的重彩画，所用质地只说是在纸上。王士禛还对拏字进行了考释。检《康熙字典》拏，音拱，《说文》，拥也，又巩或加手作拏，抱也；巩，音拱，《说文》，拥也，抱也，一作拏；筑，音竹，捣也，凡土工曰筑。据《康熙字典》“拏”

(1) 钮琇(?—1704)，字玉樵，江苏吴江人。康熙十一年(1672)拔贡，知河南项城，陕西白水兼摄沈邱蒲城事，后为广东高明县令，卒于任上。工诗文，著有临野堂集十三卷、文集十卷、诗余二卷及白水县志十四卷。载清史列传。《觚剩》刊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觚剩续编》刊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第1404页，谭正璧编，1981年上海书店据光明书局1934年版复印(下同)、《明清笔记丛书·觚剩》点校说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2) 吴绮(1619—1694)，字园次、听翁，又号红豆词人，江都(今属扬州)人，清初著名词曲家。贡生，顺治甲午(1654)荐授秘书院中书舍人，历官兵部主事、工部郎中。康熙五年(1666)至八年出任湖州知府。为官“多风力、尚风节、饶风雅”，被称为“三风太守”。后又出游广东充幕僚。著有《林蕙堂集》、《亭皋集》、《艺香词》、《岭南风物记》等。《清代名人传略》第395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四库全书》集部七《林蕙堂全集》提要。

(3) 《明清笔记丛书·香祖笔记》第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和“叭”字均无“筑”字的音与意。但据钮琇描述的拏画之意确与“築”字“擣”的意思比较接近，故王士禛的解释或有所据。

王秋山的拏画迄今未有发现，上海博物馆却藏有一件夏雯的拏画《看竹图并题跋四十二开》册（见图）⁽⁴⁾，对拏画的认识具有十分重要意义。该图纵21.2厘米，横20.3厘米，在绢地上绘缓坡、小溪、竹林，敷以淡淡的花青、赭石，意境十分清雅。自署：“乙卯初夏予客游武原，喜晤木翁道兄于玉山草堂，唱酬对酒，风雨联床，殊多晨夕素心之乐，临行分手，作此看竹图为赠，以志把臂入林之好，端阳前二日西湖夏雯拏画于城南涉园。”下铃一白文方印漫漶不清，朱文方印“夏雯”，起首章铃朱文椭圆印“笔花”，画本幅右下有乾隆三年（1738）郑联题字。该册副页册首有“丙辰秋杪”释传綰（朱耷）隶书引首“看竹图”三字及行书题句，图后附朱彝尊、蒋景祁、胡亦堂、毛奇龄、施润章、徐乾学、彭孙遹、尤侗、张玉书、屈大均、倪灿、释大汕等清初诸名人题咏以及清末民国蒲华、吴昌硕、吴用威跋文、题诗共四十二家。

上款“木翁道兄”生平以及该图创作年代、地点，据汪世清先生《八大山人与林木文》一文考

证，⁽⁵⁾ 木翁姓林，名枚，又名之枚，字木文，号松亭，又号锦石山樵，生于清顺治戊子（顺治五年，1648），卒年不详。嘉兴人，国子生。少时有才名，曾受业于嘉兴诗人周筼谷及海盐彭仲谋、彭孙遹兄弟。交游甚广，游踪所至，江东、江西，南至岭海，北抵燕京。著有《合组集八卷》、《泅江集七卷》。

康熙十四年（1675）五月初三，夏雯在武原（今浙江海盐）玉山草堂与林木文相晤，临别在城南涉园作此拏画看竹图相赠，时木文28岁。⁽⁶⁾ 林木文对此图十分珍视，每至各地皆随身携带，二十余年广征海内名家题跋。康熙丙辰秋，即次年，林木文将此图携至江西，在奉新耕香院晤释传綰（朱耷），求为题签、题句。又至南昌、高安，请蒋景祁、曹亮、胡亦堂、漆宿兴等题字。康熙二十一年（1682）冬至二十二年春又携至北京，请许嗣隆、毛奇龄、施润章、徐乾学、徐秉义、尤侗、彭孙遹、张养蒙等题字。林木文在康熙四年前曾入粤，约康熙二十三年年至康熙二十七年，又至广东，期间请罗克忠、陈宪祖、沈凤、陈玉、李聿修、倪瓒等题字，屈大均、释大汕题字虽未署年月，当也在此间所题。清初人题跋，除乾隆三年郑联外，见有年款最晚为康熙三十四年（乙

(4) 《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四册，第365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5) 香港《大公报》《艺林》新619期，1988年5月9日。

(6) 涉园，在海盐南门外乌夜村，清初张维赤所筑，有揽翠阁、杏台、流觞亭、簑谷等诸名胜，范承谟、王士禛、彭孙遹等均有题咏。张维赤，原名恒，字螺浮，博学有才识，顺治乙未（1655）进士，官礼科给事中。著有《退思轩诗集》等。见光绪《海盐县志》卷七、卷十六。夏雯在上款中称之为“翁”，似与其年龄不相符。但题跋中如施润章、尤侗、毛奇龄等较林木文年长二、三十岁，亦称之“年翁”、“年台”、“道长兄”，蒋景祁等同辈者，均称“木老”“木翁”，此只古人尊称而已，与实际年龄并无多大关系。

亥, 1695) 新安胡汝贤题字。乾隆三年后百余年未见有题跋, 直至光绪、民国间始有蒲华、吴昌硕、吴用威题跋。(7)

夏雯生平, 最早见《图绘宝鉴续纂八卷》卷七, 页四十八: “夏雯, 字治徵 (按画传编韵治作始), 又号南屏山樵, 钱塘 (今杭州) 人。善山水、人物。少好音律, 萃精疲神。中年得耳疾, 复于笔墨间变出新制, 以缣绢作山水、人物、花卉、虫鱼, 应手飞动, 名为拏画。尽工致之巧, 尤为时重。”(8) 夏雯生卒年尚无考, 据图后“壬戌冬日” (康熙二十一年冬, 1682) 尤侗题诗: “林子原饶林下风, 夏生妙画兴相同”, 称夏雯为“生”, 可见其时年龄应在二十余岁, 似与林木文年相若或略小, 约生于清顺治中叶。

该图是笔者所见存世唯一的一件自署为“拏



画”的实物。可是对照吴绮、钮琇以及王士禛所描述的拏画特征, 却大相径庭, 反复细察该拏画, 所绘竹叶、竹杆、竹节、坡石以及设色, 尤其是起收笔见有锋颖, 其笔墨效果完全系用毛笔绘成, 与常见毛笔所作绘画无丝毫差别。如用“指甲、细针”工具来创作, 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毛笔锋颖的效果。是吴绮、钮琇、王士禛对拏画记载失实? 抑或作者故弄玄虚? 迷雾重重, 令人费解。在册末吴昌硕和吴用威跋中似乎已注意到这个问题, 吴昌硕题云: “剩有衰颜绣不工, 榆桐露布当书空”, 吴用威则题: “夏君此图作于绢素, 阅世既久, 爪痕针孔益茫灭, 不复可寻。”均认为是因年代久远, 画面褪去了原有“爪痕针孔”和“吮粉研朱”的色彩。

画原貌究竟如何? 再看看该图后许多清初人的有关诗文题跋。他们在题跋时, 距该图创作仅一、二十年, 林木文又十分珍重, 故画面不至有大的损坏, 所见当基本是原样。

蒋景祁: “……看吴绫, 生写有长康。走缕飞针失巧, 绘塑两茫茫。一对形神浑入妙, 况幅巾, 道服荷裳。”

漆宿兴: “淇园人远, 寒梢付与鹅溪绢。镂空托素开生面。石畔林间, 莫是曾相见。虚费彩毫横尺练, 平原拟绣劳针线。艺元象设还轻羨。情至文生, 体制偏僂变。”

毛奇龄: “……练裙葛带寻常见, 错认平原是绣人。”(9)

屈大均: “萧疏篁竹, 美人手爪时相触。枝枝

(7) 据图后蒲华跋文, 清同光时期曾为新昌陈句香购藏。图中钤有朱文方印“虞琴秘笈”, 知后转为余杭姚虞琴收藏, 吴用威为之题跋。吴用威生平不详。

(8) 清康熙借绿草堂本。据谢魏考证, 约刊于康熙四十年前, 《中国画学著作考录》第432页, 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

(9) 唐李贺诗: “买丝绣作平原君, 有酒唯浇赵州土”, 言平原君之好士, 而深致其企想之心。后人遂有以丝绣为平原君之像者, 称丝《绣平原》。毛奇龄款署: “题拏画看竹图为木文年翁并正, 时壬戌嘉平月, 西河毛奇龄并写。”语句不通, 毛既署“题……并正”, 又署“……题并写”, 似可理解毛奇龄既题图又作画, 细察末“题并写”三字笔迹虽似, 位置大小似有后添之疑。事有巧合, 《神州国光集》(民国元年十月) 确刊载一幅《看竹图》立轴, 署为毛奇龄作, 吴县朱氏藏, 并附图照。绘竹石间坐一持扇高士, 构图、大小尺寸与此夏雯看竹图完全不同。更可异者, 图上隶书“看竹图”三字, 题跋者倪灿、张养蒙、施润章、释大汕、尤侗以及毛奇龄款题, 与夏雯看竹图中此六人题跋内容、形式如出一辙, 上款也同为“木文”。唯毛奇龄末款署“题并写”三字, 变为“题并画”。细察该图笔法疏薄拙劣, 疑系伪作。此或与毛奇龄“题并写”三字有关。待考。

叶叶如新沐。写向鹅溪，享尽潇湘福。冰绡细褶为春服。针神更使人如玉。丝丝难绣文章腹。腹里流光，照映笏筓谷。”

倪灿：“要知种竹当年事，记取高人落墨初。障日成荫图画见，挥毫倚壁计非疏。”

释大汕：“冰绡霞縠，图来腻粉如堪掬。湘皋一片浮烟绿。抗首清流，仿佛瞻淇澳。”

上述题词中“走缕飞针失巧”、“针神更使人如玉，丝丝难绣文章腹”等语句，都以刺绣来比喻和形容，意即类似刺绣，更赞誉它比“刺绣平原”更生动传神。又说“绘塑两茫茫”、“镂空托素”、“冰绡霞縠，图来腻粉如堪掬”，意即是用粉状颜料靠指甲、细针堆塑（也即所谓“拏”）出一定厚度的画面，具有刺绣的立体感和效果，正合吴绮、钮琇、王士禛之说。值得注意的是蒋景祁“绘塑两茫茫。一对形神浑入妙”以及倪灿“记取高人落墨初”，“挥毫倚壁计非疏”等句，意即除了用指甲及细针进行“塑”（即拏意），还有用毛笔进行挥毫绘写的部分，“笔绘”和“指甲及细针‘塑’（拏）”两种方法可以同时结合使用，不完全“撇开彩笔”，如钮琇所说用指甲和细针“拏”。此图所见毛笔痕迹，即是明证，无怪作者题款钤盖了一方“笔花”的起首章。如今只是指甲及细针“拏”的部分“阅世既久”，“爪痕针孔”

茫灭不复可寻。质地也不仅用纸也用绢。遗憾的是保存完整的拏画实物迄今未有发现，未能一睹庐山真面。

钮琇说“其技绝神，无有能传之者。”故拏画当时即很少有人能作，至今失传已久，传世作品极罕。能作拏画者，文献记载绝少，除王秋山、夏雯外，尚有高云见载《杭州府志》卷一百五十，艺术二，页八⁽¹⁰⁾：“高云，字逸上，先世山阴人，云侍父始移钱塘（今杭州）。少慕篆刻，搜讨古文奇字，至忘饥疲。尝以意制葵花绣盒，坚致如石，方圆巧妙，名闻贡使。……亦写花鸟、人物。一夕忽弃笔砚，取五色绢，肖貌成形，名曰拏画。戏作太真春睡图，令人色动，于是高士乞图东篱，文人乞图白骡；武夫乞图羽猎；尼媪乞图绣佛。又工制骨叉，腻如犀玉，不减拏画名。……”但最早在清康熙年间林璐所撰高云传。⁽¹¹⁾只说“吾十指天然笔也”，未言高云作拏画。但清人一般也将拏画视作指画或将指画视作拏画的一种。陆廷灿在《南村随笔》中说：“钮玉樵云有王秋山者，工拏画，……近多指头画者，其即拏画之派欤？”⁽¹²⁾钱泳《履园丛话》则说：“国初王秋山、高其佩，皆工于指头画，自此开端，遂遍天下，……”

王秋山、夏雯、高云生卒年虽无可确知，但

(10)《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199号，2839页。据清龚嘉德修，李榕纂，民国十一年铅印影印本。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11)《岁寒堂集存稿·琴山樵者传》：“山樵者，姓高氏，名云，逸上其字，……其父始移居钱塘，山阴有琴山，乃更号琴山樵者，不忘旧也。高君少慕篆刻，搜讨古文奇字，顿忘饥疲。尝以意制绣盒，坚如石，赫口为质，丹漆为绿，文锦为衣，方圆巧妙，名闻贡使。……闲暇无事，好写花鸟、人物。一夕取五色绢，肖貌成形，顾诸郎君笑曰：‘吾十指天然笔也。’戏作太真舞霓裳，踰迁纸上，令人魂动色飞，于是高士乞图东篱；文人乞白骡或美人图；尼媪乞绣佛图；武夫喜图羽猎。……高君既以多技藉甚吴越间，争愿交欢高君。……晚年益端精篆刻，凿铜切玉，深悔少年杂作戏为耳，乃日益有名，自言吾可传者唯图章，更著印谱数卷行于世云。”《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84册105页，湖北省图书馆藏清康熙武林还读斋刻本。林璐生平及生卒年，《中国文学家大辞典》1302—1303页：“林璐（约公元1653年前后在世），字玉逵，号鹿庵，浙江钱塘人，生卒年均不详，……明末诸生，工文，著有《岁寒堂集存稿一卷》（四库总目）传于世。”据《岁寒堂集存稿·报祝子坚先生书》：“仆生二十年为皇朝乙酉，明季丧亡，略悉梗概。”又，《送顾且庵侍御书》：“岁戊午，余客江右，……余年五十有三，君已六十有二。”“乙酉”即清顺治元年（1645），林年20岁；“戊午”即清康熙十七年（1678），林年53岁。以此推算，林璐生于明天启六年（1626）殆无异议。又，据该《岁寒堂集存稿》康熙二十三年甲子（1684）颜光敏序云：“岁庚申（1680年）仆与林子鹿庵定交西陵寓舍，出岁寒堂一编相质问，别去凡五载，林子更删定前后诸作，名之曰存稿，而邮书属仆序。……”则1684年，林59岁尚健在。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83册734页又收入《岁寒堂初集五卷》，前有康熙己未（1679年）初夏丁澎（药园）、康熙戊午冬（1678年）孙治（字台）、康熙著雍敦祥（1678年）秋毛先舒（稚黄）序。未见《琴山樵者传》，则当为1680—1684这五年间所撰。

(12)《续修四库全书·1137子部·杂家类》《南村随笔》卷六，14页，雍正十三年陆氏寿椿堂刻本影印。

洪園人遠寒梢付與鶯溪綰縷空託素開
生面石畔林間莫是曾相見 虛費彩毫
橫尺練平原擬繡勞銀線藝元像設還輕
義情至文生體製偏儂變

右調一斛珠偶寓江城侍坐
二齋胡夫子喜晤

木老年道兄因出罕畫者竹圖為賦小詞以
誌欣賞之懷錄呈
穀正

宜豐第漆宿興共稿



勝王亭畔恰相逢交臂說同鄉意氣如君
落：應把竹林觴底事風塵憔悴負幽盟
泉石茗鑪香歎韶華易過孤懷莫寄江曲
九迴腸 此意問誰能識看吳綾生寫有
長康走縷飛針失巧繪塑兩茫：一對形
神渾入妙況幅中道服荷裳只幾時歸去
故園應更長新篁 調寄南浦

丙辰初冬邂逅

林木翁道長兄才章門承 命為題筆畫看竹圖兼
誌畫法之妙請 正 陽羨蔣景祁



林子原饒林下風夏
生妙画真相同竭
年携向長安道吹
破紅塵十丈雲

壬戌冬日題看竹圖以
木文年翁正 尤侗



長向吳牛搯卜隣王家
樓上竹簾清練裙荷帶
尋常見錦認平聲文繡
人題翠畫看竹圖為

西河老翁齡
題并寫



十年歸夢寄西風長水溪
邊學釣翁覓得鱗鱗千萬
畝携將書卷過江東一要知
種竹當年事記取高人落
墨初障日成陰圖畫見揮
毫倚壁針非疎題看竹圖為

木文年翁正

倪璣



蕭疎篁竹美人手水時相觸
枝葉如新沐寫向幾溪亭
畫滿湘福冰綃細摺為春眼
針神更使人如絲難繡文
車後：裏流光照映貧富為

題看竹圖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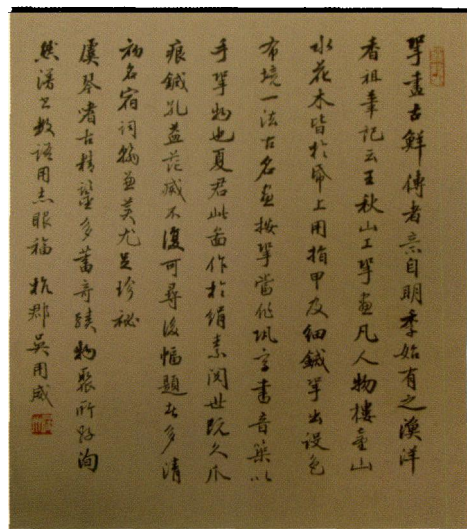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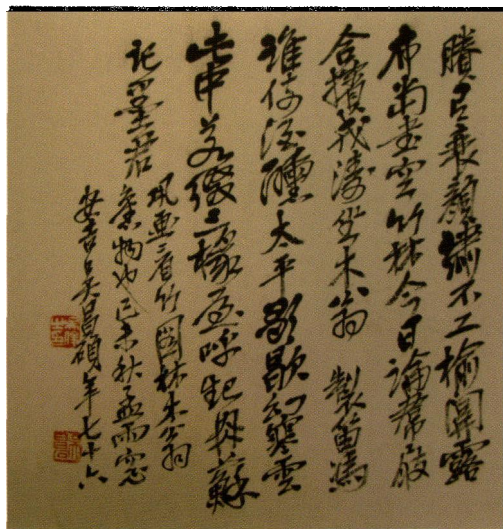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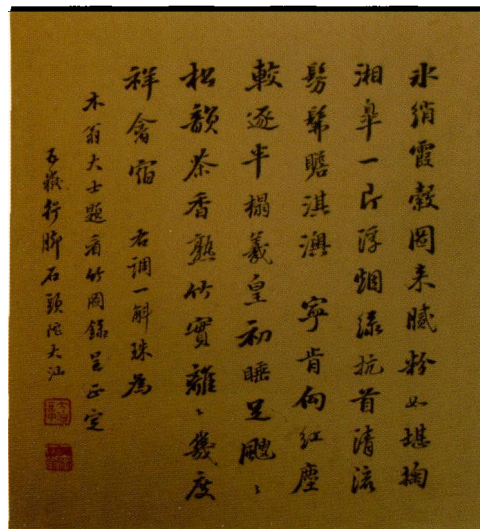
木文道長兄

番禺屈大均

据上述文献仍可知其大致生活年代，吴绮《沁园春赠王秋山》词未有纪年，考吴绮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卒于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享年75岁，主要生活在清顺治至康熙中期。其称王秋山为王郎，一则表明吴绮的长者口吻，年龄应在六十左右或以上，此时应已在康熙一、二十年，同时也表明王秋山此时年龄大约只20余岁，与夏雯年龄相仿或略小。据林璐在1680—1684年间所撰高云传，既已述及高云晚年专心篆刻之事，则高云年当长于林璐或至少为同辈，或较王秋山、夏雯更年长。不过在康熙二十年左右，王秋山、夏雯尚为二、三十岁的青年，高云则已是晚年。夏雯虽有“变出新制”、“名为拏画”之说，但高云至少在中年以前已作拏画，故高云作拏画或更早于王秋山和夏雯。至于拏画创始于何时，夏雯看竹图册末吴用威跋文中说：“拏画古鲜传者，意自明季始有之。”从现有王秋山、夏雯、高云作拏画的年代分析，最早大约也已进入清代了。

拏画与明清江浙地区丝织手工业的发达，以及与之相关的缂丝、刺绣等工艺美术的繁荣紧密相关。晚明时期至清初松江府（今属上海）缪氏、韩希孟露香园顾绣驰誉海内，影响深远。

徐蔚南《顾绣考·顾绣之技能》云：“露香园顾绣，据称得之内院，其擘丝细过与发，而针如毫，配色则亦有秘传，故能点染成文，不特翎毛花卉，巧夺天工，而山水、人物无不逼肖活现。而顾韩希孟深通六法，远绍唐宋发绣之真传，摹绣古今名人书画，别有会心，故世备称顾绣之巧，谓为写生如画，他处所无，名之曰画绣，而许为女中神针也。”^{〔13〕}顾绣最大特色，是以宋元名画为粉本，运针如笔，色丝为墨，吴绫作纸，丝线配色和谐典雅，层层晕色，极力模仿笔绘技艺与笔墨艺术特色，精妙绝伦，颇具绘画之神韵，以至于难辨是画是绣。以今存顾绣作品所见，凡针丝不及处，则以画笔补色，半绣半绘，画绣结合。拏画也与顾绣一样“无不一一法古名绘”，吴绮《沁园春赠王秋山词》中“薛娘针下，碎翳灵丝。”更是将之视作刺绣。拏画艺术特色与顾绣极有相似之处，顾绣半绣半绘，拏画却是半塑半绘。夏雯、高云均为杭人，王秋山虽未知籍贯，但知其者钮琇为吴江人、吴绮为扬州人，故王秋山很可能也为吴越间人。拏画的产生，应有其特有的吴越地域文化背景，很有可能受到了顾绣的启发或影响。



〔13〕 中华书局，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

不独医林仰宗匠 即论书法亦传人

——浅论何长治书法艺术

On He Changzhi's calligraphic art

撰文 / 黄玉亭

上海市青浦区博物馆收藏有何长治行书屏四幅，本文由此对何长治书法艺术及其相关进行了考证。

一 何长治书法渊源

何长治，(1821—1889)，字补之，号鸿舫，晚年自号横泖病鸿，青浦重固镇人。幼年受严格的家庭教育，酷爱诗文，亦工词曲。10岁丧父后，决心继承家学，遂刻苦钻研岐黄之术，成为名医，“病者求治，户限为穿”。道光二十九年(1849)迁居松江颛桥，晚年在上海城内设诊所，行医于沪杭一带。光绪十五年(1889)病逝于上海，终年68岁。何长治善书法，学颜真卿，字体秀逸苍劲。间画墨梅，世不易得。处方墨迹，为艺术珍品，病家、医家、书法爱好者珍若拱璧。遗著有《续医人史传》、《通波惰农诗稿》、《还如阁诗存》等。

与清代书家或习董书、或临汉隶不同，何长治书法直学唐碑、兼采晋帖，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考何氏书法渊源，主要有两途：一为唐代颜真卿，一为山阴《兰亭序》。

1. 胎息颜真卿

颜真卿的书法艺术渊源于家学，初习褚遂良，师从张旭而得笔法。40岁左右已独具面目，

自成一体，其后不断变法，面貌日新，是我国书法史上作品保留最多的大师。他书法风格雍容壮伟，气势磅礴雄健，不仅表现了盛唐时代风貌，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典型代表。颜书顺应时代和汉字发展的要求，在真、行、草书方面为我国书法艺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颜真卿现存楷书真迹中最早的作品是《多宝塔碑》，它融合了此前三家长处而又严守法度，在其左倾右扬，中宫紧凑，粗细匀称，笔致方折紧敛的结体里还保留着王羲之、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多家的影响。到了《东方朔画赞碑》、《谒金天王祠记》已发生了较大变化。前者清劲，后者遒伟，用笔已开始由方折转向圆转的趋势。

自古就有“字怕放大”，“字怕上墙”之说，而颜书则恰恰相反。颜真卿更喜欢写擘窠大字，因为大字更能表现出颜书新笔法、新结体、新章法的博大雄强气势。比如，他打破以内笔法为主、只能局限于简牍小字书的古法束缚，对结体、分间布白等一整套书法艺术构成要素进行了全面自觉的革新，为大字书法的创作开辟了道路。后人多以颜体题写门匾、摩崖刻石等，都说明了这一点。

颜真卿的行草书与他的真楷书相比，成熟得更早，艺术价值更高。初唐行书依然刻意求功于

“二王”一派晋人书风，发展到杜牧时代，已是山重水复了。颜真卿又高举行草书变法的大旗，以超群的见识，对“二王”行书做出了重大的革新与创变，这更是难能可贵的。晋书，特别是王羲之的行书至唐已定为一尊，确实也到了极高的程度。情随事迁，字因时变。颜真卿以其儒学入世之观，变羲之等道学出世之念，以其墨迹淋漓之法浸入“二王”清秀俊逸的行书之中，并将楷书的“正面开放”转益以行书，一改王书侧面对人之势，获得了重大进展。颜真卿的行草书独树一帜

帜，得与王羲之并为行草书法的宗师。如果说王书是隶意飘逸，清秀雅静一路书风之首，颜书则主篆意深沉、激越淋漓一路书风之帅。

从何长治现存书法作品来看，受颜平原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青浦博物馆藏清代书法家何长治《行书屏》（图1），纵132厘米，横31.5厘米，纸本。署款“乙酉五月长治临”。钤“淞南学圃髯翁”白文印、“何长治鸿舫印”白文印。

这件作品是何长治的晚年之作，是一件何氏书风中较为含蓄的力作，这种含蓄主要表现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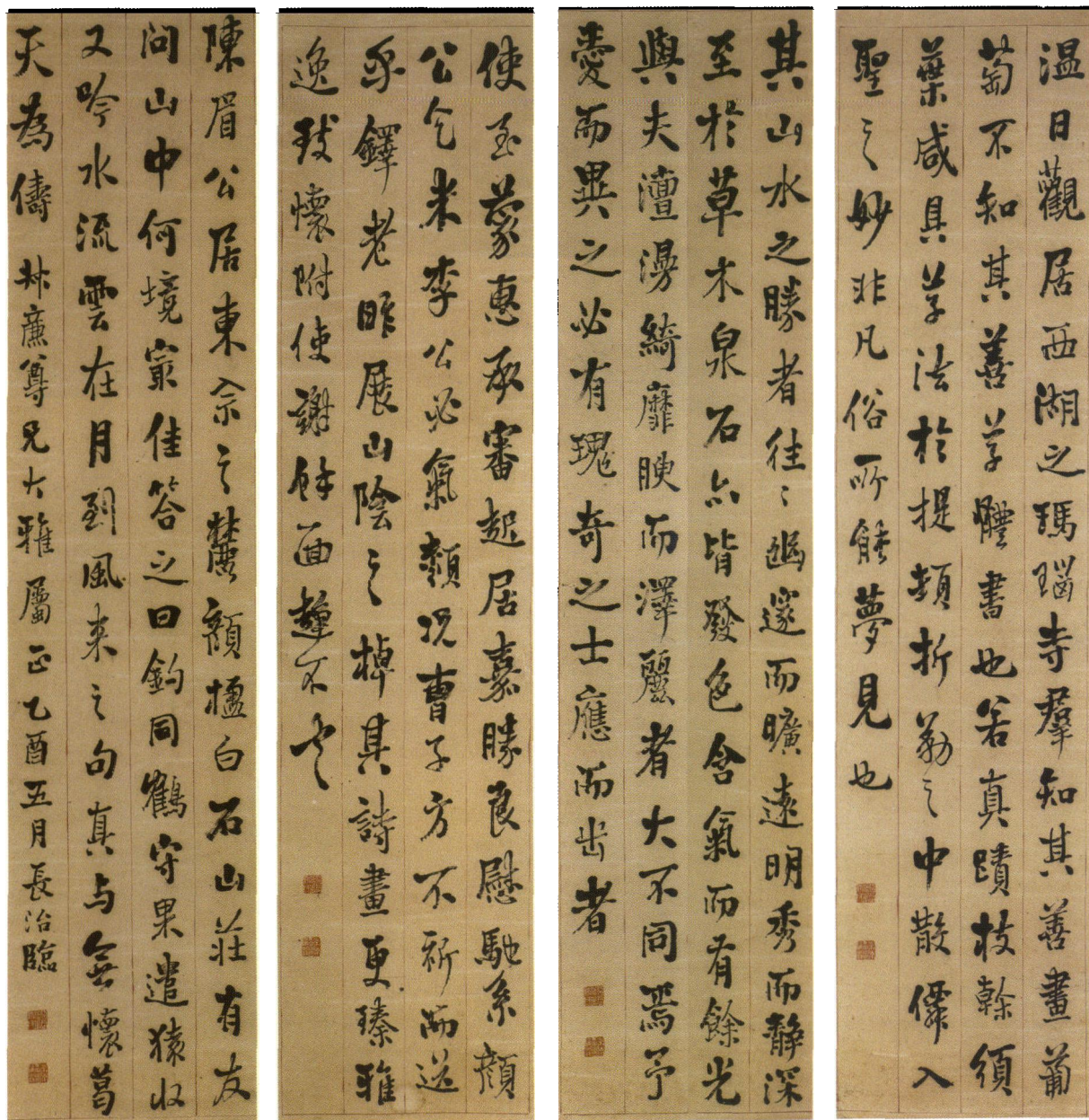


图1

一、用笔没有那种特别突出的顿挫，也没有夸张的笔触，全篇线条圆润、顺畅、平滑；二、结体、章法上没有大开大阖的俯仰、错落的布局，一切都显得平和、严密、匀称。将其与何氏其它许多作品比较，会发现其更充满了一种静穆、文雅的古典美特征。

2. 取笔山阴兰亭

何长治取法于颜，但却又克服了后世学颜普遍存在的板滞浓仄的缺陷，这与何氏上追东晋，取笔“二王”，兼采《兰亭序》关系密切。

《兰亭序》作为书法艺术，被后人奉为不可企及的极品。总结王羲之行书妙处，可以概括为触遇生变、极艳尽态、错落有致、欹正相生、简易洗练、动中寓静，用笔千变万化，章法浑然大成。尤其《兰亭序》的艺术内涵之丰富，决非言语所引尽述。不少赏析《兰亭序》的文章谈到其的笔法结构的多变，常常举文中的二十余“之”字各有变化，无一相同，以此来说明右军书法造诣之深。殊不知，这种千变万化的效果，在作者本人，实在是并非着意求变。倘是他处处留意求变，不免因处处刻意算计而太累，连带后世欣赏者亦心累了。

此帖书法的艺术魅力在于它所特有的变化。这使它于姿媚之中寓存骨力，匠心运处又见自然之神貌。首先是反映在用笔上，此书用笔变化出奇，既有圆浑劲健，又有方列爽快。而从总体风格来看，其用笔多采用偏锋侧压的方法，因而笔锋多刻露于外。而且笔势变幻多姿，致使其笔画形态各异，皆随情随体而变，无一定则。它突出地表现出爽快飘然的神态，以及曲张回转而至跌宕起伏的韵律，其次，在结体上也同样表现变化莫测，具有非凡的艺术魅力。其字有大小，有扁长、有疏密、有伏仰、有含放，有轻巧凝重，无一固定的格式，皆随情而发、因势而变，错落有致而神态自然。由此而使此书在章法上、以及行气上具有突出的艺术特征。致使一行，乃至全篇形成一个完美的整体，而最终体现出其书法具有风骨爽利、姿态妍美、神情飘然、气势酣畅，以及起伏跌宕的奇妙韵律等超神入化的艺术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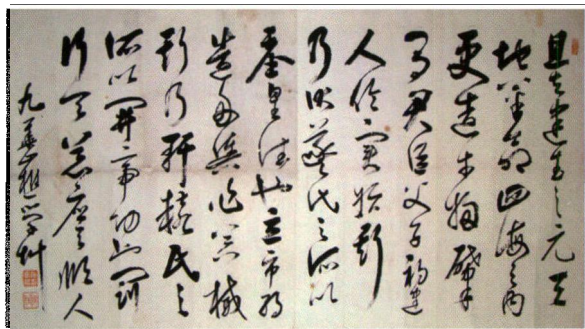


图2

此帖所具有的自然变化的艺术魅力，使它成为一件完美的艺术佳作。正因为如此，才使后人把它作为法帖来临习和模仿，不管时代的变迁，它总是以其独到的艺术魅力影响古往今来的崇拜者，并且作为中国书法主流之典型象征。究其原因，即是书法贵在自然情真。

何长治以王右军之潇洒风流济颜鲁公之森严刚烈，采魏晋神韵以润大唐风度，在书法艺术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如何书行草（图2）系其精意之作。在用笔上，无潦草敷衍之笔，多采用藏锋中行，因而线条圆劲雄厚，表现出沉着稳健的刚阳之美。结体法度森严，密集的笔画更显示出字体的凝重与遒劲。用笔疾迟的节奏感，与疏密布白的灵巧，使作品行气突出，表现出畅达、爽快的情致，具有一泻千里之势。这又恰与沉着雄厚的用笔风格形成中和完美的绝妙的艺术魅力、其神完气足之精神风貌，在艺术上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每一观赏，便使人精神振奋，为其书法中所表达的轩昂雄健所激励。

二 何长治书法艺术成就

何长治书法做到了由巧返拙、由拙生奇、由奇返朴的境界。欣赏何书作品，我们不禁会联想起南朝书学家袁昂在其书学名篇《古今书评》中的评介王羲之的一段话：“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尽管何氏书法的艺术性与王氏书法尚有很大的差距，但在意境上的确有不少相像之处。从这种相像中，我们可以觉察出何氏书风除了颜公楷书之外的另一个来源。魏碑是中国书法史上极为特殊而有趣的一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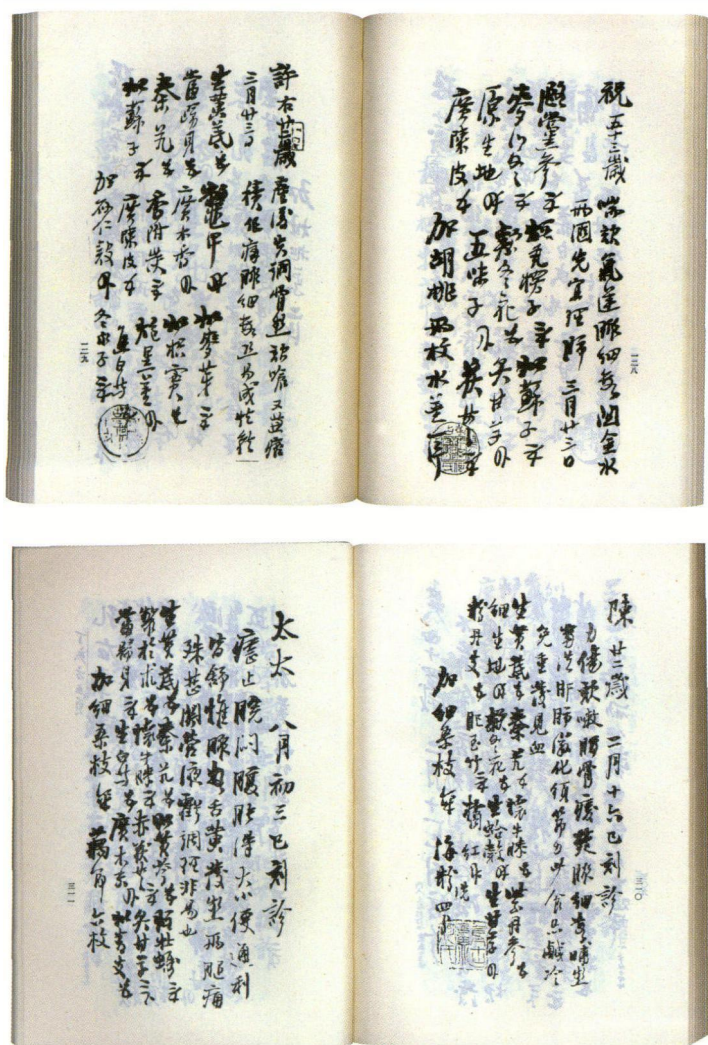


图3

艺术存在。魏碑本身在我们的观念中，总是与刚直、果敢等形容词联系在一起；除此之外，便是稚拙与质朴。何氏作品固然不少魏碑的古拙，但更多了几分唐碑的丰实厚重。

在何氏的一些作品中，不论用笔还是结体，

都与我们关于“智”、“巧”的概念大相径庭：线条平直，没有起伏跌宕；没有抑扬顿挫；重心偏离中心位置；各结构单元形体比例失调，如此等等，在观者心里产生一种憨厚、笨拙的感觉。然而，当我们从另一个方向考虑，结果可能完全相反——平直得几乎没有变化的线条，表明它富含一种强劲的生命力；重心偏移和形体比例的失调，使作品充满了变化和动感，尽管这类作品在用笔和结体的自然性方面有可论之处，但从作品整体来看，却是协调平衡的，当然这是一种变化中的平衡、动态的平衡，这种平衡与静态的平衡相比给我们更多的想象余地。

何长治从唐碑起步，从唐入而又能出于唐。何书摆脱了唐碑的种种束缚和其中的一些习气，以一流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凭着一股惊世骇俗的艺术勇气，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个结构奇巧、捭阖纵横的鲜活生动的艺术形象。多数行书作品

特别是方笺作品（图3）即属此类。

任何一个稍微懂得一点书法或艺术的人，面对这些精美、洒脱而又着力的线条，妥帖而又充满变化（有时幅度相当之大）的形体，都会想见作者本人——一个努力攀登艺术巅峰的中国艺术

相关链接

参考文献：

滕西奇：《中国书法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

张志和：《中国古代的书法艺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卞云和：《书法艺术史话》，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

李鑫华：《中国书法与文化》，中国和平出版社2003年。

陈振濂：《线条的世界：中国书法文化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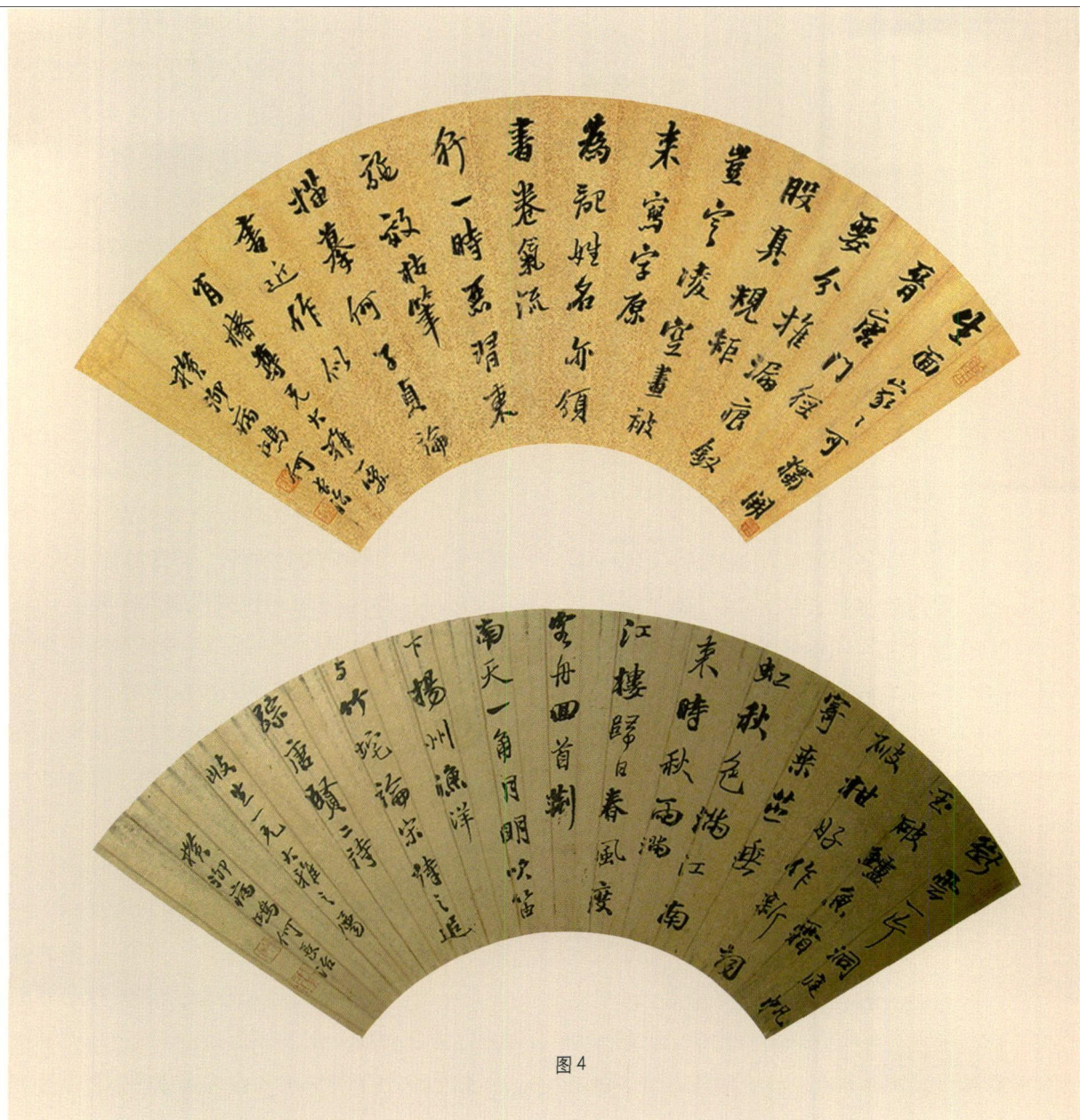


图4

家的人格、胸怀和心智。

何长治永远是多面的。捭阖纵横之外更有精妙绝伦。何长治书法既能营造恢宏气势，又能使笔底的一切变得精妙细腻——既极广大、又致精微。何书扇面（图4）是一件完美得几乎让我们无可挑剔的作品——无论是用笔丰富、多变、结体的和谐大方，还是章法的端庄协调，都臻于一种极致。不仅如此，它又是极其轻松的——作者几乎是在一种漫不经心的情况下将线条从自己的笔底缓缓地送出，但就是在这不经意之间，一切仍是做得那样精密、完美。

何长治是一位极重视艺术精神的独立与自由

的艺术家。追求一种畅快的生命意味，永远是他艺术创造的主旨——这也与其世代行医的家学分不开。尽管因习唐碑致其一些作品中有些矜持或生硬的线条或结体出现，但他很快用一种痛快淋漓的笔墨形式矫正了这一切，所以今天当我们面对他那作品与内涵同样丰富的艺术世界时，最大的感受便是，他不论在何时何地作书，也不论以何种字体、书体入书，自然随意始终是其书风的最大特色。不言而喻，“自然”乃千变万化，“随意”便各有不同。

总之，何长治的书法艺术极具特色，在晚清书坛独树一帜，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新探索

A recent exploration of protecting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Shanghai

撰文 / 陈燮君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既有以物质形态为主的“有形”文化遗产,又有主要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下来,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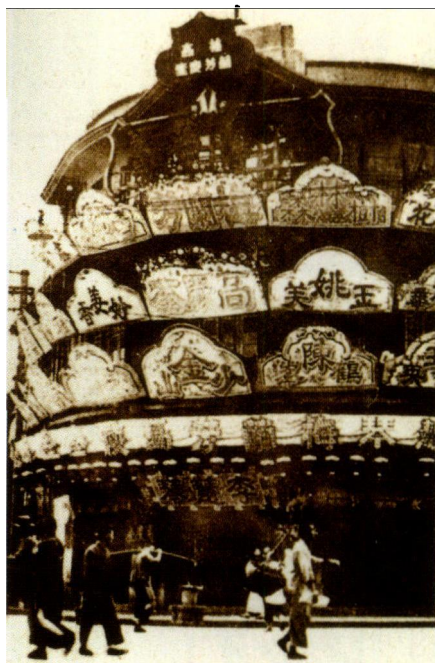
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上海拥有丰富的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了上海的地域特色,上海百姓的文化取向和审美情趣,是上海历史的一种见证,海派文化的一种重要载体,也是上海建设文化大都市的重要内涵和资源。进一步分析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经验和问题,探索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思路和新举措,对于推进上海文化建设、提高上海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上海城市文化的优势资源

文化需要历史的积淀。在这一方面,除了名人故居、传统石库门建筑等物质文化遗产外,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上海城市文化发展的优势资源。

一、上海城市文脉记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文脉,这是这座城市特质的组成部分,也是城市彼此区分的重要标志,更是城市人精神上共同的根与魂。那些以民间艺术、社会风俗、节庆礼仪、传统手工艺技能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传承的城市生活方式、城市文化方式和城



上世纪30年代天蟾舞台外景

市精神,是城市文脉的生命载体。上海在漫长的文明史发展进程中,不仅流传下来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还积淀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类遗产体现了上海人民的传统理念、审美个性和文化精神,成为见证上海城市文脉的“活化石”,以致我们在回答什么是“上海人”、“海派文化”时,不能离开体现上海特色的语言、习俗、传说、歌谣、节庆、艺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上海文化“老码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开埠之日起,上海“通商码头”的定位就为各种文化和文明在上海的交汇、交流与交融提供了便利,“通商码头”衍生为“文化码头”。一个剧种、一个戏班、一个演员,往往都想到上海靠一靠,走一走,露一露。因为“只有在上海红了,那才是真

正的红”。如今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充分保护的京、昆、越、淮等剧种，无不是发轫于其他地区而成就于上海文化“老码头”的，如俗称“水磨腔”的昆曲发源于江苏昆山，却在上海地区兴盛发展；“京剧”的称呼第一次是在《申报》上出现的，而且现代京剧代表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四大家”都与上海有着紧密联系，“麒派”创始人周信芳在上海崛起；越剧的前身是浙江嵊县一带流行的说唱形式“落地唱书”，自从进入上海后才逐步兴旺起来，上海《新闻报》演出广告中首次以“越剧”称之；起源于江苏盐城等地的江淮戏，到了上海以后才逐步过渡为剧场艺术，并形成了丰富的流派形式和演出剧目。

三、上海工业文明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上海从黄浦江畔享有“中国工业摇篮”美称的江南造船厂到以后相继诞生的中国第一家发电厂、第一家煤气厂、第一家水厂、第一家纺织厂，其规模在当时均号称远东第一。上海传统工业企业在整个近现代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留下了大批珍贵的民族工业文化遗存，不仅包括老厂房、老建筑等物质文化遗产，还包括依附于这些老厂房、老建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国供水行业建厂最早的杨树浦自来水厂由一幢幢英式建筑组成，展示着上海公用事业发展的历程和丰富的文化底蕴；有着140年历史的江南造船厂囊括了很多中国第一，浓缩了中国民族造船史、近代科技发展史、近代工业发展史以及近代国防工业发展史；苏州河两岸老厂房的背后都有生动的故事，将这些故事串起来就是动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四、上海城市风情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上海是一座既传统又现代、既精致又很有风情的城市。上海的风情摇曳在外滩璀璨的灯火中，萦绕在低声呢喃的吴语中，渗透在弄堂亲和的气息中，蕴含在独具特色的民俗民风、传统手工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以那些历经风雨留存下来的上海老字号为例，承载的是各种传统技艺、工艺和专有品牌、经营理念，凝结的是上海人的商业智慧、生

存睿智和诚信理念，展示的是上海商业文化的发达和商业文明的魅力。

上海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经验

近年来，上海按照文化部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部署，在“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和“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的工作原则指导下，通过健全保护工作机制，全面开展资源普查，建立三级名录体系，强化各项保护措施，加强宣传普及和交流传播等方式，积极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同时，上海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经验：

一、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结合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关系密切，非物质文化催生了物质文化，物质文化又涵盖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两者相互依存、互相作用。如上海的博物馆和纪念馆利用其考古、文博、历史、民俗等专业人才和科研优势，收藏和保护的技术优势，面向现代社会的社会教育优势，在保护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在“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文化遗产日和历史文化名城命名日等精心策划了一系列活动，把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结合起来，借助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达到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又如近年来普陀区致力于打造苏州河文化长廊，其基本理念也是要通过发掘苏州河沿岸的老厂房、老建筑等文化遗存，再现民族工业发展轨迹。

二、与现代教育相结合

传承与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在于人才。过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间的传承方式，主要是技艺传授，由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口传心授，基本没有文字的记录，很多东西已无法寻找。教育传承是最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形式之一。上海工艺美术学院于1960年4月正式创建，这也是全市唯一一所专门培养工艺美术设计人才的中等专业学校。结合工艺美术的产地特点，美校首届开设了玉雕、牙

雕、漆雕、木雕、织绣等专业，之后又相继开设黄杨木雕、红木雕、工艺绘画、玩具专业。在传统工艺美术中受到关注的特种工艺品种通过这些专业的设置被继承下来，有别于单纯师傅带徒弟的新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开始在教学中得到尝试，形成了“美术基础、专业设计、文化辅助”三足鼎立，艺术教育与手工艺技术训练并重的教学格局，即西画、国画、雕塑、图案等领域的美术教师主持学校的艺术教育，而来自行业的艺人主导学校的手工艺技术训练，文化共同课教师配合进行素质培养。40多年来，学校共培养了5千余名毕业生，不少人成为专业领域的领军人物。又如名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类的石氏伤科疗法，由于较早进入了中医高等院校教授，通过现代教育手段进行科研和教学，所以该门派伤科的传人遍及天下，成为国内中医学术界令人瞩目的医学流派，随着中医在国内外越来越受到重视，其项目保护前景相当看好。

三、与文化产业的推进相结合

近年来上海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自觉将保护和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贯穿始终，取得了积极成效。目前，全市创意产业集聚区的三分之二以上是通过保护性开发老厂房、老仓库和老建筑等存量资源建立起来的。又如在老字号建设方面，恒源祥原是1927年创立的一个小商店，专门销售人造丝和手编毛线。之所以能从1987年以后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大型企业集团，关键就是恒源祥利用老字号的无形资产优势撬动了庞大的社会有形资产，使恒源祥这一品牌价值达到6个亿，实现年销售额30亿。老字号的优势在于“老”，因为有着其独特的品牌文化；衰落的根由也在于“老”，因为“老”而缺乏适应新环境的活力。但是如果以新的理念对老字号的无形资产进行成功的产业运作，那么老字号就可以不断增值，可以大大促进老字号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四、与国家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相结合

近年来，上海以做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申报作为重要抓手，大力推进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通过资源普查和资料梳理，进一

步明确了具有重大价值的保护项目，并通过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使这些项目的重要历史价值被重新认识，其生存保护现状以及传承发展瓶颈等问题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有利于吸纳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参与保护工作，使这些蕴含着上海人某些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像力和文化意识，体现着上海人民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传承与弘扬。

五、与政府职能转变相结合

一是健全保护工作机制。上海市委、市府领导历来重视非遗保护工作，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出了“使上海城市历史文脉在现代化社会建设中得以保护和传承，民族精神得到弘扬和传播”的工作要求，并明确了“保护遗存、扶持传承、开发利用、扩大传播”的工作思路，每年召开有关工作会议，规划部署保护工作。上海现已初步形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体系。全市协调机构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局联席会议，联席会议由上海市文广局召集，联合市发改委、市经委、市教委、市科委、市民族宗教委、市财政局、市建委、市农委、市卫生局、市旅游委、市新闻出版局、市体育局、市文联和市文管委共15个管理部门组成，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上海市文广局社会文化处；主体业务机构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



进入上海九十年的越剧

产保护中心,各区县均设有保护分中心;另外,上海还在上海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专家智库的基础上组建了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聘有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委员会委员陈勤建等各类专家40余人,以备决策咨询和进行工作指导。在以这三个层面协作为核心构筑的基本体系上,再整合新闻媒体、行业协会等社会有关方面的力量,使上海非遗保护工作跳出了文化管理部门的“小天地”,走向了社会化保护的“大格局”。

二是全面开展资源普查。上海自2005年7月以来,在浦东新区开展普查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工作。到目前为止,上海普查工作共收集文字记录稿12142篇,相关音像资料517份,初步认定并登记了3000多位在世的传承人。上海各区县也普遍成立了由分管区县领导牵头、文化管理部门负责、每个街镇参与的普查工作班子。截止2008年4月底,大部分区县基本完成了普查工作,进入验收和论证阶段。全市将全面总结普查工作,严把普查数据的质量关,建设好普查资源数据库和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网站。

三是建立三级名录体系。在普查工作取得初步成果的基础上,上海建立了国家、市和区县三级名

录体系。到目前为止,上海有国家级名录项目33个,市级名录项目83个,区县级名录项目206个。2007年6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一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下发,第一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正式建立。名录涵盖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民间文学、杂技与竞

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和民俗10个门类,共83个项目。一大批反映上海近现代历史、文化和工商业文明的项目,如上海港码头号子、剪纸艺术、沪上闻人名宅掌故与口碑、老凤祥金银细金制作技艺、南翔小笼馒头制作工艺、龙华庙会、豫园灯会等列入名录,体现出鲜明的海派特色。连同2007年4月中旬已建成的共有206个项目的区县级名录,上海国家级、市级、区县级三级名录体系也正式建立。国务院于2006年6月和2008年6月先后公布了两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海共计33个项目位列其中。

虽然上海近年来在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还存在以下不足: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视野亟待拓宽,要进一步探索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举的保护模式;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的流派特性弱化问题值得重视。比如:师带徒是中医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之一,尤其是某些专科、一技之长、不同流派的医疗经验及手法等,很难在课堂上教学,只能由掌握者口传心授、手把手地教。所以,怎样在传统医药类项目的保护工作中保持并发扬流派的特色,并使之发扬光大,应该是保护工作的本源和目标。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内容的完整性值得重视。每一个被纳入保护体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背后往往都有社会民俗,但是现在的保护工作往往对项目本身给予高度重视,而忽略了民俗民风的原貌,导致保护工作成为政府部门自上而下的强势推动,往往缺乏社会力量的自觉参与,这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可持续发展。

上海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思路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上海进一步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可从以下八方面入手:

一、梳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思路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于维护文化的多样性,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遵循“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



上海古老的嘉定竹刻

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的精神和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根据上海的城市文化发展总体目标，上海将视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为难得的机遇，确保上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的保护、传承和发扬。

二、编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文化地图

利用上海特有的传统手工技艺，制作一张形式精美、内容丰富、信息全面的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图，把上海已有的33个国家级名录项目、83个市级名录项目和206个区县级名录项目，按照项目所在的区县分布排列，充分展示上海的文化底蕴，在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举办期间，把它作为上海文化的一张重要名片，提供给中外游客，使他们全面了解上海城市文化的独特魅力。

三、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生命主体

人才是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生命主体，加强人才培养，是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效的关键所在。因此，要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名家大师及其技艺的抢救、保护力度，利用现有教育体系，进一步加强对年轻一代传统手工艺技能传承人的培养，通过制定系列扶持政策吸收人才从事传统手工艺。

为了使保护工作持续推进，要加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队伍建设，特别是要加强业务人才的培养，建议在“上海市重点领域人才开发目录”中增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人员一项。要在社区基层建立一支职业化保护工作人才队伍，建议利用社区文化指导员人才认证体系，开发“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职业资格认证项目。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协会，联合专业工作人员、社会热心人士和有关方面专家，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工作走向全社会。

四、提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的政策支持

通过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局际联席会议的渠道，争取财政的积极支持，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性的保护、研究和开发工作提供资金支撑。建议筹组专项基金会，奖励以民族、民俗、民间文化素材进行创作、开发的文化产品，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市场化提供持续、稳定的社会化筹资渠道。建议另在上海市文化发展基金会中单列一项对利用文化遗产进行文化产品设计制作的资助。在文化先进社区和文化先进地区评选时，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列入重要指标之一，促进基层对保护工作的各种投入。

五、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协调合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需要各级政府主管部门相互协调，合理布局，形成整体性结构。各相关部门要分工协作，各司其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市场开发提供完善的服务。建议强化现有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局际联席会议功能，分管领导例会半年一次，联络员会议每季度召开一次。一些跨部门的项目保护工作，可以专门成立项目工作小组进行推进。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对保护工作的指导作用，专家委员会除了对项目进行评审外，对项目保护工作也要起到出谋划策的作用，建议在专家委员会中选择合适人选进入项目保护工作小组，直接发挥决策咨询作用。

在政策法规的制订方面，急需出台的是《上海



复兴的上海“顾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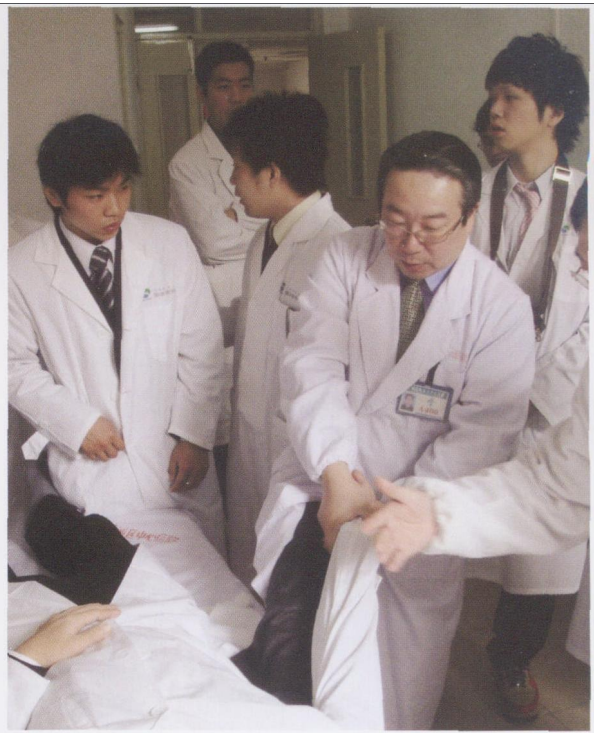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其次是《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传承保护基地管理办法》、《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重要传承人认定和管理办法》等。

六、营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都市风景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通常是以传统或历史遗存的形式而分布在我们的生活中，如文物古迹、传奇故事、民俗节庆、工艺美术、音乐舞蹈、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戏曲曲艺和手工技艺等，尽管具有很高的产品开发价值，但在没有开发之前，它们仍然只是历史的遗存。对这类资源，需要判断它们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使之能够与当代人的精神发生互动，再通过相关或系列资源的相互补充与烘托，使其部分成为具有市场吸引力的商品，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上海城市风情的重要组成部分。

七、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长三角平台

可以与各地文化主管部门联系，构建长三角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意机制，对于列入名录的长三角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在不损害原生形态的基础上合理利用，进行嫁接、变形、重构，汲取其中的文化元素，进行重组形成新的作品，使之直接融入现代社会生活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不要以行政区划为局限而自设藩篱，要本着“工作



传统的石氏伤科康复治疗

共担，成果共享”的原则，通力合作，各自承担责任与义务，合理分配权利与利益，谋求共同繁荣、共同发展。

八、赢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世博契机

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将对“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进行充分演绎，城市文化遗产，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是展现的一个重要方面。上海世博会期间，预计在园区内举办的各类文化演艺娱乐活动达到2万场，其中，中国56个民族的特色文化、300多个地方传统剧种、500多种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现，将成为2万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抓住世博会带来的难得机遇，精心策划、精心组织好展演展示活动，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元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一个民族或群体的生命基因，是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标识。上海将以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主线，掀起新一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逐渐探索出符合上海城市特点的非物文化保护途径和方法，推动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序、持续、科学地发展。



老字号“龙凤旗袍”

新时期发挥博物馆宣传教育 工作职能以及实现方法

——浅析嘉定博物馆宣教工作

How to develop and practice the education function of a museum in the new era: Jiading Museum

撰文 / 邵辉、马剑颖

博物馆是文物和标本的主要收藏保管、科学研究和宣传教育机构。宣传教育工作是博物馆的三大职能之一，是博物馆事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根据社会需求运用博物馆的文物藏品、陈列展览和其它社会资源，向公众传播科学、文化、艺术知识，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为社会大众提供文化产品方面的服务。归根结底，博物馆的工作职能都是为社会发展服务的。

一 宣传教育工作的意义和作用

如何让观众了解博物馆，使陈列展览让观众理解、让研究成果让社会知晓……这些都需要宣传教育工作的支持，这就好比一个扩音器，宣传教育工作要把博物馆的研究成果、陈列内容等各种信息扩大影响，让更多的人了解，从而走进博物馆。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博物馆不再闭门造车，而是要让更多的观众走进博物馆，特别是那些潜在的观众。而博物馆的宣传教育工作主要是通过观众来实现的。博物馆不能再被动地面对观众，坐等观众上门，必须树立竞争意识，服务意识，尽一切机会宣传自己。

此外，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工作压力都越来越大，人们在工作之余，总是希望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休闲娱乐方式，因此博物馆可以通过宣传教育工作，引起社会对博物馆的强烈关注，使之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又一场所。

通常说“没有博物馆的城市是没有文化底蕴的”。通过宣传教育部门的工作，我们要努力培养市民参观博物馆的兴趣，使之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博物馆作为教育阵地，通过实物的展示，给观众形象的教育，有着其他文化场所不可比拟的优势。而博物馆宣传教育部门的工作职责就是如何利用不同形式和途径的平台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甚至热爱博物馆。

二 宣传教育工作的实现方法

传统意义上的宣传教育工作不外乎陈列展览、讲解接待等，但是新时期博物馆的宣传教育工作面临诸多难题，观众接受信息的平台和方式越来越丰富，不再是单一化形式。博物馆应该适时抓住新的媒介传播方式，结合本馆实际情况将其转化为宣传教育工作的新手段、新阵地。嘉定博物馆积极探索新方

式,努力提高宣传教育工作的软实力,提升博物馆整体开放形象。

1. 举办临时展览扩大社会辐射面

举办展览是博物馆宣传教育工作的常规项目,如何通过内容丰富和具有特色的展览扩大社会影响和辐射面,是博物馆宣传教育部门需要长期思考的问题。近年来,嘉定博物馆立足本馆的基本特色陈列,制作成临时展览赴馆外巡展宣传,取得成功。“科举陈列”是嘉定博物馆的基本陈列,2007年获得“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精品奖”。早在1996年,嘉定博物馆在基本陈列的基础上制作了“中国科举文化展”巡展版面,赴全国各地博物馆进行巡回展览,至今该展览已赴全国十个省二十多个城市、地区巡展,展览还曾赴澳门特别行政区、加拿大温哥华、台湾地区的高雄和宜兰等城市巡展。当时被报刊评价道:“这是一个县级博物馆的常设展以流动展览的形式走出国门的成功例子。”

嘉定博物馆还借助各种社会力量和资源,通过与博物馆兄弟单位和区内各协作单位以引进、合作等方式举办各类特色临时展览,并通过媒体及时有效地进行宣传,受到了社会关注并产生一定社会影响力。近年来,曾引进金山博物馆“上海农民的艺术——金山农民画展”;与青浦博物馆合作举办了“智慧的结晶共同的财富——纪念5·18国际博物馆日暨文物知识普及展”;与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共同举办了“中国科举书画展”;与嘉定区收藏协会合作举办了“李家明藏瓷展”,“嚆城民间藏珍——嘉定区收藏协会会员藏品展”;与嘉定区徐行镇人民政府合作举办了“徐行草编展”,向人们介绍宣传嘉定区的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徐行草编,展览期间还组织当地的能工巧匠现场演示草编技艺,与嘉定区教育局合作举办了“竹韵新声——2008嘉定区中小学师生竹刻作品展”,大力弘扬有着四百余年悠久历史的嘉定竹刻以及加强对优秀中华传统艺术的传承的发扬,展出期间共接待嘉定区内17所中小学千余名学生前来参观学习;配合嘉定镇街道举办了“流风遗韵——嘉定历代先贤墨迹展”。

博物馆还适时地将临时展览送到区内的社区、学

校、部队进行巡展,通过不同内容和形式的临时展览,展示了嘉定优秀传统文化品牌,进一步提高嘉定博物馆社会知名度。

2. 利用网络搭建宣传新平台

博物馆观众有以科学研究和参观学习为主的两大类,其中学习型观众重点在于广大的青少年朋友。为了抓住这一群体,使他们能在互联网上及时了解博物馆活动信息,获取文物知识,嘉定博物馆于2008年初开设“嘉定博物馆网站”,及时发布博物馆的相关信息,使更多的网友们足不出户地实时了解博物馆动态。网络只是博物馆宣传的手段之一,最终目的还是要让这一部分人群能够走进博物馆,零距离地接触博物馆,体验博物馆。

3. 走出博物馆进行宣传教育活动

嘉定博物馆勇于开拓创新,努力寻找博物馆宣传教育的结合点,配合各种宣传活动制作宣传册页,使用这种相对成本较低而效果却最直接的传统宣传手段,走出博物馆,走进社区、学校、街头宣传博物馆知识。利用每年的5·18国际博物馆日和中国文化遗产日,发放资料介绍国际博物馆日知识内容;2008年,嘉定博物馆配合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制作了“支持文物普查 构建和谐嘉定”的签名横幅,来到嘉定区人流比较集中的路段进行宣传活动,发放嘉定区文物保护单位知识的宣传单页,向市民宣传文物法;博物馆还主动联系全区的中小学校和广大社区,结合学校的乡土教育课程,利用寒暑假期间,为学生和居民们开设“嘉定地方史”讲座,以及配合社区开展便民活动,设立“文物鉴赏”咨询服务台等,这些活动有效地开拓了博物馆宣传阵地并发挥了宣传教育功能,也从另一侧面扩大了博物馆的影响力。

4. 拓展宣传方式扩大博物馆内涵和外延

嘉定博物馆积极拓展宣传方式,尽一切力量不断扩大博物馆的内涵和外延。嘉定博物馆将热爱博物馆事业、关心博物馆发展、支持博物馆建设的各类社会人员纳入“博物馆之友”队伍。这支队伍经过新老更替,人员的组成结构和道德素质也随着嘉定博物馆的发展而日趋成熟壮大。志愿者就是其中主要的力量。“小小少年讲解员”是嘉定博物馆和区内普

通小学在共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支志愿者队伍,通过7年来的不断积累和发展,这一学生志愿者活动成为嘉定区的未成年人教育特色项目之一,得到公众的称赞。

扩大自编报刊杂志也是博物馆宣传教育工作的新阵地之一。嘉定博物馆于1985年创刊的《城文博》是博物馆宣传文物保护政策的阵地,是学习、汇报和交流文博工作的窗口,是开展教育宣传和进行文史研究的良好平台,更是联系全馆职工、博物馆之友和社会各界的纽带。《城文博》为双月出版,在保持学术性、资料性的基础上,更侧重于可读性、知识性、趣味性与艺术性的协调统一,在栏目设置、内容选择、版面设计、宣传策划等各个环节探索创新,以适应不同层次读者。嘉定博物馆还利用中国文物学会科举研究中心的平台,每年出版二期以上《科举学论丛》,通过学术刊物与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们进行互动和交流,达到切磋研究的目的。

三 对博物馆宣传教育工作未来发展的设想

1. 加强公众服务意识,提高工作效率

博物馆作为服务社会大众的窗口单位,博物馆的宣传教育工作部门的责任重大。作为从事宣传教育的工作人员,必须进一步地加强公众服务意识,在日常工作中多从观众的角度出发,尽可能地提供满意、高效的服务,通过细节周到的服务措施,潜移默化地使博物馆在观众心目中形成良好的公众形象。可以通过观众问卷调查、便民措施、咨询服务等方式了解和征询社会不同层次的观众对博物馆工作的需求和建议,从而有针对性地去改善和提高博物馆工作效率。比如针对青少年观众,让他们走进博物馆,感受博物馆,特别是一些参与性强的设施应成为服务的重点。博物馆的宣教人员,只有及时了解观众的所想,才能及时调整观众对博物馆要求的落差,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和创造社会效益。

2. 拓展宣传教育方式,扩大社会影响

博物馆宣教人员在增强服务意识的基础上,还要积极探索、大胆开拓宣传教育方式,使更多的观众接受博物馆,走近博物馆。博物馆志愿者和“博物馆之

友”队伍是博物馆宣传教育工作的社会中坚力量之一。嘉定博物馆的少年讲解队伍经过成熟运作已成为宣教工作的亮点之一。小学生们通过教师推荐、自愿报名结合的形式,经博物馆培训考核后,每逢双休日和假期,轮流到博物馆上岗,主动为观众游客提供志愿讲解服务,这一特色服务获得了嘉定区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颁发的“2007年嘉定区未成年人暑期工作特色项目”。

博物馆还要努力吸纳更多的社会人员参与博物馆的宣传教育活动,通过社会力量发展壮大“博物馆之友”队伍,并使之成为博物馆发展服务;通过与社区、学校、企业、部队等不同性质和阶层的沟通和联系,不断开拓博物馆宣传教育方式和途径,充分发挥博物馆作为社会教育基地的职能。

3. 培养宣传人才队伍,增强综合实力

为了进一步做好博物馆宣传教育工作,应抓紧队伍建设,培育专职的宣传人员,提高宣传人员素质。一是专业宣传策划人员的培育。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对展览、活动进行有效地策划和宣传,研究博物馆观众,开展社会市场调查,做好博物馆展览和活动的策划宣传工作。二是讲解员队伍的建设。讲解员是博物馆与观众联系的桥梁,是博物馆的宣传员。除了要求基本的服务态度、语言规范等要求外,新时期的博物馆宣传工作,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不同层次的观众走入博物馆,更多的出现了知识型、研究型的观众,因此更要求讲解员具有扎实广博的文史知识,讲解方式不再是灌输式的说教,而是采用启发式的引导和交流的方式开展讲解教育活动。所以作为讲解宣教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和专业知识,具有善于运用语言艺术和随机应变的能力,只有掌握和学习了上述的相关知识和能力,才能在与社会不同的观众接触中做到深入浅出、因人施讲。

博物馆通过各种不同途径和方式开展宣传教育工作,不仅增强了社会公众对博物馆的了解和支持,也扩大了博物馆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宣传工作既是博物馆吸引观众的措施,又是博物馆发展的重要手段,因此博物馆的宣传教育工作及其作用的发挥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浅析中小型纪念馆 教育宣传功能拓展和延伸

On enlarging and retaining the education function of the middle and small-sized memorial museums

撰文 / 何瑛

上海目前有大大小小各种类型的博物馆106座,预计到2010年将建到150座。可以说上海的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前不久中国评定出国家一级博物馆82座,上海有3座,分别是上海博物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鲁迅纪念馆。国家一级博物馆的评定是从博物馆的综合管理与基础设施、藏品管理与科学研究、陈列展览与社会服务三大方面的综合来评定的,可以说这三家博物馆在上海地区是大型博物馆。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在2010年左右上海可能还会有一两座大型博物馆,但更多的是中小型博物馆。面对越来越多的中小型博物馆、纪念馆的出现,如何树立良好的形象,在林立的博物馆之中,不断发出声音,抓住每一个机会展示自我,吸引更多的观众,获得更多的支持,达到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这正是新时期博物馆、纪念馆教育宣传工作所要探究的内容。笔者作为虹口区文物遗址史料馆的工作人员,就工作中的体会谈谈自己的想法。

博物馆多是好事,体现了一个城市文化的软实力在不断加强。但在愈来愈多博物馆建立的同时,就会有愈多的博物馆陷入门庭冷落的尴尬困境。尤其是人物类、革命类纪念馆或陈列室,往往是开馆时热闹,之后就门可罗雀。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因为纪念馆规模不够大的原因吗?是纪念馆提供的展品不够精美丰富吗?还是纪念馆的展陈手段不够新颖或是服务不够周到?情况并不尽然。事实上,许多纪念馆在这些

方面都已经作了尝试和改进。

以我馆为例。虹口区文物遗址史料馆下属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纪念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陈列馆、中国共产党在虹口史料陈列馆、李白烈士故居、沈尹默故居等5个展览场馆。近几年,这几个场馆都进行了房屋修缮,陈列形式和展厅环境焕然一新;修改陈列大纲,重新布展,利用声、光、电等现代布展手段,形象地、艺术地向观众展示陈列的内容等等,引发观众参观时的兴趣、热情,并从中受到教育。然而,这5个展览场馆每年接待的观众量平均在1.7万人次左右,与大型博物馆、纪念馆相比,相差甚远。

同样是革命类纪念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情况就截然相反。每年要接待10多万人次的观众参观。中共一大是在上海特有的一幢石库门建筑内召开的,会址的地方不大,上下两层,但由于这个地方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地,国内观众但凡来上海,必定会到中共一大会址参观。同时,中共一大会址旁还利用老的石库门建筑改建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拓展了原址的空间,除了展示中共一大的历史,还能举办与中共相关的临时展览,可以说是常办常新,吸引了更多的观众前往参观。

我们再来看“左联”会址纪念馆,是一幢英国古典式花园住宅,建筑面积有674平方米,但是作为一个纪念馆,不仅要原样复原开会的场景,还要做固定

的陈列展览,再加上办公场所,场地就偏小了。此外,就没有多余的场地来举办其他相关的展示活动了。“左联”会址是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该建筑是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有着双重身份,所以纪念馆是不能做任何的改建、扩建甚至拆建的,这样就局限了“左联”会址纪念馆空间的发展。那么类似“左联”会址纪念馆一样的中小型场馆该怎么办?资金不雄厚,周边又没有拓展余地,除了坐等观众上门之外,还有什么方法来达到纪念馆的教育宣传功能呢?

“不在改变中发展,便在等待中消失。”如何改变?怎么改变?首先是要观念改变。世上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只有想不到的事情。关键就是看你如何去想。拓展思路,不要安于现状。其次要有创新的手段。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要打破旧的结构,不断创造新的结构,做到“你无我有,你有我优”,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没有创新,就没有变化,也就没有发展。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每年有十多万观众前去参观,然而他们并没有以此为满足,仍不断开拓对外的教育宣传功能,比如,他们把中共“一大”到“十七大”的光辉历程做成流动展板,到全国各地去巡展,扩大宣传,扩大纪念馆的影响,提升社会效益。

那么,在中小型纪念馆教育宣传功能中如何做到创新?就是结合本馆特色,走出纪念馆围墙的束缚,全方位立体地拓展和延伸纪念馆的教育宣传功能。

1. 创建数字化纪念馆,拓展纪念馆教育宣传的空间

中小型纪念馆由于场地狭小,不能一下子容纳很多观众;由于资金有限,不能像大型博物馆、纪念馆那样到处出去巡展,来提升馆的知名度,扩大馆的影响。一般来中小型纪念馆参观的观众可以说是对纪念馆有所了解,起码知道纪念馆的名字才来参观的。要让那些不知道的,或者不方便来纪念馆参观的人了解纪念馆,互联网是最行之有效的办法了。

目前,有很多馆都已建立网站或网页。我们下属的5个展览场馆也是如此。比如,“左联”会址纪念馆,介绍了纪念馆的概况,展厅的陈设、馆藏的物品、盟员的介绍、活动的组织等常规内容。“左联”会址纪念馆还有一特色,就是盟员多,现已知“左联”盟员有近400位,我们把这些盟员的头像、经历、著作、纪

念集以及他们曾在虹口的居住地等信息都公布在网上,信息量非常大。可以说在制作这个网站时,除了是向外界宣传介绍“左联”会址纪念馆,提升纪念馆的影响,同时也提高我们纪念馆自身的业务水平,一举多得。无论刮风下雨还是白天黑夜,观众都可以了解到“左联”会址纪念馆的信息,“左联”会址纪念馆成为一座“永不关门的博物馆”。

2. 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扩大纪念馆教育宣传的影响

中小型纪念馆的教育宣传,还可通过生动的内容和丰富的活动加以体现。适时举办各类富有特色的纪念活动,吸引观众,扩大中小型纪念馆的影响。所谓适时,就是借助历史名人的生辰忌日或者历史事件发生的纪念日,以及每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文化遗产日、国定传统节日等契机,结合各中小型纪念馆的实际情况组织活动。

(1) 借助外力,举办学术研讨活动。中小型纪念馆受场地的制约、人力、财力、物力的限制,凭一馆之力无法举办大型活动。就拿“左联”会址纪念馆来说,场地狭小,每次参观人数不得超过30人,更何况要举办上百人的大型活动。在“左联”成立六十周年、七十周年之际,“左联”纪念馆就借助外力,走出纪念馆来举办学术研讨会并出版论文集;还与“左联”盟员的家属一起,为盟员的百岁生日组织纪念座谈会。2007年8月17日与同济大学、上海鲁迅纪念馆等单位一起筹备、组织、实施了“丁玲第十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有关领导和国内外专家、学者200多人出席了研讨会,并参观了“丁玲生平文物史料展”和“左联”会址纪念馆。凭借“左联”会址纪念馆一馆之力是无法完成国际性的学术研讨活动,只有借助外援,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利用本馆资源,举办特色活动。中小型纪念馆的内容是不尽相同的,要充分利用本馆现有的历史文化资源,通过各种征文、竞赛、诗歌朗诵等活动形式,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参加,以提升纪念馆的教育宣传力度。2000年10月“左联”会址纪念馆举办了《为了忘却的纪念》诗歌朗诵会;2003、2004连续两年举办当代书法家作品邀请展;在图书馆举办“左联”盟员专题讲座等等,这些系列活动更好地继承和弘扬

“左联”精神,使“左联”纪念馆在传播先进文化方面发挥其更大的作用。

(3) 配合国定节假日,举办公益活动。中小型纪念馆的教育宣传工作中公益活动也是一项重要的活动。“左联”会址纪念馆配合每年的“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文化遗产日免费开放展览场馆、免费发放宣传资料等公益性活动,并将纪念馆制作的流动展览送到社区、学校、部队……以吸引观众,扩大纪念馆教育宣传的范围。每逢清明期间,李白烈士故居的名誉馆长、李白烈士之子李恒胜就会转赴各个学校、企事业单位举办专题讲座,宣传李白烈士事迹,扩大李白烈士故居的影响。

3. 建立学生志愿者队伍,拓展纪念馆教育宣传的功能

目前,各中小型纪念馆都有志愿者。这些志愿者大多是担任讲解员的工作,我们也有志愿者队伍。我们与大中院校合作,成立学生志愿者队伍,利用纪念馆丰厚的历史人文知识,把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常抓不懈。

“左联”会址纪念馆、李白烈士故居、中共“四大”史料陈列馆先后与师大一附中、二附中、上大等学校联手,建立“学生志愿者服务”队伍,请学生到纪念馆来学习,希望学生们在学习讲解过程中,对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历程能有深刻的了解。也希望通过“学生志愿者服务”的工作,纪念馆能增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辐射力、影响力,使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得到进一步弘扬。李白烈士故居还与虹口实验中学建立共建关系,专门成立了一个“李白中队”。学生一届一届的毕业离开,但“李白中队”始终存在。“李白中队”的学生们在李白烈士故居内举行成人仪式,召开座谈会,请李白烈士之子讲述李白的事迹……李白烈士故居成为学生们社会活动的第二课堂。2007年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还被学校评为优秀校外辅导员。

上述只是我们一些比较成功的例子和做法。下一步,我们将更进一步地利用纪念馆的资源,挖掘出更多的潜力来拓展和延伸纪念馆的教育宣传功能。例如

1. 利用媒体的优势,进一步拓展纪念馆教育宣传的范围

“左联”盟员有近400位,其中鲁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冯雪峰、郁达夫、蒋光慈、潘汉年、丁玲、胡风、夏衍、田汉、周扬、阳翰笙、冯乃超、沙汀、艾芜、“左联”五烈士——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李伟森等一批作家为世人所了解,但在已知的盟员中还不到十分之一。因此,可以与电视媒体合作,制作“左联”盟员的专题纪录片,介绍他们的事迹、作品等,扩大宣传。

2. 牵手学校,进一步提升纪念馆教育宣传的力度

当前社会出现了一系列的公共问题和矛盾,“正义、公平、民主、自由、现代理性、公民意识”等理念的缺失,以自我为中心的追求感性享乐、追求轻松娱乐的新的生存价值理念,深深地影响和塑造着“80后”、“90后”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当年,加入“左联”的盟员大部分是二十岁左右的热血青年。还有李白烈士、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等等,他们无论男女,个个是仪表堂堂,才华横溢。在那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他们这么做,随时就有可能牺牲生命,就如“左联”五烈士、李白烈士,他们为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华民族抛头颅洒热血,义无反顾地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

结合现实,参照先烈,可以在学生中开展“他们这么做值得吗?”类似的话题进行辩论,从正面引导年轻一代,重塑积极健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3. 服务于社区,进一步增强纪念馆教育宣传的功能

当今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日益增长,纪念馆要如何结合实际,增强教育宣传功能?纪念馆要与所在街道、居委会建立起长期紧密地联系,成为开展社区活动的文化阵地。可以与街道、居委会联手举办各种文化活动,使纪念馆成为附近居民开展活动的重要场所,发挥纪念馆的作用。让本街道甚至本区的居民因为自己的居住地曾拥有历史名人,而倍感自豪,自觉地去宣传,提高纪念馆的知名度,也从更大的范围来宣传名人故居。

教育宣传是纪念馆的灵魂,纪念馆社会功能的最终落脚点就是它的教育宣传功能的实现。因此,各中小型纪念馆要立足本馆,创新思路,从实际出发,拓展和延伸纪念馆的教育宣传功能,扩大纪念馆的知名度,在众多的纪念馆中占有一席之地。■

读《“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前身”说献疑》

On the article “Doubts about the view that Chinese archaeology evolved from epigraphy”

撰文 / 张童心

没有人会介绍李朝远先生是考古学家,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博物馆寄给我的讣告上是这样介绍李朝远先生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文化部优秀专家、上海市领军人才、国内著名的青铜器研究和鉴定专家、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文博研究馆员李朝远同志。”准确而全面,可谓盖棺定论。在很长时间里我也是和“国内著名的青铜器研究和鉴定专家”李朝远先生在交往。我们一些熟识朝远的朋友私下还会说他精神、干练、说他有一笔非常漂亮的字,等等等等,就是没人说他是考古学家。然后,当我读了他写的《“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前身”说献疑》(以下简称《献疑》)一文以后,我认为李朝远先生虽然没有像一个典型的考古工作者那样长时间参加田野考古发掘,但他对中国考古学的把握是精准的,有不少原来只是在部分考古工作者头脑里有朦胧想法的东西,李朝远在其《献疑》一文中有了清晰的梳理。

或许因为我是考古学教授的缘故,当拿到李朝远先生签名后亲自赠送给我的《青铜器学步集》后,我读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其中的《献疑》。之后我曾经就此文与他有过很短的交流,我认为他在文中梳理的中国考古学的情况极为精到,但他却不以为然,只是跟我说“中国的金石学传统不可断,而大学能在这方面起关键的作用,你们在安排历史系课程时可以考虑适当加上一些相关的课”。现在想来他的不以为然也是

正常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他写《献疑》一文的主要着眼点是在中国金石学的上面,读完全文,这一点是能明显感到的;另一个原因约是他的一贯的谦虚,就象他的论文集自名为“学步集”一样。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之。

正如《献疑》所说:“金石学与现代中国考古学之关系的争论,一直伴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早期的梁启超、稍后的卫聚贤等认为两者一脉相承,当卫聚贤在写他的《中国考古学史》的时候还是上个世纪30年代,更多的是在叙述中国金石学的发展史。然而,李济、夏鼐、苏秉琦等为代表的主流认识是两者有关系但性质决然不同,解放后更是以后一种说法为主,经典表述是夏鼐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的“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但《献疑》一文的结论是两者没有历史的传承关系,而应是平行发展的关系,在分析了金石学、考古学,尤其是作为两者分水岭的田野考古发掘之后,这一结论应该是站得住脚的,这从文中论述的董作宾、马衡、李济、梁思永、陈梦家诸学者的研究历程上可以明显看得出来,这也可从殷墟的发掘经历上明显地反映出来。

正因为两者是平行发展的关系,作为历史悠久的金石学,其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则是必然的。《献疑》云:“最初的考古学薪火的传播者们,他们最初的工作都深深浸润在中国传统金石学的影响之中”。在考古学

与金石学的关系上,殷墟的发掘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刚开始时的发掘情况,是很说明问题的。

其实在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掘殷墟之前,1919年北京大学国学门、1926年厦门大学国学院等就都有发掘殷墟的计划,看中殷墟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殷墟出土有甲骨文。而史语所于1928年第一次由董作宾主持的殷墟发掘,也应该说离科学的考古学是有相当的距离的。事后,李济在其《安阳》一书中是这样写的:“实际上这两个学者,无论是倡导在安阳进行田野工作的傅所长(指傅斯年),还是因系河南人而有天才又易于接受新思想而被派到安阳的董作宾,对于现代考古学都没有任何实践经验”。我们可在《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中董作宾写的《民国十七年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内看到这第一次殷墟发掘的计划:“一、分区。分区之法,择沙丘上出土甲骨之中心地点,划出一大段,约五、六亩。复分之为若干区,每区约四方丈,四角竖立标识,然后就区内着手发掘。二、平起。由四方丈之内,平排起土,每一尺为一层,视其土色及所出之物而详记之,至三丈为止。三、递填。递填之法,取第一区之土,置之本段之外,而以第二区之土,填第一区,第三区之土,填第二区,至最末之一区,乃以第一区之土填之”。但实际发掘则极为复杂,董作宾的发掘方法也由“轮廓求法”而“集中求法”而“打探求法”而“村人经验”,甚至还采用了村里人用的“天花粉”的土办法,就是缺少现代考古学的方法。这次发掘的结果因少甲骨文而使董作宾非常失望,从1928年10月13日开始,到30日为止,18天时间,在经费仅用去约三分之一的情况下发掘工作就结束了。从《民国十七年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董作宾通过发掘而得出的相关结论:“殷墟遗物……确可断定其为漂流淤积所致”,即后来之“殷墟漂流说”也。

而李济主持的殷墟第二次发掘则与第一次差别极大,李济在《安阳》一书中记其工作步骤曰:“1. 聘用一个称职的测量员对遗址进行测绘,以便准确绘出以小屯为中心的详细地形图。2. 继续在遗址内许多地点以挖探沟的方式进行试掘,主要目的是清楚了解地表下地层情况,以便找到包含未触动过的

甲骨的堆积特征。3. 系统地记录和登记发掘出的每件遗物的确切出土地点、时间、周围堆积情况和层次等。4. 每个参加发掘的工作人员坚持写关于个人观察到的及田野工作中发生的情况的日记”。发掘于1929年3月7日开始,5月11日结束。发掘按李济的计划进行,我们不难看出其与第一次董作宾的发掘相比是有了不少的改变。

除了发掘方法上的不一样,其发掘后的结论亦不一样。通过殷墟这第二次发掘,在地层学上,李济认为殷墟地层自下而上可分三期:1. 殷商文化层。2. 隋唐文化层,也许略早些。3. 现代堆积。这个结论从现在看来是非常简单粗糙的,但这是地层学在中国早期考古学的最初实践,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考古发掘与挖宝行为划清了界线。

在类型学上,李济根据二次发掘的材料写出了《殷商陶器初论》,这篇发表在《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上的文章在考古学史上应该是占有重要地位的,它跳出了金石学的窠臼,用现代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对最普遍而有代表性的陶器进行了研究,进而由此思考其与史前文化的关系,这是用类型学方法进行年代学的探索,这也是金石学所缺乏的,而现在的考古学仍是沿着这个方向在向前推进。但文中对陶器的命名还采用了不少金石学的,当然结合了功能等相关因素,这点上可以看出金石学对考古学的影响。

从以上情况来看,《献疑》文中所云:“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中国考古学的真正开端是1929年3月开始的第二次殷墟发掘。”应该是有道理的。

以上文字较为散碎,主要想法原是以批注的形式写在《献疑》一文的旁边的,而批注又非一次所写,散碎是不可避免的,在此只是想以这种方法来纪念李朝远先生。

《青铜器学步集》书末之跋中有云:“(青铜器学步集)结集出版,是为了再次享受学术的欢愉和回忆的快乐”,之前与朝远进行学术交流时确很欢愉,但现在的回忆却不很快乐。

李朝远先生走了,对其生前关注的学术进行深入探讨,这是我们最好的纪念他的方法,愿李朝远先生一路走好。■

重读《青铜器学步集》

A representative in the contemporary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bronzes

撰文 / 张懋镕

2007年11月，收到李朝远先生寄赠的《青铜器学步集》，阅读这部400多页的论文集，很惊讶他在承担一个中国大博物馆的行政工作时，还能写出这么多有深刻见解的文章。当时很有感触，想写一点东西，但一时不知该从哪里切入为好，所以没有形成文字。虽然那时已经知道他病得不轻，也没想到只过了一年多，他就走了。回想起十多年前，在北京召开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会议上，和他初次相识，同住一间房，同游王府井，在天安门前合影，他优雅的动作、真诚的笑容，还常常在我的眼前闪现。当我又一遍阅读《青铜器学步集》，终于有了新的感悟：他是新时期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

所谓新时期是指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时期，不仅研究人员数倍于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是空前的。朝远为这一时期的青铜器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真伪鉴别水平的提高是新时期青铜器研究的一大成就。新时期的青铜器多以科学发掘品的形式出现，但也有不少非发掘品。真伪鉴别是青铜器研究的前提，对上海博物馆来说尤其如此。上海博物馆以所藏大量珍贵的青铜器而名扬海内外，这些青铜器基本上是传世品和非发掘品，无论是旧藏还是新收，鉴别工作都显得十分重要。在马承源先生的精心指导下，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成为中国古代

青铜器研究的重镇。作为青铜器研究部的负责人，朝远在吸收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注意对馆藏青铜器作全方位的考察。《师兑簋复议》是其一篇代表作。上海博物馆藏有两件元年师兑簋，其中一件（编号60584）有问题。容庚曾对器盖有所怀疑，但限于条件，未能列出证据，后来陈佩芬先生又指出器身也伪。朝远为此作了仔细观察，指出：这件器盖的行款与器铭完全相同，而真器（编号38182）的盖铭与器铭的行款是不同的；器盖、器身的铭文字形拘泥，个别字走样；目验器盖、器身表面覆盖假锈，仪器测定也支持这一点；X光片显示器盖较厚，且厚薄不均匀；观察范线，器耳没有范线，器盖是用四分范，而真器（编号38182）的盖用二分范；器耳距离圈足壁较远；器外底也有加强筋，但不像真器（编号38182）那样平直；三个兽首足缺乏厚实感；器身与器底是拼接的；盖比真器的盖重250克。朝远从铜锈、重量、范线、修补的痕迹、器壁的厚薄、铭文字形书体等方面做了全面考察，举出大量证据，证明器身与盖均伪。由于证据充分，并使用现代科技手段，因而极有说服力。类似的例子，在这本论文集中还有不少。可见在鉴定方面朝远眼光敏锐，知识全面，体现出新时期青铜器真伪鉴别的水平和特点。

真伪鉴别之后，分期断代即是青铜器研究的要务。新时期的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较之先前更为细

致深入。例如关于殷墟一期的青铜器，朝远在作仔细比较之后，指出武官 M1 的青铜器时代最晚，可以归入殷墟二期，以前将小屯 M331、M188 与武官 M1 列为同一时段的认识有待修正。（《试论殷墟一期的青铜器》）在《前掌大墓地中的“史”及其他——读〈滕州前掌大墓地〉》一文中，认为对这些带“史”字铭文的青铜器，不能一概而论，要作具体分析，部分属于商代晚期，部分属于西周早期。鉴于商末周初青铜器之难分，这一见解不仅正确，而且具有启迪作用。《“𩇑簋为厉王之器”说献疑》一文则向学界成说提出挑战，从铭文的记时方式、字形书体、形制纹饰等方面论证𩇑簋作于西周中期，与厉王无关。这样的判断是否得当，还可以继续讨论，但朝远的意见也有一定的根据，他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反映了西周青铜器断代的复杂性，很值得重视，需要进一步探讨。

如果说新时期以前的青铜器研究着重于分期断代、构建框架的话，那么新时期青铜器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研究层面更为细致，表现在分时段、分区系、分类别的研究工作全面开展。朝远的研究体现了这个特点。就时代而言，他从二里头青铜器（《关于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罍》）、殷墟的青铜器（《试论殷墟一期的青铜器》）研究到战国青铜器（《合阳鼎拾遗》）；就器类而言，他研究青铜容器如青铜觚（《“青铜透空觚”考略》）、青铜甗（《新见秦式青铜甗的研究》），乐器如青铜钟（《从新出青铜钟再议“堵”与“肆”》），兵器如青铜戈（《新见者儿戈考》），还有青铜镜（《新获战国透空复合镜研究》）；就区系、国别而言，他研究北方的陕西城固、洋县青铜器（《城固洋县青铜器所含周文化因素之我见》），也研究南方吴地的青铜器（《吴地青铜器未受商文化影响论》），既研究秦国青铜器（《上海博物馆新获秦公器研究》），也研究晋国青铜器（《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综览》）；就类别而言，他不但研究形制，还研究纹饰（《兽面纹与查克雨神像》、《青铜器火纹象征意义的原型及其转换》）；就铭文而言，从商代金文、西周金文到春秋战国的金文均有研究（如《师道簋铭文考释》、《新出秦公器铭文与籀文》、《战

国郢王戈辨析二题》等）；有时还注意到某一类器群的研究，如对周王青铜器的研究（《西周金文中的“王”与“王器”》）。其研究范围之广，在同辈研究者中也不多见。由于集中某一类器群的研究，能穷尽地收集资料，分析细致，开掘较深，故而多有创获，超越前贤。

如上所述，新时期青铜器的研究层面较前更为细致，但对于某一件或多件青铜器而言，其研究又是综合的。在《上海博物馆新获秦公器研究》等论文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朝远如何从形制、纹饰、铭文、组合形式、铸造工艺诸方面作综合考察。只有从多个角度去观察研究，才能全面把握某一件或多件青铜器的性质、特征，认识其意义与价值。然而这又谈何容易，它要求研究者具有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多方面的知识。朝远就是这样的一位多面手，正因为如此，朝远才能在新时期青铜器的研究方面大显身手。

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建立，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研究成为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青铜器研究的特点是自觉地将青铜器放在出土它的那个环境，与其他考古遗存一起作综合研究。朝远不是考古学家，但他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在《关于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罍》一文中，他着手研究的是上海博物馆所藏的一件青铜残罍，但目光却顾及所有二里头文化期的青铜罍，甚至还有陶罍。对于一个考古工作者来说，关注陶器，是份内之事，而对于一个非考古工作者来说，关注陶器，则难能可贵。在《礼制与古代中国青铜器》一文中，朝远注意到考古资料中青铜器里的残留物。他指出鼎有两类，一类是镬鼎和升鼎，牲肉先在镬鼎中煮熟，再移至升鼎，但也有不经过镬鼎而直接将牲肉整体实于升鼎的。诸如此类的考古现象，朝远非常留意，体现了新时期青铜器研究者宽广的学术视野和良好的研究素质。

青铜礼器对于中国古代礼制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朝远很注意从青铜器的组合关系入手，研究礼制的兴衰。在《晋侯青铜鼎》一文中，除了用考古学类型学的方法对晋侯墓群所出青铜鼎分型分式外，更进一步讨论青铜鼎在晋侯墓群中的组合形式。经

过排比,资料显示:晋侯和夫人墓中可以作为组合的鼎数有减少的趋势。如何解释?朝远敏锐地发现:早期的夫人墓如M113(鼎8簋6)、M13(鼎5簋4)鼎的数量虽然较多,但形制不同,大小也不能完全相次,平常不一定陈于宗庙,是为随葬时的拼凑型;自M31(鼎3簋2)开始,还有M62(鼎3簋4)、M102(鼎4簋5,其中3件鼎形制相同、大小相次,4件簋形制大小相同),其随葬鼎数虽有减少,但鼎的形制相同,簋的形制、大小相同,正说明新的规范的西周用鼎制度(随葬礼制)起始于M31。其说很有见地。在《从新出青铜钟再议“堵”与“肆”》一文中,鉴于堵、肆各自的钟数,堵与肆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异议,或以为编钟16枚为一堵、钟和磬各一堵为肆,或以为编钟16枚为一肆,或以为编钟12枚为一堵,朝远从新出的晋侯编钟以及子范钟等为例,指出:一堵为8钟,两堵成列为一肆即16钟,证明《周礼·春官·小胥》关于堵为肆之半的记载是正确的,并认为“八肆”、“四堵”所指应为同一套编钟,并未关联到磬。条分缕析,很有说服力。在《晋墓青铜器中所见战国旧礼制的衰落》一文中,分析了晋墓青铜器的组合特点,指出器类明显减少(无簋,酒器中只有壶),出土器物是随葬时临时组合的,如鼎、壶形制不一,也不是同时铸造的,当时竟允许以杂配的形式对待礼器的随葬,可见礼制的衰落。朝远又进一步指出:礼器几乎全为素面,而同墓所出错金银龙凤方案等弄器则铸造精美、纹饰华丽,二者反差极大,说明并非因为铁器和漆器的出现,导致青铜器制作技术和装饰工艺的倒退,实际上当时的青铜器制作技术和装饰工艺有了巨大发展,只是没有用到礼器上罢了。真是一针见血,鞭辟入里。

新时期青铜器研究的还表现在是理论水平的普遍提高。《“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前身”说献疑》是一篇见解独到的文章。目前考古界倾向于认为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前身,权威人士、权威著作都作如是说,而朝远则持相反意见。这需要勇气,更需要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厚的功底。朝远从学科内涵、理论方法、研究对象、研究目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等方面作了周密的论证,说明中国考古学不是在金

石学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两者没有历史的承继关系。并指出“前身说”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对考古学和金石学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伤。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青铜器研究既然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为什么没有一本权威著作称青铜器研究的领军人物郭沫若、唐兰、李学勤、马承源等为考古学家呢?朝远也不是考古学家,但他在青铜器研究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辨明这一点非常重要。惟其如此,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中国的考古学,什么是金石学,回答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史上的诸多问题,明了青铜器研究的学术流派,理出发展的脉络和特点来,从而促进青铜器研究的深入开展。

从标题看,《吴地青铜器未受商文化影响论》一文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朝远分析了吴地(今宁镇地区的吴国旧地)出土的青铜器,指出:这些青铜器除了个别为中原所铸器之外,几乎所有器物都明显受到西周文化的影响,尚未发现明显受到中原商文化影响的器物,并结合文献学、考古学和甲骨文资料,从殷商的政治地理疆域出发,分析殷商实力未及于吴地。这一论述十分独特,令人耳目一新。它是朝远长期研究吴地青铜文化,并进而广泛研究周边青铜文化后得出的结论。这一观点对于吴地青铜文化的研究有诸多启发,会产生久远的影响。

通常阅读学术论文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但《青铜器学步集》却给人一种亲和的感受。朝远显然很注意篇章结构、遣词造句,因而语句流畅,文笔生动。这来源于他的才气,更来源于他的激情,因为他是一位将全部的爱献给青铜器研究事业的人。

《青铜器学步集》共收论文44篇,20世纪90年代发表12篇,从2000年以来发表33篇,尤其最近3年(2004—2006)发表了21篇,可见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来看,这几年朝远正纵横在他学术研究和创作的兴盛期。可惜他英年早逝,否则我们可以读到他的更多精彩篇章。他的去世是青铜器研究领域的重大损失。

朝远兄弟,安息吧,你不会孤寂,青铜之光会永远伴随着你。

2009年6月9日

书苑猎真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Several Books

撰文 / 丁辑

《十九世纪中国外销通草水彩画研究》

程存洁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年8月第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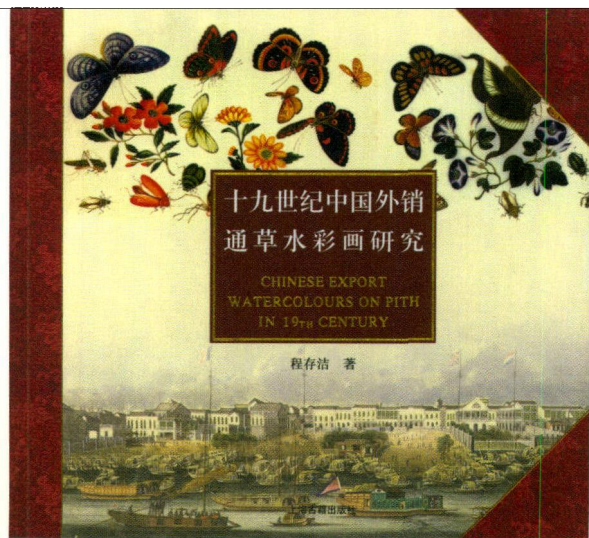
13世纪,马可·波罗向全世界隆重推出了中国;17世纪,利玛窦带来了纯粹的西方绘画艺术;18世纪,郎世宁开创了中西合璧的绘画艺术,同时也开始了具有特殊意义的“外销画”时代。“外销画”是指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在广州出现的一种中西混合的绘画。广州的职业画工们为满足西洋顾客的需求,以商品市场的调整为导向,通过学习西洋的绘画技法,模仿西洋的绘画风格,以西洋绘画的材料进行绘制的作品,也是代表了特殊的东方古国风情的外销商品。

广州是最早出现外销画和外销画职业画师的地区。外销画的品种有很多,如油画、水彩画、

玻璃画等。外销画画师有西洋画家的学生,有临摹复制西画的,也有纯粹是画匠的。他们先后受到17世纪荷兰绘画、18世纪意大利绘画和英国绘画的影响,不同程度地掌握了西画的技法和西画材料的运用。随着欧洲洋颜料的大量输入广州,为外销画的创作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19世纪初,广州的外销画家们开始大量选用通草片,作为昂贵的中国纸和进口水印纸的替代品,通草水彩画开始进入最为繁荣和鼎盛时期。通草片是以一种名为通脱木中海绵状的茎髓经切割加工而成的薄片,质地轻而色泽白,松软有弹性,且水溶性好,适合绘制水彩画,但是容易折断。通草水彩画所选题材极为广泛,所反映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包括了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风土人情、百姓生活、社会生产、花鸟鱼虫,以及港口贸易等情景,描绘细腻,富有特色,是当时社会生活和自然生态的全景图。

本书为研究19世纪广州外销通草水彩画的专著之一。作者首先在导论中,回顾了有关通草水彩画的学术史,提出了作者所研究的通草水彩画的内容和思路。其次才是本文的主要内容。作者从通草、通草的功用、通草的使用,通草在西方的传播和演变入手,说明了通草片被用作绘画材料的原因和过程;从通草水彩画、通草水彩画的画家、通草水彩画家与西方画家的交往,寻找了通草水彩作为一个画种而受西洋人喜爱的原因;从通草水彩画的技法、所选题材和画面内容,得出通草水彩画兴起于19世纪初,盛行于



整个19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退出了历史舞台的结论。

外销通草水彩画,作为历史画卷,它记载了19世纪的广州,是研究历史、地志学或风俗学的实物;作为文化载体,它交融了中西方的文化,是研究东西方文化、东西方社会的依据;作为艺术商品,它催生了一个新兴职业,促进了中西方贸易的发展,增加了经济往来。

《中国园林史》

储兆文著 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4月第一版

园林,是一个空间,是人类营造的生活环境,具有优美的天然野趣,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生存基础。园林,是一种文化,凝聚了人类的聪明才智,具有雅致的人文氛围,是人类创造性智慧的结晶实体。园林,是一种艺术,汇聚了自然界的山水、花木、建筑等,以三维立体形式为表现领域的空间艺术。园林,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才出现的,是人们追求至美生活方式的物质载体。园林的发展,是一个顺应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创造自然的系统过程。作为一种物质文化的实体,它是有形的客观存在;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的载体,它是无形的精神寄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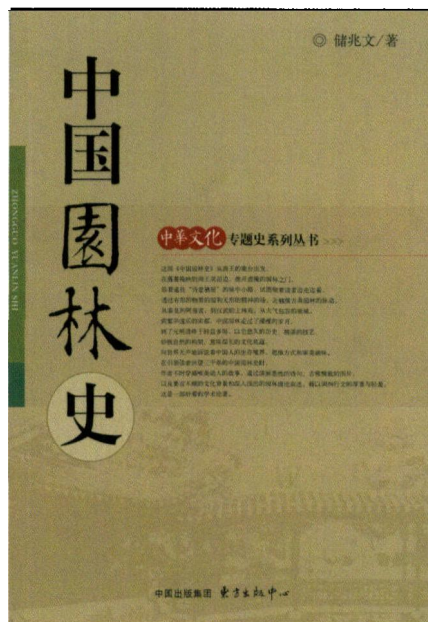
中国历史上的古代园林,大致可分为三种基本形态,有讲究气派、体现皇权威严和形象的皇家园林;有讲究性格、追求舒适享受和雅致的私家园林;有讲究庄重、显示宗教信仰和神秘的寺观园林。其中,表现形式最为丰富,艺术水平最为高超,内涵意义最为丰富,当数私家园林,它有趣味最为浓厚,个性最为突出,人生最为享受的特点。所谓私家园林其实就是宅第庭院,而文人雅士所居住的宅第则最为特别,既有优美的自然环境,又有雅致的人文氛围。一山一水一花一草一石的构建,无不寄寓人格的理想,希望实现人格的完善。文人雅士通过营造园林,把自然美和人工美高度地结合起来,凝聚了自然山水的精华;把艺术境界与

现实生活融合于一体,也是大自然的艺术再现。既是生存环境的再造,也是人生抱负的展现。

本书以中国古代园林的三大基本形态: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和寺观园林为叙述的主线。有历朝历代园林的概况细数,有各段

各期概况的归纳总结,也有具体园林个案的重点介绍。首先,作者从商代纣王的鹿台出发,沿着筑台留下的蛛丝马迹,找寻到了皇家园林的最初出发点;在西周文王的灵沼之边,顺着藤蔓掩映的崎岖小路,摸索到了皇家园林的大门口;到秦始皇帝和汉武大帝的上林苑,基本理清了皇家园林的设施、结构和发展之路。其次,作者从西晋石崇的金谷园,到东晋谢玄的始宁园,再到南朝萧绎的湘东苑的介绍,讲述了私家园林的兴起和转变。从佛教的传入并广泛流传,到洛阳白马寺的出现;从道教的兴盛被奉为国教,到终南楼观台的创立;引出了寺观园林的渊源和流传。再次,作者从大气包容的唐城长安,到繁华逸乐的宋都临安,讲述了园林的成熟和全盛。从元大都、狮子林、白塔寺,到御花园、拙政园、香山园,再到圆明园、网师园、雍和宫,描述了中国三大基本园林形态的全面兴盛和集大成时期的繁华景象。

“园林是被人类征服的大自然的缩写。用造园艺术的手段加工或再现的自然风景,是理想化、蓄以人类生活情趣的园林景象,它潜在地给人以劳动战胜自然的欣慰,而更为直接地给人以如吟诗、读画的赏心悦目的美感享受”。(杨鸿勋《江南园林论》语。)



2009全国工业遗产保护 利用现场会在上海召开

The On-the-spot Meeting of the Preservation and Use of the Industrial Heritage in China

撰文 / 翟雯

工业遗产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重点内容之一，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社会价值、科技价值、经济价值和审美价值。一百六十年前上海辟为商埠，开始了建立和发展近代工业的漫长历程，留下了丰富的工业遗产，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质量之精湛，为国内罕见。上海已有一大批工业文化遗产，如水厂、电厂、煤气厂等近百处具有保护价值的工业遗产陆续被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及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迅猛发展，城市工业布局加紧调整规划，众多工业遗产面临重要抉择，成为既紧迫又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2006年4月18日的“国际古迹遗址日”，确定主题为“聚焦工业遗产”，同时在无锡举行了首届中国工业遗产保护论坛，形成《无锡建议》。同年5月12日，国家文物局又下发了《关于加强工业遗产保护的通知》，要求各地加强工业遗产的保护并提出了明确要求。加强工业遗产的保护、管理和利用，对于传承人类先进文化，保护和彰显城市底蕴与特色，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08年10月，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率国家文物局相关司室领导对上海的工业遗产进行了考察，高度评价了上海工业遗产保护的整体情况。

2009年6月15日至16日，全国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现场会在上海召开。会议由国家文物局主办，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承办。来自于国家文物局及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部门的领导和全国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共150余人参加会议。



会议主会场

在上海博物馆报告厅举行的开幕式上,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屠光绍出席会议并致欢迎词,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做了关于《我国工业遗产保护利用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研究》的主旨报告,阐述了我国近三年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工作的进展,其中列举了北京、天津、重庆、上海、杭州等地近年来的工业遗产保护工作,全国部分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术研讨与成果,我国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对策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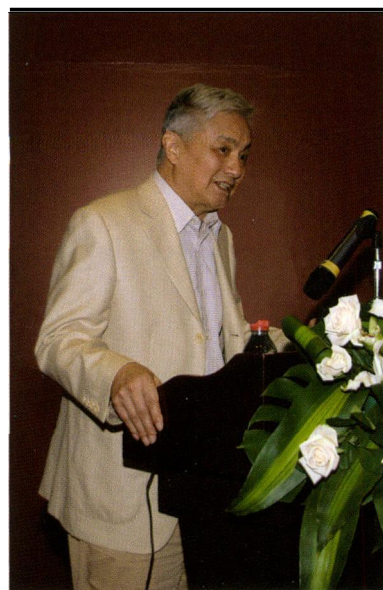
在会上,上海、北京、天津、辽宁本溪、山东青岛的文物部门及政府领导作了关于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情况的报告,来自北京、上海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五位专家学者从不同视角和层面分析研究了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问题。同济大学阮仪三教授强调应从城市的视角出发开展研究;北京大学俞孔坚教授提出从国家视野、区域视野和场地视野保护工业遗产;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侯卫东副院长提出要根据不同年代、不同行业、不同兴办主体明确“工业遗产”概念和界定的原则;清华大学刘伯英教授以北京焦化厂改造再利用为案例探讨了北京工业历史地段保护利用与复兴的设计方法;清华大学吕舟强调了工业遗产所赋予所在区域的场所精神,对工业遗产的保护是对城市精神和文脉的延续和重塑。

与会代表结合现场考察进一步了解了上海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情况,参观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案例,分别是原状加以保护的上海杨树浦水厂、改造成大型创意产业园区的原工部局宰牲场、进行功能重塑的城市雕塑艺术中心。这三处工业遗产,三种保护再利用模式,反映了上海在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方面的多元化探索。

会议最后,国家文物局童明康副局长作了大会的总结报告。报告要求各地方文物行政部门应认真贯彻落实单霁翔同志的讲话精神,并对以下五个方面进行了具体的工作部署。首先,努力争取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重视和支持,切实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第二,要进一步加强工业遗产的研究力度,明确工业遗产的价值评定标准、保护利用的模式等;第三,继续高度重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的工业遗产普查工作,全面掌握辖区内工业遗产的数量、分布、特征、保存现状、环境状况等基本情况,为准确判断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发言



同济大学阮仪三教授发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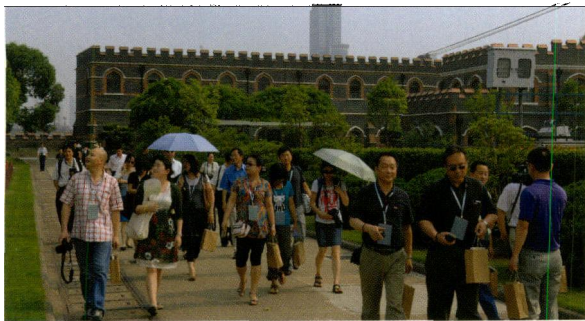
上海市文管委副主任陈燮君发言



北京文物局王丹江发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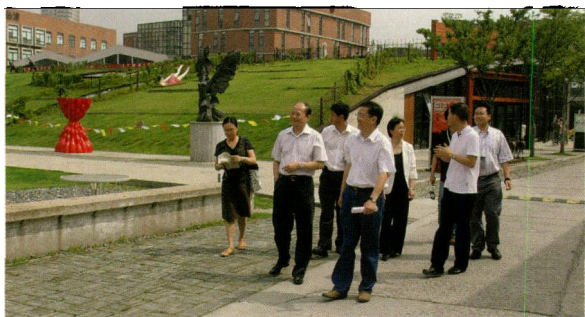
本溪副市长黄力强发言



代表们参观杨树浦水厂



代表们参观工部局宰牲场



代表们参观城市雕塑艺术中心

相关链接

杨树浦水厂

杨树浦水厂位于上海杨浦区杨树浦路830号，建于1881年，原名“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建筑面积1.28万平方米，砖混结构，朝向各异。建筑风格为英国传统城堡式，清水砖墙，嵌以红砖腰线。这些建筑现用作厂房和办公楼，保存完好。杨树浦水厂遵循的是“原状保护，延续原有功能”的保护模式，留存的历史厂房仍然保留生产的功能，为这座城市继续尽着自己的职责。

工部局宰牲场

工部局宰牲场位于虹口区沙泾路10号，是原公共租界最高行政机构工部局所建。这是外表相当壮观的4层楼钢筋混凝土建筑，由东、南、西、北4幢楼房围成一个四方形。整个建筑中间还有一个圆柱体大楼，与旁边4幢楼房通过楼道相连。2007年5月，这座落成于1933年的沧桑建筑华丽转身，成为上海又一创意产业聚集

工业遗产保护形势、科学制定工业遗产保护政策和规划提供依据；第四，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开展工业遗产的合理利用，充分发挥工业遗产在推动地区产业转型、促进环境整治、重塑地区竞争力和吸引力、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时，科学合理利用对工业遗产的保护也是一个有力的推动；第五，多渠道、多形式开展宣传，增强公众的保护意识，使工业遗产保护的观念和意识深入人心，吸引社会公众自觉参与到工业遗产保护行动中来。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与会代表围绕工业遗产保护利用这一主题开展了广泛的探讨，交流各地在保护利用方面的实践经验，分析了当前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研究了保护利用的理论与方法。会议紧凑，高效，顺利完成各项会议议程。

这次会议将推动上海乃至全国的工业遗产保护事业稳步有序地向前发展，上海市文管委也将秉持会议精神，做好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工作，将其视为一座城市的特色与历史文脉，在城市发展中得到彰显和延续。

区：1933老场坊。工部局宰牲场的保护利用堪称“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模式”，在较好的维持原有建筑的空间格局和历史风貌的前提下，大胆地进行创意产业化改造，在挖掘历史内涵的同时，注入新元素，实现了功能的有效置换，有效实现了区域城市功能提升。

上海城市雕塑艺术中心

上海城市雕塑艺术中心位于长宁区淮海西路570号，于2005年11月11日正式开馆。借鉴国际上利用废弃工业建筑在市政建设中改建为公共艺术中心的成功经验，利用原上钢十厂废弃的冷轧带钢厂的高大厂房作为雕塑中心的展示空间。上海城市雕塑艺术中心采取的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运营模式”，通过保护性改造和功能重塑，将一座曾经十分辉煌而今不再使用的老厂房打造成一座既体现城市艺术活力和时代精神，又延续了城市历史文脉的公共艺术殿堂。

文物保护准则在宋庆龄故居修缮中的运用

The heritage preservation principles seen in the renovations of the Former Residence of Mme. Soong Ching-ling

撰文 / 陆柳莺

文物建筑，是指作为文物保护的建筑物，包括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建筑、近现代代表性建筑、名人故居、革命旧址和纪念性建筑物等。文物建筑保护，在20世纪下半叶逐渐成熟并形成体系。成熟的标志是1964年由ICOMOS通过了《威尼斯宪章》，它提出的基本理念是：“有重大历史价值的建筑物，饱含着过去岁月的信息而遗存至今，是人民千百年传统的活的见证。”这就是说，文物建筑的价值，根本在于它能见证历史。

2002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修缮、保养、迁移，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

上海宋庆龄故居在2001年6月25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依据文物保护工程的原则和准则，对宋庆龄故居进行了全面修缮。此次文物建筑的修缮，将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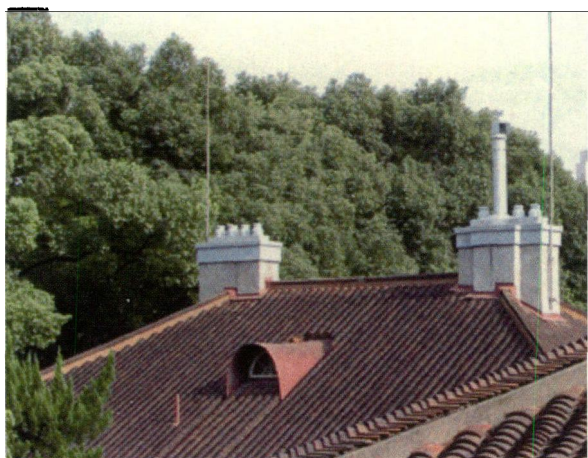


宋庆龄故居全景

完美结合，全面地保存、延续文物的真实历史信息和价值，既保持和复原了宋庆龄故居原有的历史风貌，同时使文物安全设施、展示宣传与环境等功能得到了全面提升。

、最大限度地遵循真实性的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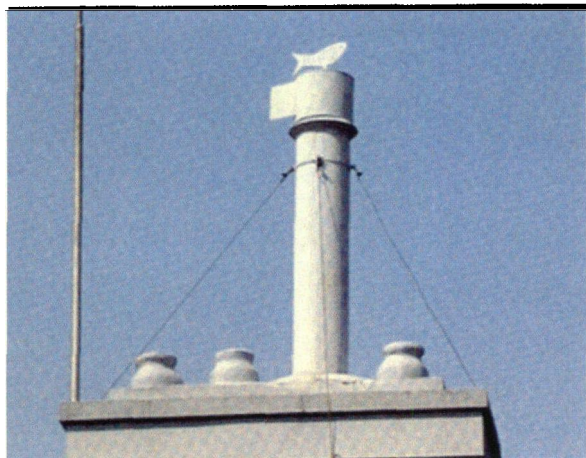
文物建筑与各类文物一样，其价值存在于原状之中。不改变文物原状，核心就是保持历史真实性。但原状的保持往往遇到许多问题，文物建筑在它存在的历史过程中的缺失、增添或改变，只要不严重损害它的真实性，而且这些缺失、增添或改变又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就不允许复建或拆除。文物建筑的保护并不强求



修缮后的局部屋面

“风格统一”、“形式完整”。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宋庆龄故居主楼，为砖木结构的假三层欧式建筑，建于1920年，属于近代建筑。该建筑最早主人系一来华经营内河航运的希腊籍船主，从建筑的整体到局部细节，带有原主人的身份标记，外观似船形。宋庆龄1949年入住于此。在此居住期间，该建筑也曾经几次大修。虽基本保持了建筑原来的风貌，但在部分建筑的结构上，曾作过一些改动，尤其是在部分的建筑构件上，可以看出后期维修时留下的时代痕迹，比如原建筑二楼的内阳台被改成了通道；门把手、五金件不整齐统一，可以看出是不同时期换置的。在研究修缮方案时，围绕“原状”的界定，曾有过争议，是按建筑的初始原状，还是按宋庆龄居住期间的原状修复；历次修缮的遗痕应否除去，主要考虑两条：一是遗痕不合理或价值甚少，而除去后显示出来的东西价值甚大，并有确凿的根据，去掉后可使文物建筑整体更合理而无损完整与安全；二是对该恢复的原状掌握了可靠而且充分的资料。两者俱备可以恢复原状。反之，有一定价值，宜保持现状。文物建筑的主要价值在于“饱含着过去年月的信息”，是历史的“活的见证”，在于它所携带的历史信息的意义。作为宋庆龄故居，历次修缮留下来的痕迹，其中有的是很有价值的，就应当保留，而不应当抹去。这样修缮结果，是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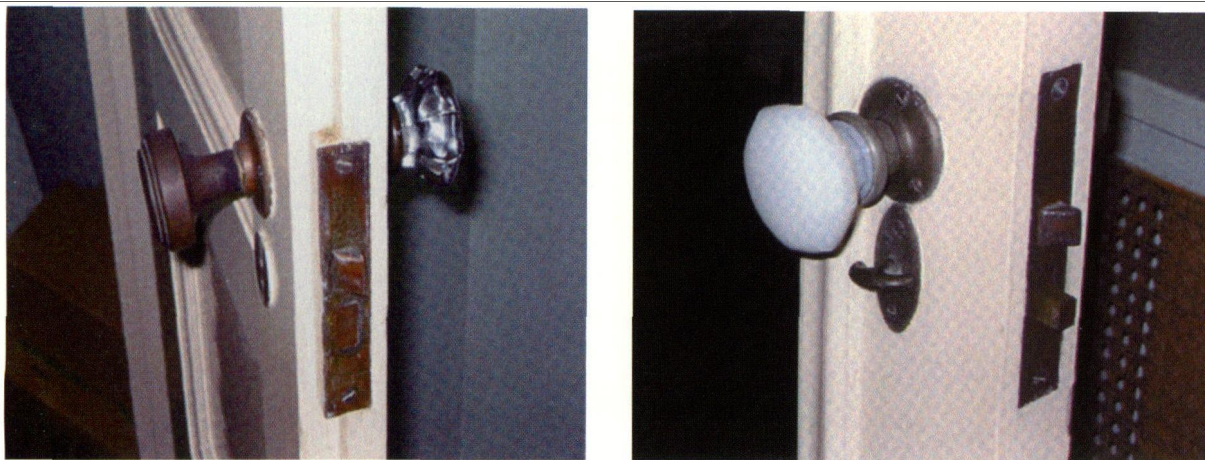
修缮中保持了建筑的细节部分

分的五金件形状质地不一致，但是却真实地保存了宋庆龄居住的时间见证、岁月痕迹和历史的原貌。把“真实”放在第一位，意味着把它们作为历史信息的携带者的价值放在第一位。只要无碍文物建筑的安全、观赏与功能的发挥，保存现状是可取的，而且可以节约资金，把有限的修缮费用在更需要的地方。

二、正确处理保护为主与合理利用的关系

文物保护的意义，在于这些遗址或文物建筑在人类历史、艺术、科学等方面的价值是罕见和无法替代而又不可再生的。处理好保护和利用的矛盾，合理界定保护和利用的相互性、必要性，从而达到保护与利用相得益彰的效果，是制定文物保护规划与实施保护方案的根本目的。

文物建筑的利用，必须要树立“保护为之，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思想，依托名人故居而建立的原址型纪念馆向社会开放，使之作为历史遗存，显示其历史意义，充分发挥文物的教育作用，产生广泛的社会效益，自然堪称为合理利用。然而，这类依托故居文物建筑而建立的纪念馆，都无可回避地面临如何有效保护好历史遗存，使其成为全社会的永久财富的课题。原有的私人寓所成了公众的参观场所，原有建筑物的功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首先需要考虑的是该建筑结构的承载能力能否达到可向



修缮前后的门把手

社会公众开放的要求。宋庆龄故居主楼在上世纪90年代修缮时，因未对建筑结构的安全承载力进行检测分析，出于建筑安全的考虑，修缮后二楼就不再对社会公众开放。这次在实施文物建筑修缮前，我们首先聘请房屋质量检测单位，对文物建筑的结构稳定性作全面的检测，在得出建筑结构基本稳定的前提下，遵循“持续保护，永续利用”的原则，根据检测结果，制定出切实可行的保护修缮方案，采取局部木结构加槽钢方式来解决结构加固问题，使主楼承载能力得到提高，主楼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得到加强，从加固后的再度检测数据分析，二楼已符合接待公众参观的安全要求。

其实每次文物建筑的修缮既是在保护，有积极作用；同时也在损耗文物建筑旧有实物留存的数量，有负面作用。我们能不能尽可能地发挥积极作用，尽可能地减少负面作用呢？所以就有能小修的不大修，能不落架的坚决不落架的要求。要尽可能多地保留和利用原来的构件和材料，非万不得已决不舍弃它们。比如在维修屋面的瓦件时，我们做到，原有材料能不换的就不要换，修补处理后能继续用的坚决不要换，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量保存原构件，原始瓦片拆下作清洁处理后再被重新用上，更能保持原结构，要把对它的干预降低到最小程度，力争无创或微创，只要能维持它正常的安全的存在便可以了，不要“锦上添花”。文物保

护工程中最低限度干预原则，就是尽量避免大拆大改，其中新技术、新材料的选用，一定要慎之又慎，只做能够保证文物安全，延长文物寿命的最低限度工作。

三、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

文物建筑保护工程是特殊的工程，它不同于一般的城市建筑或土木工程，是扩大了器物修复，施工现场就是露天文物实验室和修复室，文物建筑的维修保护除了坚持文物建筑作为建筑物的一般特性外，必须尊重历史，充分运用好传统技术、材料、工艺，因此选择好具有文物保护工程资质的设计、监理人员及施工队伍，对保护工程的质量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对文物建筑修缮过程中，有些隐蔽问题在现场勘察时难以发现，只有在修缮过程中才能发现，这就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修缮方案。宋庆龄故居主楼、辅楼内墙原来用的是香水油漆，在重新涂刷时应严格按其原有的材料、制作工艺和风格特征进行，然而现在会调制这种油漆配方的师傅已不多，而且所需配方的原料在目前的市场上也很难找到，经过多方寻觅和反复调制，最后还是采用传统的香水油漆作为内墙涂料。

在文物建筑保护工程中，如何把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统一起来，是十分重要的课题。解决好传统工艺技术与现代科技的结合问题，通



修缮后室内装饰

过现代科技更全面、深入、确切地认知文物建筑，利用现代科技保护文物建筑；利用现代科技解决传统技术难以解决的问题。宋庆龄故居修缮保护工程在这一领域的实践，得到了有效的验证。我馆在文物保护修缮中采用对基础层灌注环氧树脂的新材料，解决了地下潮气沿墙体上升而造成对文物建筑的损害。

文物修缮是一个尊重历史、精工细作的过程，文物修缮既要遵循旧制，又着眼改革创新。宋庆龄故居主楼的空调设置采用“传统于外、创新于内”的做法，在外立面严格保持原貌的前提下，内部采用了分机、多部位的中央空调装置与配套的增湿器相结合的温湿控制系统。巧妙地利用原有的水汀罩来置放空调柜机，利用原有的管道用于空调水管，既保持了故居原来面貌，又科学合理地保护了文物。文物建筑的保护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技术性，需要充分吸收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成果。使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与保持文物原状并不冲突，在传统技术不能解决保护中存在的问题时，合理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来解决文物保护方面的疑难问题，真正实现长久保存、永续利用的目的，也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

在文物建筑保护的实施过程中，“保护是核心、技术是前提、管理是保障”，而法制化、规范化的运作体系是实现文物保护目的的唯一手段。文物保护工程是为了全面地保存、延续文物的真实历史信息，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



百叶窗上帆船标记保存完好

状”的原则，并遵循国际、国内公认的准则，保护文物本体及其与之相关的历史、人文自然环境。因此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全面、系统地调查了解文物所蕴涵的历史信息及人文价值，明确保护对象，是制定文物保护单位总体规划及文物保护工程方案的必要前提，也是文物保护的目的所在。在传统技艺与手法的基础上，合理采用现代科技手段，是从根本上保存、保护文物的重要方法。■

相关链接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
3. 《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
4. 《关于古迹遗址保护与修复的国际宪章（威尼斯宪章）》
5.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

不曾忘却的纪念

——纪念上海解放 60 周年

Indelible memories, written on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Liberation of Shanghai

撰文 / 马建萍

在全市人民迎接世博开幕的倒计时日子里，我们迎来了5月27日——这个上海解放60周年纪念日。60年前的今天，8600余名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员带领全市人民与中国人民解放军里应外合，迎来了上海的解放，并把这座全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城市完整地保存下来。从此，上海揭开了新的一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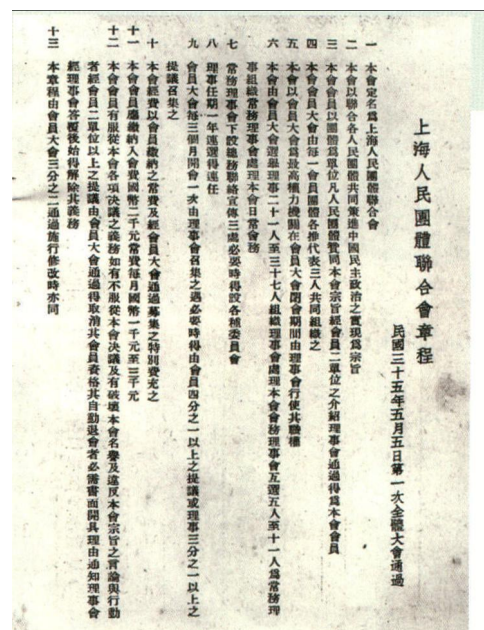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渴望一个和平、民主、团结的新局面，以医治创伤，发展经济，重建家园，但是新希望转瞬即逝。国民党政府坚持反共的内战政策，使战

争的阴霾又重新笼罩在人们头上。战后的中国，内战与和平，独裁与民主，独立自主与做附庸国的矛盾很快突显起来。为了维持巨额的军事费用和行政费用，国民党

政府印发了大量纸币应急，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事实正如国统区人民所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1945年12月，美国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以总统特使的身份来华“调处”国共争端。27日，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发表公告，重申“在国民政府下，有一统一民主之中国，国民政府各级机构中民主党派之广泛参与以及内部冲突之停止，均属必要”。⁽¹⁾在上述背景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中共中央也为此及时制订新的方针，要求在



1946年5月5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第一次全体大会通过的章程。



王孝和 (1924—1948) 浙江宁波人。原是上海美商电力公司杨树浦电厂工会常务理事，中共党员。1948年4月被国民党军警逮捕，9月30日被害。图为王孝和从容赴刑场。

(1) 《国际条约集》(1945—1947)，第125—126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

国统区的各大中城市广泛开展群众性的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的斗争。中共上海市委认为将上海各个方面的爱国民主力量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全市性的带有统战性质的各界人民联合组织已经成为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经上海市委领导人亲自联络，由中国民主促进会出面牵头，上海各界52个团体的200多名代表，于1946年5月5日，在南京东路劝工大楼三区百货业职业工会的礼堂举行大会，宣告上海市人民团体联合会成立。大会分别致电蒋介石、毛泽东、马歇尔，呼吁立即停止内战，用民主方式解决问题。上海市人民团体联合会实现了上海各界爱国民主力量的大联合，各方紧密配合共同战斗，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空前扩大。

但至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政府就单方面破坏了协议成果，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以期用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人民解放军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制订的战略防御计划，坚持内线作战，壮大自己力量，仅一年就歼灭了大批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使其总兵力由全面内战开始时的430万减少到373万。

1947年7月至9月，人民解放军转入了全国规模的对国民党军队进攻。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全党的战略任务是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统治。据此精神，人民解放军先后发起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歼敌154万余人，基本摧毁了国民党精锐部队，奠定了人民取得全国胜利的基础。

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毛泽东的新年献词，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同一天，蒋介石在新年文告中表示，愿和共产党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3月初，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抓住国民党假和谈的机会，放手宣传，在各界开展揭露假和平，争取真和平的群众运动。

4月中旬，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将全市各企事业单位已普遍存在的护厂队、护校队、纠察队等集中起来，在人民团体联合会的领导下，建立统一的人民保安队和人民宣传队。前者以工人为主，共约6万余人。主要任务是：保护工厂，保存机器，反对搬迁；协助解放军，维持秩序；团



李白（1910—1949）湖南浏阳人。中共党员。1934年参加长征。1937年，奉命调往上海，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李白及时向延安传递了重要的军政情报，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1948年底被捕。1949年5月7日夜，被害于浦东戚家庙。



黄竞武（1903—1949）上海川沙人。黄炎培之子。曾负责民建组织工作。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秘密发动中央银行员工阻止国民党当局偷运黄金、白银去台湾，并进行策反工作。5月12日被捕，18日被害。



张权（1899—1949）河北武强人。原国民党将领。上海解放前夕，联络其旧友部属，策动起义。1949年5月15日被捕，21日被国民党政府以“银元贩子”罪名杀害于大新公司（今市百一店）门口。



人民解放军骑兵团通过外白渡桥

结群众，保护群众领袖。后者以学生为主，共约4万余人。主要任务是：收听广播，收集资料，进行综合分析整理，编写印刷寄发宣传资料。8000余地下党员和党的外围团体、人民保安队、人民宣传队的十数万积极分子形成了一支阵容坚强的力量，开展了大规模的反破坏、反迁移、反屠杀斗争，从组织上、思想上为上海的解放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5月12日，上海战役拉开序幕。上海战役的第一阶段为钳击吴淞口，封锁黄浦江。第二阶段为23日夜，解放军发起总攻，在进攻苏州河以南市区的同时，打响吴淞口两侧的战斗。鏖战16个日日夜夜的解放上海之战，共歼国民党15.3万人，缴获火炮、舰艇等大量军用武器和装备物资，而重要的建筑物、工厂、码头、市政及通讯设施未遭受大的破坏，城市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1949年5月28日上午，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下午，举行接管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的仪式。在大约80平方米的市长办公室内，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陈毅坐在市长办公室的座位上，左右坐着副市长潘汉年、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宋时轮等。由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代理市长赵祖康将旧市政府印信上交陈毅市长。同一天公布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市长奉令就职视事的布告，上海市军管会的接管工作从此开始。在短短的时间里，人民政府有条不紊地完成了接管任务，迅速恢复了

正常的社会和生活秩序，大上海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上海解放了。殊不知有多少英勇儿女，多少上海地下党员、群众运动领袖、爱国民主人士、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支前民工，为了上海的解放，长眠于上海这块土地上。1949年1月至5月25日，在上海牺牲的烈士共计100人，在上海战役中牺牲的解放军指战员达7612人。

整整60年过去了，一个当年的新生儿也茁壮成长为一个巨人。但是战上海的枪炮声，仍像春雷般回响于人们的耳畔，浓烈的硝烟，更像是一张挥之不去的幕帘，隐约在人们的眼前，蒙太奇般地呈现出一个个为解放上海英勇捐躯的英雄的身影。我们仿佛看到了惜别怀孕妻子昂首就义的王孝和；看到了正向延安发送着永不消失电波的李白；看到了从哈佛归来的民主战士黄竞武；看到了大义凛然的国民党中将张权；看到了抱紧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战士赵福来……

这块曾是鲜血浇灌的土地，经过了60年，如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昨天已成为历史，我们对历史最好的纪念就是完成它没有完成的任务，去迎接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1949年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陈毅任市长，曾山、韦惠、潘汉年任副市长。这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启用的第一块招牌。为国家一级文物。



花园坊：上海的又一名人坊

Hua Yuan Fang: another residential quarter of celebrities in old Shanghai

撰文 / 刘雪芹



曹聚仁像

20 世纪初，法租界以越界筑路的方法迅速向西扩张。随着 1914 年的法租界最大规模的一次扩张，以今淮海路为主线，直达徐家汇，开始了二三十年代法租界的一波建设高潮。而且，在此次扩张中，法租界进行了严格规划，规定在今重庆南路以西地区不准设立甲类营业的住宅区，确保该地成为了西化的高级区。花园坊正处于这一西化的高级区域之内。花园坊建于 1928 年，新式里弄，有砖木结构三层联排式楼房 116 幢。西与三井洋行（今瑞金宾馆）隔路相望，南靠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东临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伯多禄教堂，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震旦大学（今上海交大医学院）相去不远，是保存较为完好的里弄之一。

花园坊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它周围的人文环境，更在于其自身浓郁的人文气息。

30 年代的又一文化人聚集地

30 年代在上海，除四明村、淮海坊外，花园

坊是上海文化人相对集中的又一个驰名弄堂。曹聚仁、徐懋庸、黄源等都曾寓居于此，鲁迅也不止一次地造访花园坊。花园坊也因此而被列入了日本军部情报课特种户口册，被日本军方特殊“照顾”起来。当然，这里也不乏反动的文人和文化阵营，如樊仲云在 103 号创办的《社会与教育》和《文化建设》等。进步与反动，在这里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曹聚仁在经历了“一·二八”的战火焚家后，于 1932 年 8 月间，从金家巷迁至花园坊 107 号，一住就是 5 年多，直到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曹聚仁在这里主办了《涛声》、《芒种》等刊物，设家宴招待鲁迅、黎烈文等朋友，也在这里经历了婚姻的变故。

谈到花园坊，曹聚仁说：花园坊 107 号，对于他的精神，孕育着两种相反的意向，一为奋起，二是消沉。令他奋起的是花园坊对面的三井花园。一到春天，园内樱花盛开，这常让他想到“花中樱为王，人中兵为贵”的日本军国主义式的尚武精神宣传。他说，这个美丽的花园对于花园坊的中国人来说是精神上的刺激。花园坊的另一边是法国天主教会创办的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的前身）的太平间，每天总有几具白布包着的尸首送进去、抬出来，夹着悲恸的号哭。在这种对死亡的号啕声中，曹聚仁度过了五个年头。

除创办《涛声》、《芒种》等刊物之外，曹聚

仁还是《申报·自由谈》和《社会日报》的长期撰稿人。报纸是曹聚仁当年初到上海借以立足与起步的行业，他也逐渐进入这一文化的圈子。1934年，为回应当时死灰复燃的“读经运动”，曹聚仁还和陈望道、朱自清、郁达夫等发起了大众语运动。并创办由生活书店出版的《太白》杂志，为了获得推广大众语的实际经验，曹还拿自己的母亲做实践对象。

写作之余的曹聚仁，还对赌球产生了兴趣。20世纪30年代，曹聚仁在上海做过的一次最长又最直接的观察，是到上海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上的中央运动场研究回力球比赛。这个从不入赌局的人，竟在1933年8月底开始的18个月里，尤其是开头半年，几乎每日必到回力球场，搭进了所有的休闲时光，最终取得了1400元的佳绩。其实，曹聚仁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一边赌球，一边进行耐心的统计和观察，进行到第5个月时，就与上海《良友》画报的主编马国亮筹划了一个以上海地方生活素描为主题的专栏，第一篇就是曹聚仁写回力球场的文章。文章用幽默的笔风、通俗的语言，揭露了回力球场的操作规则和骗人伎俩。

一直自封为“文坛看客”的曹聚仁，在主办《涛声》批评时政，倡导大众语运动，反对闲适小品，参与《太白》的编辑工作之后，被当时上海的左翼作家团体视为可以积极团结的文化人，而执行这项任务的是与他同住花园坊的邻居徐懋庸。

1933年8月，由钟敬之牵线，徐懋庸住进了黄源夫妇居住的花园坊103号《社会与教育》编辑部的三楼。《社会与教育》的总编辑是樊仲云，刊物后来被查封，樊也成为了国民党的御用文人。最后，樊竟然在103号主编起《文化建设》，鼓吹国民党的文化思想。抗日战争

期间，樊成为了汪伪政府的教育次长。

徐懋庸在逐渐了解了樊仲云的思想后，觉得继续住下去很危险，就和左联的朋友一起商量搬家的事情，讨论的结果是，不宜即搬。理由是：第一，倘若急急搬走而不告诉《社会与教育》的几个熟人以新的住处，会引起他们的猜疑；倘若告诉，则与不搬无异。第二，樊之外的几个编者只是为谋生而工作，与樊的政治倾向无关。因此，徐没有立即搬出花园坊，而是借故搬到106号的二楼。这样一来，曹聚仁和徐懋庸就成为了邻居。徐常常从自家的阳台一脚跨到曹家的阳台，然后两人便谈个通宵。后来，曹家三楼的房客搬走，徐夫妇和孩子干脆搬到曹家的三楼，成



关良像



1949年的徐懋庸

为了曹的房客。这样，一合住就是3年时光，他俩也成为了管鲍之交，谈到徐懋庸，曹聚仁说：他钦服于徐身上那种浪漫主义的革命气质，就像他欣赏曹礼吾的沉稳豁达一样。合住期间，曹聚仁也经常利用媒体，为徐的进步活动作掩护。有一次，徐和妻子回浙东家乡，曹替他发消息，说去了青岛，各报也随即转载，直到徐归来真的要去的青岛的时候，一些报纸还在说徐去了青岛。

曹和徐都和鲁迅有交往。鲁迅曾两次到曹家登门拜访。1933年11月到1936年8月，鲁迅寄给徐的信件达52封（公开信不计算在内），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寄到曹的寓所，由曹代为转交的。徐的《打杂集》的出版，鲁迅还为之作序。

黄源夫妇是和曹聚仁差不多时间（1932年底）来到花园坊的，当时居住在103号三楼。1933年的上半年，由胡愈之介绍为前锋书店编辑了《屠格涅夫代表作品集》、《高尔基代表作品集》和《美国的儿童作品》。同年，肖伯纳来上海，黄源还在《社会与教育》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欢迎肖伯纳的文章。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在鲁迅和瞿秋白编的《肖伯纳在上海》这个集子里。1933年4月，郑振铎和茅盾创办文学社，经胡愈之和茅盾介绍，黄源去做了编辑，月薪50元。为此，黄源夫妇也就搬离了花园坊，到了文学社——拉都路敦和里。

董竹君在花园坊

在董竹君自传《我的一个世纪》里，她这样写道：我母女在上海三德坊居住不久，就迁往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歧斋前楼。后又搬到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花园坊96号（30年代初，笔者注）。不断地搬家，在上海几乎成为我们这类生活不安定的人们共同的特点。……花园坊弄堂住户约几十家，是一座单开间三层楼洋房，有两个亭子间。我们住三楼的亭子间。在美专读书的华侨学生许珂（后来到延安去了，解放后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住二楼，郑德音弟弟沙梅住底楼，后来沙梅搬走了。这期间，我所接触的人们绝大部分是进步青年、共产党员、左倾的文艺工作者。他们对我思想进步帮助很大，使我生活更有力，意志更坚强。对于问题的认识、分析、判断、处理，比较更准确。另外遇到比我差的人，我也尽我所知、所能帮助他们，启发他们。

在此居住期间的董竹君，一面经营着群益厂和协助华南医院工作，一面进行革命活动。1931年冬，和郑沙梅（这时候他已是乐曲戏剧作家）、谢韵心（又名章氓，中共党员、戏剧工作者，解放后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三人合作，创办了《戏剧与音乐》杂志。资金来源于群益工厂和党员刘栗一同志的赠款资助。用“艺术书店”名义出版，地址就在花园坊96号。创刊号

刚刚印出发行，因“一·二八”事件群益工厂被轰炸，董竹君又遭被捕，《戏剧与音乐》杂志也随形势的变化而沉落。未能继续问世。创刊号内还有董竹君女儿国琼一篇文章，署名“夏曼蒂”。

在自传里，她这样记载这件事情：“现在回忆起来，那时候



瑞金宾馆1号楼

无论想替国家人民做什么事情，都是非常困难的。政治上、社会上压力重重，加上不是无钱便是钱不够。即使历尽艰辛好不容易办成，到中途也免不了遭到打击而夭折。”

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期间，群益厂被炸，为了能把工厂设法恢复，家务安顿好，革命工作进行得更好些，



瑞金宾馆4号楼

董竹君奔忙异常。有一天傍晚，正和孩子们吃晚饭时，忽然外面锣鼓炮竹声大作，市民们在庆祝十九路军打胜仗。董竹君也兴奋得放下饭碗，带着孩子们坐上两部黄包车，挂上鞭炮，一路庆贺到11点钟才回家。安排孩子们睡觉后，正和暨南大学的学生骆介庵谈论时事，突然楼下后门有人叫开门，来势汹汹。她和骆介庵知道有变，而此时，包探已经冲上三楼，直冲董住的亭子间。在自传里，她这样记载这件事情：“法国包探像根柱子一样站在门旁，两个中国包探就拿起电筒到处照射，首先照到书架，其中有一个包探哼一声说：‘这些书就足够证明你是反动分子。’‘这些书市上都有出售的，为什么看看这些书就是反动？’我板起脸回答他，心里真气愤，恨不得有手枪把他们打死。‘你这女人的嘴倒蛮厉害的。’他冷笑一声说。”董竹君当晚被带走，不久被关到薛华立路大监狱（今建国中路法租界巡捕房旧址）。董竹君虽守口如瓶，保守了秘密，但却饱受了近半年的牢狱之苦。

董入狱后不久，为了家人的安全，女儿就将家搬到福履理路（今建国西路）资敬坊1号，结束了在花园坊96号的生活。

艺术家雅集之所

著名画家关良，留日归国之后，应上海美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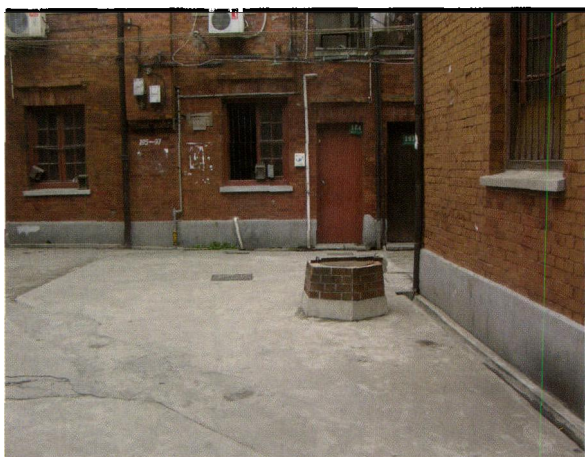
专科学校负责人刘海粟的邀请，担任油画、素描的教学工作。为方便起见，1924年，关良就租房到美专附近的花园坊居住。风景旖旎的法国公园位于美专和花园坊的中间，“只要是天空晴朗的日子，我在课余之暇，就常到这里来写生、作画、看书”。于是，法国公园里就有多一幅才俊和画架的常见画面。正是在这里，关良还结识了常来此看书、思考的郭沫若先生。两人有相见恨晚之感，从此，关良经常拜访郭沫若在环龙路（今南昌路）的寓所，并在此结识了一批创造社的朋友，有郁达夫、蒋光慈等，他们也都是郭先生的常客。除此之外，关良还经常到自忠路黄宾虹的家里参观、学习、临摹，国画功底也因此而大有长进。工作之余，关良还经常听戏，尤其是盖叫天和梅兰芳的戏，他们私下也是好朋友，通过听戏对他们的动作进行观摩，从各个角度拍下很多照片，作为绘画的素材。后来，关良“携笔从戎”，也就离开了花园坊。

花园坊115号，还是著名音乐家黄自的寓所。1929年，留美回沪的黄自入住花园坊115号。当时执教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贺绿汀即是其高足之一。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相继创作了《抗战歌》、《九一八》、《旗正飘飘》等大量抗日爱国歌曲。

花园坊还曾有着著名电影艺术家、一代人的



花园坊门楣



花园坊104号后门的水井



花园坊弄内

精神偶像——谢芳的童年记忆。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出生的谢芳，原名谢怀复（为收复国土起名），1937年，刚满周岁，就随父母从湖北来到上海，住在花园坊51号的二层楼上。在此一住就是9个年头，度过了她美好的童年时光。当时，一层楼住的是一位日本的牙科医生，三层楼住的是一家

绸缎铺老板。在一次访谈节目里谢芳提到花园坊，她这样谈到：“我在大上海的这个小弄堂里度过了九个年头。虽然当时我年岁尚小，但那场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八年日本侵华战争，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投下种种阴影。……当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时，从大人那里，我也感染到一种极大的兴奋和喜悦。母亲特意用毛线在我的毛衣上缝绣了一个‘V’字，这是英语‘胜利’的头一个字母。”

风雨之后的两口老水井

“文革”期间，毛主席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思想，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花园坊的居民也采取了措施。他们在小区内深挖水井，以备战、备荒。据居住在这里的居民讲，当时花园坊挖了不少水井。久而久之，这些个老水井已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笔者前不久去一看究竟时，在老居民的引导下，找到了两口老水井，一个是在58号的后门，一个是在104号的后门。有一位居民讲：“井水冬暖夏凉，以前没有冰箱没有洗衣机，我们夏天把黄金瓜和西瓜摆在井里。我们用井水冲小方场的地皮，拖地，用它养花、养金鱼。冬天，老人们都围在井旁晒太阳，夏天大人小孩都在井旁乘风凉……”老人的几句话，给我们描绘出了一幅温暖的弄堂风情画卷。附近居民也一直自发地对老井进行着管理，老井上的大锁是大家一起出资买的，以前老井一直在用的时候，大家还一起出资买了一个木桶。

2005年旧区改造时，为了安全起见，政府准备填平水井，花园坊12户居民联名申请保留这两口水井，希望让他们留住美好的生活记忆。申请书上这样写到：“老井是我们生活的见证，它曾让花红草绿，曾让金鱼畅游……它更是老年人回家的标志物，它是新式里弄的生活设施，是历史遗留，更是一道风景。”在居民的强烈要求下，目前，这两口老水井被保留了下来，继续见证着花园坊历史的演进。■

青城山天师洞黄帝祠 灾后维修竣工仪式隆重举行

2009年5月10日，由四川省文物局、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和都江堰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青城山天师洞黄帝祠灾后维修竣工仪式”在天师洞大殿前隆重举行。参加竣工仪式的领导及嘉宾有：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上海市对口支援都江堰市灾后重建指挥部汪剑明，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陈燮君、办公室副主任王莲芬、地文处处长谭玉峰，四川省文物局副局长王琼，文保处处长朱小南，成都市文化局副局长汪邦军，文物处处长缪永舒，都江堰市市长许兴国，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聪，副市长严代雄，以及维修设计、施工、监理单位负责人。

仪式上，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首先代表国家文物局对维修工程的顺利竣工表示祝贺，对参与工程援建的所有工作人员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去年5·12汶川大地震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损失，文物古迹遭到重创。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文物的灾后修复工作，全国各地的文物部门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快速行动，在50天里，完成了1075项受损情况调查评估，并上报了党中央、国务院。各地都把对口援建文物纳入了援建计划。上海市同样也把文物修缮纳入了预算，精心施工，进展快速。单霁翔局长高度评价了黄帝祠灾后维修工程，强调黄帝祠灾后维修工程是去年5·12以后第一个竣工的由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的省保单位，也是地震后第一个竣工的世界文化遗产建筑群，具有重要意义。

陈燮君同志详细介绍了上海市文管委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文物局的部署，自筹资金，援修黄帝祠这一重要项目的全过程。他强调指出：一、维修天师洞黄帝祠，对保护青城山世界文化遗

产具有重要意义。

青城山作为中国道教发源地、著名的道教圣地，2000年11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黄

帝祠”又称“古黄帝祠”，是天师洞建筑群中体量较大的殿堂，始建年代可上溯到隋代，其历史真实地反映了道教在青城山的传播和发展。在5·12汶川大地震中，世界文化遗产青城山范围内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建福宫、天师洞、真武宫、朝阳洞、上清宫、圆明宫、玉清宫等7处文物古建筑遭受不同程度损毁，受灾面积达10414.91平方米。地震致使部分宫观地坪开裂、沉降，堡坎垮塌，主体建筑屋面、瓦作受损，梁架歪闪、柱础位移，樑卯脱位、砖柱断裂，部分建筑存在较严重的结构安全隐患。因此，黄帝祠被作为青城山首个灾后文物维修工程申报立项。二、上海市和四川省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通力合作，共同推进黄帝祠维修项目。维修设计方案由上海交通大学安地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设计，上海住总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施工，上海协同监理公司监理，工程于2008年9月底筹备，11月完成立项并进场勘测，12月完成项目立项、勘察设计、方案审批等前期准备工作，2009年1月动工，4月下旬完成维修。4月29日经过了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验收。在汶川大地震一周年来之际，终于圆满完成任务。三、此次维修工程是“修旧如旧”的典型代表，将为青城山古建筑群的全面维修提供有益的经验。由于文物建筑具有较强的地域性，为了不改变文物原

状，上海市文管委专门聘请了熟悉青城山古建筑结构特点和营造技术的当地文物专家，参加黄帝祠维修工程质量管理，确保了古建筑维修工程的质量。

都江堰市领导对上海市的援助表示感谢，表示全体四川人民会共同努力，走出一条质量更好、速度更快、后劲更足的灾后重建可持续发展之路。最后，领导、专家为黄帝祠灾后维修竣工剪彩。

黄帝祠维修工程的胜利竣工，是上海人民献给都江堰市人民重建精神家园的一份爱心，不仅对都江堰市，也将对整个四川的文化文物灾后重建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撰文／辛尔）



徐汇区举办“记忆土山湾——土山湾历史资料文物展”

在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下，徐汇区文化局加大土山湾博物馆筹建力度。土山湾博物馆的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开展之中，经过近一年的藏品征集，筹备小组已收到市民捐赠的雕塑、书籍证书及绘画美术作品等实物260余件，征集到土山湾时期书籍、活字印刷工具、黄杨木雕作品、各式乐器及工艺品240余件。2009年4月30日下午，徐汇区文化局在田林东路8号土山湾美术馆，举办“记忆土山湾——土山湾历史资料文物展”开展仪式。

土山湾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140多年前的土山湾，是沪上西洋派金石书画等工艺艺术的摇篮，曾以它出产的杰出工艺品蜚声中外。93年前的土山湾，挑选一批艺术品参加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其中有19件工艺作品获得奖状和奖牌。随着2010年上海世博会开幕时刻的日益临近，上海世博会的宣传推介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徐汇区人民政府积极开展“迎世博”系列活动，区文化局以世博为契机，通过“土山湾孤儿院旧址”挂牌、召开“土山湾文化论坛”、“记忆土山湾”美术创作大赛、征集土山湾历史资料文物、筹办“土山湾陈列馆”等系列活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深入人心，土山湾博物馆筹建工作取得明显效果。陈耀春、陈耀王、马玉章、王存义、杨连云、章俊民、章于金、李顺兴、赵信、赵文龙等市民向博物馆捐赠了珍藏多年的物品。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上海古籍出版社、天主教上海教区等与徐汇区文化局签署协议，向土山湾博物馆出借、



出让部分珍贵的土山湾历史实物，为研究土山湾历史、筹建土山湾博物馆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展品。在开展仪式上，区文化局党委书记蔡立夫向马相伯后裔、陈耀王、赵文龙等市民颁发捐赠证书，向土山湾历史史料、文物的捐赠者和支持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吕玉龙、汪其才、市文管委博纪处处长郑亚等领导为“记忆土山湾——土山湾历史资料文物展”揭幕。区文化局、区房地局、区档案局、徐家汇街道、区域内博物馆、纪念馆、董恒甫职校等有关领导及社区居民和部分土山湾老人近百人参加仪式，参观陈列展品。

(撰文/丁永坤)

市文管委系统 “迎世博六百年行动”实施过半

2009年5月13日，迎世博600天行动窗口服务行业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领导小组办公室扩大会议召开。会议首先传达了5月5日市窗口服务指挥部第九次工作会议的精神以及艾宝俊副市长讲话精神。总结了近期文管委系统组织举办的一系列迎世博活动，包括“知礼仪、讲文明、迎世博、迎ICOM”知识问卷测试活动，共印发1072份问卷，合格率达到100%；制作宣传单片，做到每个员工人手一份；下发宣传图片、易拉宝

等宣传资料；组织上海市文博行业迎世博讲文明树新风主题报告会；举行学双语培训活动，努力提高行业服务质量；进行自查、暗访活动，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各基层单位负责同志分别交流了各自近阶段迎世博的有关举措。一、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从组织上保证各项举措顺利落实。各基层单位分别成立迎世博600天行动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具体负责落实各项组织、协调、检查、监督工作。二、大力宣传动员，开展各项活动，提高职工的知晓率和参与度。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精心策划推出“走进世博图片展”于4月5日开始巡展；团委组织团员青年于五四青年节参观上海世博展示中心，积极开展符合青年特点的各项活动；工会通过编

发“迎世博”知识小册子、张贴“迎世博”宣传画，举行团体知识竞赛等形式对职工进行宣传教育。三、贯彻落实《关于组织开展迎世博、讲文明、树新风“三五”集中行动通知》的精神，在每月的5、15、25日集中开展活动。上海博物馆举行了“左行右立”志愿者活动；一大会址纪念馆进行了“迎世博，我微笑，你温馨，观众评议日”活动、“人人动手，清洁环境”活动、“迎世博，守序有礼，做一回交通协管员”活动以及“迎世博、现场初级急救培训”活动；各基层单位都举行了各具特色的“我微笑、我捡起”活动。四、定期认真进行自查活动，及时发现隐患予以改正。整个系统在活动中，规定动作落实到位，创新举措层出不穷，基本形成了领导带头、职工积极参与

的良好氛围。

最后，对下阶段文博行业迎世博工作提出了要求：一、迎世博各项工作要进一步往深度和广度发展，力求做到各个方面全覆盖。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动员工作，使每位员工深刻了解世博精神，更好的参与世博。二、按照计划要求，立足本职工作，提高服务能力和参与能力。三、从思想上加强反恐安全、文物安全、生产安全、工作安全的意识，要常抓不懈，形成长效机制，抓好安全工作。四、抓住世博这一重要契机，更好的宣传文博事业，同时要发挥文物工作的优势和特色，推出更多更好的展览、活动、项目等，更好的为世博会服务。■
(撰文 / 幸尔)

闵行区博物馆举办 “迎世博·爱我闵行”演讲比赛

按照《上海市迎世博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动员宣传600天行动纲要》的有关要求，围绕“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传递“文明的城市，美好的生活”和“精彩世博、文明先行”的理念，闵行区博物馆积极动员，同时配合“5·18国际博物馆日”宣传主题，5月17日下午，在博物馆多功能厅举办“迎世博·爱我闵行”闵行区农民工子弟学校小学生演讲比赛，为农民工学校的孩子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使他们更快地融入闵行，融入上海，为迎接世博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抒发自己的一份情怀。

为了丰富农民工子弟学校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关心这些新上海小市民，闵行区博物馆近年来连续开展了“走进农民工学校，走进闵行区博物馆”的流动巡展，将展板送至10余所学校，深得师生的好评。今年的“5·18”前夕，又将他们请进博物馆，举办了“迎世博·爱我闵行”为主题的演讲活动，参加这次活动的有曹行世纪小学、振兴小学、卉园小学、金沪小学、育苗小学等5所小学的师生代表50余人，其中21人参加比赛。担任本次比赛的评委有闵行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社文科科长汤蓉燕，国家普通话测试员、原闵行电视台资深播音员陈全娣，闵行区教师进修学院何永红老师等。

比赛采取亮分的形式进行，脱稿演讲，每位选手演讲完毕，评委老师做简单点评。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精彩比赛，评出一等奖二名、二等奖四名、三等奖六名、参与奖九名，每位参赛小选手都获得了荣誉证书和精美的奖品。大多数小选手的演讲稿都是自己撰写，经过精心设计，抒发了自己对世博的向往，对

生活在闵行、生活在上海的感激之情以及能为世博做些什么的想法，从小事做起、遵守“七不”、认真学习等，每篇文稿都非常感人，是每个孩子的心声。参加比赛的小选手最小的11岁，大多是四、五年级的小学生，声音虽然很稚嫩但演讲时却声情并茂、绘声绘色，与中学生相比一点也不逊色。

许多参赛选手都是第一次参加演讲比赛，各参赛学校的师生都非常珍惜这次机会，认真组织、积极参与，活动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次活动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知识上对师生们都是很好的教育和探索。

我馆本着对公众尤其是大、中、小学生开展专业教学、科学普及教育、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精神为服务宗旨，以后将继续组织类似活动，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添砖加瓦。■
(撰文 / 闵博)



上海市 2009 “文化遗产日” 活动丰富多彩

2009年6月13日，是第四个“中国文化遗产日”。国家文物局将今年的活动主题确定为“保护文化遗产，促进科学发展”。为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公众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宣传我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成果，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使文化遗产事业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独特作用，营造全社会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良好氛围，促进本市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下，针对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围绕主题，结合实际，组织了精彩纷呈的2009年“中国文化遗产日”系列宣传展示活动。

“中国文化遗产日”当天，市文管委与长宁区人民政府一同主办“2009年‘中国文化遗产日’长宁区优秀历史保护建筑开放日宣传活动”。市、区有关领导与市民一同参观文物建筑登辉堂及复旦中学校史馆。系列活动还邀请了历史博物馆专家讲述老建筑趣闻以及举办愚园路历史文化风貌区市民音乐会等。

市文管委与卢湾区人民政府在华亭伊势丹广场举行了“2009年卢湾区‘中国文化遗产日’宣传活动”。活动包括卢湾区文物保护单位揭牌、“我的石库门记忆”博客大赛颁奖、《岁月——上海卢湾人文历史图册》赠书、“百姓石库门诗歌、散文征集活动”优胜作品颁奖、“寻找城区记忆——卢湾百姓文物捐赠”活动颁奖和越剧、民族舞演出等。

当天下午，市文管委还联合青浦区人民政府举办“福泉山遗址考古新发现特展”。展览开幕式上首次披露了本次福泉山遗址发掘的情况，举行了福泉山遗址委托保护责任书交换仪式。此次展览展出的发掘文物70余件，均是首次公开亮相。“青浦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阶段性成果图片展”、“青浦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图片展”开展。

为了进一步扩大宣传区域，提高宣传力度，本市19个区县



的文物部门分别组织了文物挂牌、文物展示、学术研讨、流动展览、广场宣传、文艺演出、专题讲座、征文竞赛、专家咨询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如杨浦区举办“从吴淞口到世博园——黄浦江沿岸的历史见证”明信片专题展示；嘉定区举办“嘉定区文物普查阶段性成果图片展”；普陀区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苏绣工艺现场展示、江南丝竹表演等迎世博社区文艺巡演文化遗产日专场；金山区举办“纪念金山解放60周年书画摄影展”和“江南之春三十年回顾——金山农民画获奖作品展”；徐汇区举办“记忆土山湾——土山湾历史资料文物展”；黄浦区举办“端阳申江——端午民俗风情展”；奉贤区举办“奉贤境内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与发展”专题讲座活动；浦东新区宣布上海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单并授牌；静安区举办“静安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展”等等。

除了上述活动外，市文管委还于6月13日和6月14日两天，组织本市各区县文物建筑和部分博物馆、纪念馆共100处免费对公众开放，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两天内全市累计接待市民19万余人次，平均每个参观点人数达1900余人，与2008年相比有较大幅度增长。长宁区精心组织了区域内的14处文物建筑免费开放，两天内累计接待了1.8万余人。徐汇区30处文物建筑共接待市民14970多人次，还印发了2万余份供观众免费阅览，召集百余名活动志愿者为市民游客进行讲解服务。静安区的嘉道理住宅旧址（今中福会少年宫）两天内接待了2000余人。如此之高的参观人数，充分体现了文物建筑的魅力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关注与热情。

（撰文 / 辛尔）



深切追思祭先人 ——清明举行祭扫徐光启活动

清明扫墓追祭先人，我国人民有“饮水思源、慎终追远”的传统美德。徐光启是中国明代向西方追求科学和真理的先行者，是明末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位重要人物，也是关心国计民生的爱国者。徐光启超越了时间和地域的局限，彪炳史册，世代受到人民群众的景仰。清明节，市、区有关部门在徐光启墓隆重举行爱国科学家徐光启祭扫仪式，向我国著名的科技先驱表达深切的追思、怀念之情。

2009年4月3日上午，由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中共徐汇区委宣传部等主办，由徐汇区文明办、徐汇区文化局、徐汇区教育局、徐汇区民族宗教办、徐汇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徐汇区绿化局、徐汇区外事办、徐家汇街道办事处等承办的“爱国科学家徐光启祭扫活动”在光启公园徐光启墓（南丹路17号）前隆重举行。市文明办、市文管委、市文广局、徐汇区政府、区政协、区委宣传部和区文化局等有关领导以及社区居民、学校师生、徐光启后裔代表等近四百人向徐光启

墓敬献花篮和鲜花，鞠躬致敬，藉表对先人的敬意和追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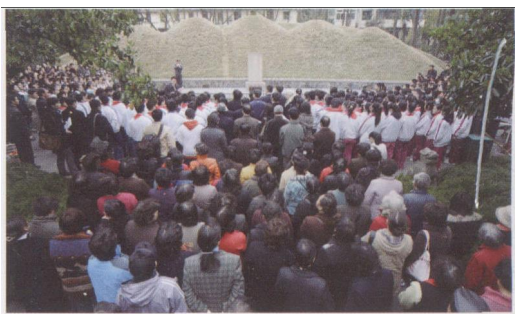
祭扫仪式由中共徐汇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文化局局长陈澄泉主持。在祭扫仪式上，全体人员肃立，聆听《徐光启缅怀曲》；主祭人吟读《徐光启祭文》；学生代表、徐光启后裔代表、区领导相继发言，抒发对先辈的怀念之情，感恩之心。缅怀徐光启的爱国情怀，学习徐光启的崇高品德，感恩思源，传承历史文化，弘扬文明新风，自觉践行科学发展观。

在祭扫仪式上，徐汇区文化局向徐汇中学、光启小学等中小學生赠送《徐光启》课外辅导教材；市文明办副主任陈振民、徐汇区副区长周秀芬为“徐光启逝世375周年祭文碑”揭幕。

活动主办方组织爱国科学家徐光启祭扫活动，旨在弘扬传

统文化，在全社会倡导尊重科学、构建和谐社会，推进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实践活动。

（撰文／徐文）



编辑手记

《上海文博论丛》副主编李朝远先生于2009年4月26日英年早逝。

曾经，《上海文博论丛》2002年9月创刊时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朝远副主编的《读鸟尊》（2002年1总第一期），以后又有《达拉斯的“第六层楼博物馆”》（2003年1总第三期）、《广岛原子弹爆炸博物馆及其它》（2003年4总第六期）、《大孟鼎证补二三例》（2004年1总第七期），直到上一期的《召鼎诸铭文拓片之比勘》（2009年1总第二十七期）……

朝远先生追求完美，他是一位“挑剔的”主编、“苛刻的”领导，但是他苛求别人也苛求自己。他投身学术也热爱生活，他爱自然、爱行走，他迷恋大海，欣赏所有的海滩和海岸，以四处游历来排解困苦、烦恼和生活中的一切不如意。他爱体育、爱音乐、爱艺术，喜欢NBA，也喜欢姚明、霍华德、易建联；喜欢皇家马德里队；喜欢开车、也喜欢F1，在离开的前一周还曾经感叹：“F1去不了了……但还是要深深地渴望！……追赶那永远不可及的震耳欲聋声……”；他喜欢听小提琴和吉他，偏爱探戈的幽忧，坚持享受了人生最后一年的新年音乐会；他接受任何形式的艺术，无论古今无论中外；他爱美食——吃什么都香、也爱美酒——和大家分享；他爱家人、爱朋友，他爱一切美好的东西，包括他自己，他得意于自己的秀发、美瞳和帅哥身材……，所以直到最后他依旧希望留给大家美好的形象和回忆。

只有打折的生命，没有打折的人生。